

2002

2

总第 119 期

炎黄春秋

清官问题讨论的历史教训

马寅初不向错误批判屈服

胡耀邦是怎样做中宣部长的

戴逸：史实中的康熙收复台湾

由『管好身边人』想到曾国藩家书

中國有史最尚崇實筆則筆削則削斧鉞當
前難屈董狐叱咤的膽刑又尚能摧損司馬遷莊
嚴的使命感乎春秋精神其在於此認爲正之
炎黃春秋所鍾武繼承者

炎黃春秋創刊十周年 敬蕪辭羨之

公歲四十頗有餘之 莊實 又懷沙



實踐是檢驗真
理的惟一標準

祝賀炎黃春秋創刊十周年

李 濟 光



紀念《炎黃春秋》創刊十周年

談今稽古表禮華
揚清激濁美黃魂

敬賀炎黃春秋創刊十周年

朱佳功



求志務實
利史益今

炎黃春秋創刊十周年紀念 海冰書



炎黄春秋

春 秋 笔

- 2 清官问题讨论的历史教训…………… 耿一民
7 马寅初:决不向不以理服人的批判者投降 …… 张锡金
11 胡耀邦是怎样做中宣部长的…………… 郑仲兵

人 物 志

- 18 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率船回归记…………… 刘 力
23 由国民党失意元老转为历史学家的冯自由…………… 傅国涌
26 民国前总理熊希龄的风云人生…………… 周秋光

求 实 篇

- 32 红军西路军烈士首级照片考…………… 李敏杰 李宣辰

人 海 浪

- 35 我军第一个驾机远航的人…………… 孔迎庆
36 方志敏的最后知音——胡逸民…………… 张 林
38 保举徐向前考黄埔军校的人…………… 何 奇
40 王树声警卫何福圣与许世友比武…………… 云 龙

一 家 言

- 42 由“管好身边人”想到曾国藩家书…………… 曾彦修
43 永不凋谢的汉字…………… 刘志琴
44 不能遗忘革命英烈…………… 何 辛

文 荟 苑

- 46 国共两党斗争中的《大公报》…………… 舒 展
50 20 世纪 30 年代影坛才女艾霞…………… 夏秋雨

陨 星 篇

- 53 “不抵抗将军”的真相——《世纪老人张学良的
多彩人生》(连载三)…………… 徐庆全 赵 杰

古 镜 台

- 60 史实中的康熙收复台湾…………… 戴 逸
63 评说历史疑案:“孝庄下嫁”与“顺治出家”…………… 王俊义
67 朱元璋的重典之治与预防犯罪之策…………… 江仁宝
70 李世民纳谏的前后变化…………… 徐澄清

遗 闻 录

- 73 溥仪是怎样走近日本的…………… 爱新觉罗·毓嶙
76 顾祝同枪杀报纸编辑刘煜生…………… 散 木

资 料 库

- 78 为蒋家王朝经济领航的台湾技术官僚…………… 孙代尧

九 州 景

- 80 芳草萋萋鹦鹉洲…………… 程竟明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陈 沂
杜润生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镗
张岂之 张国琦 郑 惠
范敬宜 凌 云 曾彦修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吴 思 刘家驹 舒元璋

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郝爱存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深圳市亚大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 1 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4.80 元

清官问题讨论的历史教训

● 耿一民

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史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重要教训之一。20世纪60年代围绕海瑞戏展开的清官问题的讨论，由于政治的干预，权力的介入，结局最为惨烈。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的角度，剖析这一历史事件，真正记取教训，厘定共同遵守的学术讨论规则，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发展学术所必需，也为史学界所企望。

“清官”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清官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主要是：两袖清风，廉洁奉公；执法如山，泾渭分明；刚直不阿，不畏权贵；体察民情，爱民如子。假如大体按此标准翻检从《史记》至《明史》的《二十四史》，再加上后人所著的《清史稿》，列入《循吏传》、《良吏传》、《良政传》、《能吏传》的，大都可以归入清官之属。

纵观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面对诸多的“正史”记载，说“清官”“寥若晨星”，可以说“清官”被封建统治者“美化”、“拔高”亦可，若说“清官”完全为统治者向壁虚构，否定“清官”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是难以立足的。正因为承认史有清官这一前提，才有了史学界关于“清官”生存的社会土壤、“清官”的历史作用等问题的讨论。

“清官”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客观上，确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否则就得不到古代人民的承认和肯定。清官戏的久演不衰，便是历史的证明。历史上的清官写入话本、戏曲者，诸如包拯、海瑞、况钟者固然不少，但传唱历史的久远，影响的广泛，无疑以包拯为最。有学者统计，一百出戏的《元曲选》中，包公戏就有十一种之多；明

人杂剧中，包公破案的故事，更与江湖侠义故事相联系，使包公形象更丰富、多面，从而受众面也更广泛，谓其“童稚皆知”并不过分。

史载清官，有名有姓，有事迹可考，但他一旦进入文学艺术领域，就是另一回事了。一般观众看包公戏，则不会深究某一情节是否为张咏或黄霸所为。这是因为历史是科学，戏剧是艺术，历史与戏剧的社会功能不同，要求标准各异。同一历史人物，史学家和戏剧家就可能各有各的聚焦，关注的话题自然也就不同。

观众的好恶，决不是评论家或某些卫道士所能左右的。当权者可以决定某部影片能否上映；上映的影片，他却无法决定其收视率。1993年台湾拍摄古装剧《包青天》，没想到播出后大受喜爱，由15集短剧一变而成为236集超长剧，在港台曾创收视纪录最高点。此剧卖到内地，同样受到观众的青睐。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清官戏何以能有跨越时空，征服观众的魅力？有的说，应从观众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中寻求答案；有的说，应从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祖先崇拜、英雄崇拜、“人神”崇拜研究起。

近些年，人们在探讨“人治”和“法治”问题时，对“清官”又有了许多新的议论。

学术讨论何以变成政治大批判

清官问题讨论，本是一个普通的学术问题；清官戏演了几百年，吴晗的《海瑞罢官》也问世多年，何以姚文元的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就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多少政治家、史学家，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笔者只想从回顾某些历史过程，探索学术讨论变成政治大批判的轨迹，以利记取历史

教训。

(一)政治权力的介入。1959年初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看湘剧《生死牌》,戏的结尾处出现了海瑞。毛泽东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胡乔木邀明史专家吴晗为《人民日报》写了关于海瑞的文章,后来京剧艺术家马连良等又找吴晗写有关海瑞的剧本,这便是《海瑞罢官》一剧的由来。这本来是一件平常事,文章也罢剧本也罢,有多么大的看法不同,尽可摆出来,在平等的讨论中切磋琢磨,探求真理。但是,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激怒毛泽东后,毛又说了这样的话: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

善于窥测方向的江青,1963年就向毛泽东提出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1964年康生也向毛泽东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并最早提出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话。

1965年11月10日,江青一手导演的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12月21日毛泽东在和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关锋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并说:“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便明白无误地把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彭德怀庐山会议上的“反党”联系起来。

问题性质已经“钦定”。拿到“尚方宝剑”权倾一时的江青,因为胸无真理,仍然处于色厉内荏状态,她还企冀更多的权力介入。据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刘志坚后来的回忆,姚文元的文章全国报纸奉命转载后,共鸣者仍然寥寥,相反,许多大学教授据史驳斥,为吴晗争辩。1966年2月2日江青在上海接见他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六人时(张春桥在座),江青耸人听闻地说:“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

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江青在接见中,几次露骨地说:“我们没有什么权,说话没有人听,我要借用林总的力量,要搬尊神。”

江青搬尊神的直接结果,便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台。当时的红旗杂志就此发表的社论称,“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它是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由江青提出,陈伯达、张春桥阐述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流毒全国,也不知有多少善良的文艺工作者,丧命于这一错误的论断下。

历史无情。不择手段,借助外力,并没有增加江青一方的砝码,最终在真理面前一败涂地的是江青。

(二)工农兵参加大批判。发动工农兵参加大批判,不仅明确无误地传达了这场斗争的政治性质,而且显示了发动者依靠群众运动夺取斗争胜利的坚强决心。

人们对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记忆犹新,一篇《工人说话了》的《人民日报》社论,吹响了举国讨伐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的号角。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说话了,看谁还敢再来“喊喊喳喳”。

1965年是1957年的翻版。据上海图书馆编



批判邓拓大会

印并公开发行的《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显示,1965年11月29日《文汇报》加按语发表一个版的读者来信,要求讨论《海瑞罢官》问题,12月6日《解放日报》又发表《〈海瑞罢官〉的讨论逐步展开》的报道,上海的这两家报纸带头煽动社会舆论,把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从学术批判直接引向政治批判,从学界的学术论争引向社会的政治斗争。进入1966年后,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的文章逐月增加,3月,《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开辟“工农兵群众批判《海瑞罢官》”专栏,并置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口号下。5月,以“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广大工农兵群众奋起锄毒草”专栏,取代“工农兵群众批判《海瑞罢官》”专栏。

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工农兵口诛笔伐,驰骋在神圣的学术殿堂。十年来的闹剧过后,有人作如是评论说:鼓动工农兵参加学术大批判,与其说让工农兵享受了一时的非分的光荣,不如说实际上让他们承受了不应有的罪责。

(三)逼迫舆论界就范。由江青、张春桥精心策划,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抛出后,在最初的近20天里,虽陆续有省级报刊转载,但反响并不强烈,特别是首都各大报刊多按兵不动,观望等待,表现出舆论界对多年来搞过火大批判的厌恶。11月29日、30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被迫分别转载姚文,但《北京日报》加按语,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人民日报》安排姚文时,放在了“学术研究”专栏内,并在按语中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吴晗

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

4月形势急转直下,4月1日张春桥发难,诬蔑由彭真领导起草的主旨是反对将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的《二月提纲》有三条罪状。4月2日开始,首都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要害”的文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横遭批判,舆论的公平和公正荡然无存。

平反昭雪并非完满的结局

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序幕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1978年11月开始,许多报刊发表文章,为《海瑞罢官》平反,清算文字狱,在心平气和的讨论中对“清官”给予历史的评价。1979年初,《海瑞罢官》重新搬上舞台。彻底平反的一系列组织措施接踵而至:因“海”剧和其他清官戏受“四人帮”迫害、打击和株连的,一律给予平反,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不实之词统统取消,蒙冤而死的,为他们举行“迟到”的追悼会……

彻底的平反昭雪,并非是最完满的结局,在学者们看来,扬眉吐气,只是个感情的问题;一纸结论,也只能管一时一事。他们希望的是,彻底地梳理过去,真正记取历史的教训。

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关于“批判”与“大批判”。

阶级属性是由经济和政治地位决定的，知识领域的阶级划分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其知识具有普遍真理性质，为各个阶级所认同；社会科学虽有所不同，但其中也包含有与自然科学相类似的真理性知识，能为任何阶级借鉴。所以，且不可草率行事，把某一种学科或某一学派的某种观点，随便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给以否认，给以打倒。至于人们所以对一个学术问题持不同观点，和各人不同社会地位、世界观、价值取向、知识面、专业造诣等等有关。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谁的观点更为接近真理，应由科学实验、平等的学术讨论来解决；强求其统一，或粗暴干预，外力决定孰是孰非，都是错误的。

但是，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许多学科，对各种人物、各种观点进行过许多批判，总的看来，其负面影响均大于积极的影响。这是因为，批判对象均为某位领导或某一领导机关所决定，“是”“非”是事先判定了的，被批判者即被讨伐者，只有“聆听”“批判”的份儿，没有申辩、反驳、反批评的权利。这样的批判，即使出发点是正确的，也难以收到积极的效果。何况更多的批判是颠倒是非、混淆了敌我、伤害了同志的。

互为因果，这种消极因素的不断发展，又导致了批判的不断升级：文化批判伴随的是政治批判；学术领域内的批判，扩大到工农兵参加的大批判，把工农兵群众推到了被愚弄、被利用的地位。

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全民的大批判变成了全民的大灾难，这便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写照。痛定思痛，人们重新审视“批判”一词的含义。周扬说：“批判一词原是德国古典哲学使用的术语。按其本义所谓批判指的是对旧形而上学的各个范畴加以重新的衡量和估价，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从未经过追究的既成范畴去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究竟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和效用。”中国古典文学著名学者李长之说：“批判本身的意思就是分析、评说，是个无论是‘是’还是‘非’都作出判断的中性词，远非令人赋予它新内涵后理解为‘大批判’

之意。”经济学家孙尚清则明确地呼吁：“我们应当像宣布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那样，明确宣布今后也不再搞学术批判运动了。过去搞学术批判运动，实际上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学术领域的表现，后果十分严重。”

他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关于政治和学术的关系。

由于政治的粗暴干预，抹杀学术固有的特点和独立价值，以大批判取代学术上的争鸣，搞得学术界百花凋谢，一片荒芜。既是党的高级干部又可称之为学者的邓拓，“文革”前一直主张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通过百家争鸣，进行自由讨论，在争鸣时“应该畅所欲言，不要有任何顾虑”，并认为“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可以区别开来的”。他在《人民日报》总编辑和北京市委书记任上，确也身体力行做过非凡的努力，但是“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他首当其冲，留下“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遗憾。

如何避免这悲剧的重演，把政治和学术的关系摆正呢？

哲学家邢贲思在探讨“多年来双百方针没有真正贯彻的根本原因”时说：“不应从学术、文化领域本身中去找，而应从政治生活中去找。没有真正的政治民主，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民主。”中国哲学史专家张岱年认为：“政治民主是实行双百方针的前提”，他说：“实践证明，没有政治民主，就一定不会有学术民主。过去常常搞学术批判，一有不同意见就批，一批，又往往变成敌我性质，这是受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老传统的影响。”

历史学家黎澍则认为，“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是一个人人都认为解决不了的大难题”。他甚至说：“要求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也就等于承认在学术问题上有言论自由，在政治问题上就没有言论自由，这不是公然违背宪法吗？”在黎澍看来，“学术自由，是保证学术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而“政治民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条件。

对于这个问题，1986年8月15日，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能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不改革这个概念,就会认为只有学术问题可以争鸣,政治问题不可争鸣,而这两者又经常分不开,一旦出了问题,即使是学术问题,也就变成政治问题,一股脑儿挨棍子。其实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确实是很难分开的……”万里接着说:“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他还说:“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

呼吁厘定学术讨论规则

鉴于历史教训,既要参加学术讨论,就要有共同遵守的规则。学界多年来不断发出厘定学术讨论规则的呼吁,择其要者,最少有以下几点:

(一)要有追求学术真理的共同目的。20世纪30年代,楚图南便写过一篇学术辩难应有的态度的文章,他认为首要的一条是“辩难者的双方都有同一目的”。半个世纪过去了,经过建国后的风风雨雨,人们更痛切地感到,要促进学术进步,真正实施“百家争鸣”的方针,参与学术研讨的各方,都应抱有追求真理、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目的。目的相同,即使主张各异,也能彼此理解,彼此尊重,彼此学习,从而彼此进步。把追求真理作为崇高的目的,便不会在学术研讨中以人划线,搞党同伐异。不因辩论对手关系的远近亲疏,而歪曲主观的见解和客观的实际。即便是自己的老师,也要如苏格拉底所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二)要坚持讨论问题的明确性。讨论的问题的明确的定义和清楚的阐述,划定讨论范围,界定与其他问题的相互关系。这不仅是深入学术讨论的需要,也是保护学术研讨参与者本身的需要。不同的论域,自有不同的要求,乃至不同的判断问题的标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不能混淆,不能在辩论中断章取义,深文周纳,故人人罪;也不能在论题之外“作文章”,对辩论对手进行人

身的攻击和伤害。

(三)要实行双方权利对等的原则。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参与学术辩论的双方,有同样的发表意见的权利,既有你的批评权,就应有人家的反批评权。大家都认为判断学术是非的最好的方法是交付公论,“公论”就不能允许任何一方居高临下,以势压人,把平等的讨论转化为一方对一方的批判。学术标准是学术论争的最高准则,不应有其他尺度。不能根据某一权势者的好恶,作任何学术讨论的裁决。正直的学者厌恶在科学、学术范围之外去寻找自己学术观点的支持者。他们呼吁,名人政要,资深学者,不要在自己不熟悉的、非本专业的学术问题上,轻易表态,充当裁判;新闻舆论,对于学者问题的争论要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不故意炒作,推波助澜,更不能凌驾于学术讨论之上,把持舆论,搞一言堂。

(四)不能强制统一思想,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我们承认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相对的,谁也不能说自己已经穷尽了真理,科学反对任何武断。基于这样的认识,一些学者提出了“学术民主”的口号,而另一些学者如历史学家黎澍则主张以“学术自由”来取代“学术民主”。“学术民主”与“学术自由”解释各有不同,见仁见智,哪个更为合适也可暂且不论,但有一点大家认识是一致的,即在学术问题的论争中,不能强制统一思想,搞集体表态。极言之,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这里是不能用的。不仅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还应该特别强调保护少数人的意见,“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的话,用在这里是合适的。丁肇中教授在北大一次演讲中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的例子,特别说明在自然科学上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尤其是物理。主张保护少数,反对对不同意见的挞伐,目的是防止真理在多数人尚未认识到的情况下被扼杀。

厘定学术讨论规则是学界的强烈愿望,尽管学术讨论规则不可能具有体育竞赛规则般的可操作性,但进行这方面的讨论,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先取得共识,逐步“约定俗成”,付诸实施,便可成为正常开展学术讨论的重要保障。

(责任编辑 程 度)

编者按：著名社会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教授的事迹，本刊曾有多篇文章论及。这篇《马寅初：决不向不以理服人的批判者投降》，着意写马老坚持真理、捍卫学术尊严的品格，读来令人震撼：从那个时代一同过来的我们，能够做到马老的几分？

马寅初： 决不向不以理服人的批判者投降

● 张锡金

1958年春，反右派斗争刚刚过去，新一轮政治运动的序幕又渐渐拉开。在北大校园里，陆续出现的一些大字报的矛头指向年近八十的马寅初。马寅初作为一校之长、著名的党外人士，逃过了反右一劫，他的一些同事、朋友甚至包括他的一些弟子被批判，或者戴上了右派的帽子的痛苦记忆，还深深地留在他心里。

大字报再度出现，马寅初决定选择主动。3月21日他贴出大字报作自我批评，检讨1957年4月讲话中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某些提法的错误。但是，出乎意料，他的自我批评被人揪住不放。3月26日经济学系主任贴出政治色彩浓浓的大字报，指责马寅初的《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在本质上是为了资本家阶级利益向党和国家正确地执行和平改造资本家的办法表示不满”。

3月29日经济系二年级10个同学具名的大字报，批评他们访问马时，马寅初在指导他们如何学习和研究经济学，宣传了“个人主义”等观点，是有意识地引导他们走向“歧路”。

大字报写道：“马老说他先后到过英美，并且能说会写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等五国外文。……马老的谈话在我们班的影响确实不小，立即有些同学就大干特干地学外文，有的双管齐下，既学俄文又学英文；有的还想放弃俄文去学英文，不少人要求系里多开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等等。总之，这次访问使不少同学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轻视社会主义经济学，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放松对自己的思想改造。马老身为校长，有这样严重的资本主义教育观点，

怎么不对同学起坏的影响？红与专的问题，两条道路也是马老必须彻底解决的问题，否则将把我们引向歧路。”

马寅初十分重视学生的批评，这不仅仅是恪守为师之道，也是一种民主、平等的作风。4月1日马寅初在《我对经济系二年级谈话的内容》的大字报中，对同学们提出的质疑作了解释：“我认为北大的任务是培养做研究工作的人和教学人才，要做研究工作，非要学一种或二、三种外文不可，否则决不能与懂外文的人比赛，他们的研究能力就大大地受了限制。”“在谈话中发现他们连一国的外文还没有掌握，我听了吃了一惊。他们终日忙于写笔记、抄笔记、对笔记，外文的参考书和杂志一本也不能看，我就想到这倒是他们的莫大的缺点，所以，我劝他们快快学外文，至少一国的外文，要继续地学，绝对不可间断……我开始学习俄文时已71岁了，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学会。我的目的，就是要勉励他们，学习要埋头苦干，否则不会成功的。我的讲话是出于至诚，对我的学生讲心里话。想不到他们自另一角度看问题，说这是我要表达我的天才，我要在他们面前表示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是崇拜资本主义的人，他们从谈话中所得的只是我的三大主义，这些话真是令人痛心。”

阴影一步一步地逼近马寅初

195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这一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陈伯达到北大讲话。陈伯达说：北京大学的老教授大体上

有两个包袱，一个是受中国封建思想的影响，另一个是受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时代的教育。“现在我们在学术界中的任务，就是要向工人、农民学习，在共产主义思想解放的大旗下，对于资产阶级的、各种市侩式的观点和思想，进行坚决的、切实的批判。”例如，要批判实用主义、马尔萨斯或新马尔萨斯学说，等等。（《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

陈伯达的讲话，虽然没有公开点出“马寅初”三个字，但是，马寅初的名字是呼之欲出的。它为北京大学掀起批判马寅初等一大批老教授的恶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作者们把焦点集中在“新人口论”上，而且总是牵强附会地把他与西方资产阶级人口学家马尔萨斯挂起钩来。他们并不在于理论阐述，而像有意识地与人“抬杠”一样，特别地强调人口多的好处。他们说：“马老对于中国的六亿人口是缺乏感情的。他总是觉得六亿人口给国家带来无穷的灾难……但是，我们并不是像马老那样来理解问题的，我们完全知道，只要把六亿人民充分发动起来，组织起来，那就会像原子核爆炸一样发出无穷的热和光，将在最短期间完全改变中国的面貌，最近全国沸腾的气壮山河的大跃进形势不是科学发展的绊脚石，相反的倒是一种巨大力量。”（《马老否定了实现

科学规划的可能性》）

在《马老是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大字报中说：“马老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是马尔萨斯主义者，我们也诚诚恳恳地希望马老不是马尔萨斯主义者；可是马老在他的大作‘新人口论’里确实确实传播了马尔萨斯的理论……极其广泛地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阐明马尔萨斯的基本精神。只要看一看每一节的标题就明白了。依马老看来：假如不‘控制人口’，农民就要‘失意和不满’，因而就会‘影响工农联盟’；‘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化的推迟’，就要‘拖着科学研究的后腿’，‘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这一崇高愿望，也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才不难成为现实’……一句话，马老把中国人口众多完全看成是一件大坏事！这难道不是道道地地马尔萨斯观点？”（《北京大学校刊》）

类似这样的大字报随处可见，其共同点不外乎纳入这样一个公式：“马寅初——马尔萨斯”。

作为一个爱国的学者，马寅初认为能把自己的智慧和才华贡献给祖国和人民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因此，他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并非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一位知识分子为了中华民族兴旺发达而努力献计献策的表现。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后，马寅初曾三次到浙江调查研究人口问题。

1954年，他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往浙江视察，风尘仆仆地跑遍了十个县市约20个农业合作社。经过三年的调查，他发现中国人口增长率实在太高，每年增长千分之二十以上；每年净增人口约1300万。1955年，他根据浙江、上海等地的调查材料为切入点，分析研究其他省的资料，又参照研究外国资料，写出了一份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马寅初思考缜密，先将发言稿交浙



马寅初就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时，北大师生前来祝贺

江省人大代表小组讨论征求意见。有的代表认为,虽说这种观点与马尔萨斯不同,但其思想体系恐怕难免仍旧落到马尔萨斯的窠臼里。他听到这些意见后,感到此时的气氛还不宜讨论这个问题,便主动地把提交大会的发言稿撤了回来。但他并不气馁,而是继续调查研究,利用一切机会与各方面专家、学者就人口问题进行磋商、恳谈,为人口问题的提案作更充分的准备。1957年3月2日,马寅初终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控制人口”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理论观点。

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就中国人口问题作了一次学术演讲。6月,他以这次报告稿为基础,进行加工整理,写成书面发言稿,作为一项提案,提交第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此发言稿于1957年7月5日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他向人们大声疾呼:“人口多,资金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矛盾”,“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问题若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和不满”。在颂歌盈耳的年代里,他的言辞是那样的尖锐,又显得如此逆耳。但是,这正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忠心耿耿的生动的表现。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报告”的权威性无疑将马寅初置于反对党与社会主义的地位了。

“拔白旗”运动犹如一场飓风席卷神州大地,随着政治形势出现的变化,理论界不少人明显地向政治家一边倒去。马寅初对于被扣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帽子不断地申辩,甚至于不得不从基本的常识讲起。(参见马寅初《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5期)但在那“舆论一律”的年代里,又有谁去理会他的申辩呢!政治斗争的需要如同一根魔杖,它的“伸”与“缩”改变了一些人的基本的良

知,把学术问题转变成政治问题,将马寅初与马尔萨斯捆绑在一起,既可以使自己有了可靠的政治背景,又可以以此压倒对方。于是,马寅初就被一些人宣布为一面“白旗”,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

如果说,学生的大字报还止于标语口号式的呼叫、呐喊,那么,一些有理论素养的学者、专家在撰文批判马寅初时,也总是背离学术讨论的“游戏规则”,即不顾学术讨论的评价标准、可用资源等,不去从学理上进行论辩,只是一味地将政治直接移入学术,将学术变成政治,从政治上扣帽子,就可见马寅初在这场辩论中的命运要承受沉重的磨难。

《人民日报》1958年6月6日发表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一文中说: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说的话,与右派分子的话是一样的,是站在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是一种悲观主义。“我国人多,虽然有困难,但是好事。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大跃进,我国人民的就业,有着更加广阔的前途。不但如此,依靠我国丰富的人力,我们可以创造奇迹,可以做出更多的想象不到的伟大事业!对于我国人口多、增殖快的一切悲观论调和谬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经济研究》1958年第11期发表的《评马寅初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立场》一文说:“在人口问题上,我们同马寅初的分歧在于:马寅初说人口多,消费多,人民生活无法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出路;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人愈多,就愈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愈能促使社会生产力高速度发展,就愈能促使国家的物产丰富、兴旺强盛,使人民群众的生活优裕、文化提高,而这些正是过渡到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必备的条件。”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受到批判的同时,他于1958年2月出版《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也受到无端的批判。在《经济研究》1958年第10期的《评马寅初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庸俗经济学观点》一文中,给马寅初的这本书作了三条政治性的结论:

“(1)马先生的资产阶级立场还很深固,这在《新人口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此外,在马先

生的《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中也表现得很突出，他在那里用歪曲事实的方法，替资本家叫喊‘无权无利’……(2)马先生对他过去所学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那一套破烂东西，还未清算，而且恋恋不舍，嗅不出自己身上还有浓厚的陈腐气味，这在‘新人口论’和‘综合平衡’论中表现得都很明显；此外，在马先生对凯恩斯学说所作的批评（实际是欣赏它仍然有用）中，也不时透露出来。(3)马先生的哲学观点是唯心的，治学方法是庸俗的（不从现象深入到本质）。他的‘团团转’论是客观事物的表面联系的任意反映，是用来歪曲和认识事物的内在联系的一种工具；以‘团团转’论为基础的‘综合平衡’论，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任意描画，是一批杂乱无章的经济资料的人工堆砌，它以叫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为掩护，实际是否定这个规律。所以，包含以上的各种严重错误在内的马先生的那本新书，是反马列主义的，是一株毒草，我们必须把它拔掉！”

对马寅初的批判显然是按照上级制定的方案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1958年初《光明日报》开辟专栏批判马寅初，《文汇报》、《北京日报》、《新建设》、《经济研究》等全国性报刊，都陆续发表文章。而北京大学一些人对马寅初的批判则是打头阵的。1958年初，经济学系的十多位教师成立一个人口理论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许多批判文章，就是以“北京大学经济系批判马寅初小组”的名义发表的。

作为一位教育家的马寅初，此时此刻身处逆境，但他所思考的不是个人的前途、命运，而是教书、育人的使命。早在1951年6月1日他在北京大学发表的就职演说中即提出，全校师生要“以团结一致的精神发扬北大的光荣革命传统，保持学术地位”。为了保持北京大学的学术地位，他身体力行，钻研学术，捍卫学术的尊严和独立性，无私无畏地进行斗争。过后他坦然地说：“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人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

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了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生命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见《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5期）

头戴“白旗”帽子的马寅初基本上是靠了边，成了一位挂着空名的校长。1959年9月5日，毛泽东召集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论述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公诸报端，在北京的最著名的五大高校负责人中，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孙晓村，唯有北京大学的校长马寅初由副手陆平代之。在讲究政治待遇的特殊年代里，一个人是否出席某次会议往往是解读其政治命运的一种密码，人们从中不难明白马寅初的政治命运已定，他离开北京大学的时间已经排在日程表上了。

北京大学把对马寅初的批判不断地推向高潮。1959年12月24日，“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召开大会，由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师作了《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报告；28日，“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举行大会，由经济系教师作了《批判马寅初团团转综合平衡论》的报告，每一次会议都有8000余人参加。

狂风之下，小草随风摇摇摆摆，惟有大树岿然不动。1959年12月25日，马寅初在《北大校刊》上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他声明：“我虽然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马寅初没有退却，以学者的高贵的人格捍卫了“新人口论”。1960年1月，他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结束在北京大学将近十年的教育工作的生涯。马寅初重返北京大学，并荣任名誉校长，那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被颠倒的事情都颠倒过来之后的事了。

（责任编辑 洛松）

胡耀邦是怎样做中宣部部长的

● 郑仲兵

胡耀邦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命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同时,兼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年零两个月。那是“扭转乾坤”的日子,也是中宣部工作朝气蓬勃的时期。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当时的中宣部一改旧观,成了“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知识分子之家”。我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虽属短暂,但他那顺乎时势人心的政略,开阔深邃的思想,坦荡宽大的胸怀,率真热忱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是我享用不尽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任职中宣部是历史的选择

1976年10月12日,“四人帮”落网的第六天,胡耀邦即通过叶剑英元帅向中央晋言,“中兴伟业(叶剑英语),人心为上”三条:“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这实际上是他酝酿已久的治国方略。

1977年3月,党的十一大,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充分利用党校的阵地,迅即着手拨乱反正工作。一方面他坚决废止传统的教条主义的学风,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提出“四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不装袋子(不入档案),通过党校思想理论学习研讨的洗礼,训练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敢于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高中层干部和思想理论战线骨干;另一方面,直

接抓理论研究室,并以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为基地,联络《人民日报》,积极着手组织校内外理论队伍,亲自策划指挥撰写了一篇又一篇拨乱反正文章,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中绝大部分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引起强烈的回响,尤其如《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人民日报》1977年10月7日)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两篇文章,事实上成为平反冤假错案、全面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主政中央组织部。他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的大力支持下,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

刚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真正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生活的又一次伟大历史转折。

三中全会坚决批判并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流毒,消除“关



胡耀邦与夏衍在交谈

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影响,深入进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适应改革、开放、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便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历史任务。

但是,当时在思想理论界还有相当数量的同志,特别是一些身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同志,“思想上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脱离实事求是的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见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甚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纯属马列主义常识的问题上,他们也表示不能接受,把这种正确认识说成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

此时此刻,由谁出任中宣部长,自然地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历史抉择了。

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

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消息传来,中宣部和宣传系统的干部以及广大知识界的朋友,无不奔走相告,激动不已。

1978年12月29日,胡耀邦到钓鱼台中宣部驻地报到,并与13级以上干部见面,谈了施政意见;12月31日,胡耀邦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

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和大家亲切会面,并即兴作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三天后,又在钓鱼台17号楼会议厅和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见面。

胡耀邦在中宣部亮相的过程中,介绍了中央对中宣部长人选考虑的过程;评说了过去两年思想理论界的形势和一年多中宣部的工作;阐述了自己对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和近期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耀邦说,“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现在要首先考虑的最大的问题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就不会迷失方向,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耀邦强调“重点转移”,反映了他的决心和远见。在他看来,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变,没有对这一“转移”的必要性、必然性的正确认识,一切宣传工作的所谓“转变”,都只能流于空谈。

耀邦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或尽可能走在前头。”

为此,耀邦强调了三条:一是认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钻研理论业务;二是认真面向实际;三是认真解放思想,树立好的学风。在这看起来是“老生常谈”的三段式里,耀邦都有“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

耀邦呼吁“对那些打着马列毛的旗号招摇撞骗的,要揭穿,要斗争”;同时“要防止讲大话、讲空话、讲套话,并同这种心理、精神状态作斗争”。

耀邦强调“面向实际”，就是“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面向党内党外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面向过去、现在、将来我们所走道路的经验教训的实际”。

讲到解放思想、树立好的学风时，耀邦感慨系之，十分动情，说了许多话。耀邦认为，思想理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有其自身规律、自身特点，必须予以十分尊重。他说，这正是为什么三中全会要重申“三不主义”的缘由。

耀邦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容易犯错误，所以对做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同志，特别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动不动把人家的意见、创作、言论一下子砍掉……不要搞无限上纲，不抓只言片语，不抓什么影射。”

耀邦愤然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这种恶劣作风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我们反对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耀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从根子上把党内乱打棍子的现象打掉。必须把我们的党风搞好，用讨论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全党宣传战线的同志首先带这个头。”

最后，耀邦提出近期宣传工作要解决的15个具体问题，其中包括，关于三中全会的宣传工作；关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筹备安排问题；关于继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关于理论上的禁区、枷锁要破问题；关于坚决实行少宣传个人的方针问题；关于宣传战线、首先是宣传部门如何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促进派的问题等等。

1979年1月6日至11日，耀邦又主持召开了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他在1月11日举行的闭幕式上兴奋地向大会宣布：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宣部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已得到批准。“此报告中央主席、副主席都圈阅了，将作为中宣部文件发给全党。”全场为之一震，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耀邦还郑重地说：“有一条可以说清楚，党中央讲了好多次：离开社会主义建设一刀切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我们今后不搞了。以前搞一个失

败一个。离开繁荣富强，搞什么政治斗争，不行的！”全场爆出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这次会上，耀邦谈到干部学习问题时说：“一千七百万干部怎么学习，要因地制宜”，笼统地提学习马列毛著作是“不完整的”。他说：“做党的工作，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不学马列不行”，但也要“学习科学”。做经济工作、科技工作，或其他专业工作的同志，主要是学习有关的业务科学技术，当然“也要学点马列”，用学习总时间的“六分之一”就可以。“不要不分情况，光强调学马列毛，这行不通、不实事求是。”

在座谈会结束时，谈到回去后如何传达会议内容时，耀邦面带微笑地对台下宣传部长们说，这是一次座谈会，怎么传达都由你们做主。传、不传，怎么传，都不犯错误，请你们自己定。总之上下之间，左邻右舍的关系，不要搞得那么紧张、森严，以后，中央部门和地方的关系，相互之间，都不要搞得那么刻板、森严。

耀邦就职的亮相和讲话，在中宣部和整个宣传系统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

时任理论局局长的洪禹，1938年到延安，长期从事宣传工作，解放后就在中宣部任职。他深有感触地说：“建国30年来，中宣部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意识形态的检查署，中宣部的干部也成了大大小小的思想检查官。似乎中宣部的职能就是管、卡、压。回首往事，教训实在深刻。我以为，要讲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首先就要对历史上中央确定的中宣部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进行拨乱反正。我们十分有必要把30年来搞的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政治运动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与总结，并做像样的拨乱反正工作。现在耀邦同志来到中宣部，几次讲话，事实上吹响了对中宣部，即意识形态工作拨乱反正的号角，我们一定不能等闲视之。”

在理论务虚会上疾呼冲破禁区 解放思想和风细雨团结同志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后的第一个重大行动。这次由中共中央出面（通过中宣部），汇聚这么多理论精英和专家于一堂，以实践为标准，开诚布公，畅所欲言，自由地研讨

有关中国前途与命运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会,实属创举。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缘起要追溯到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白热化时期,当时,中共中央叶剑英副主席在中央常委会上,建议开一个理论方面的“务虚会”,专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统一大家思想。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时也说:“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谈,免得背后讲,这样好。”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明确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叶帅也在会上讲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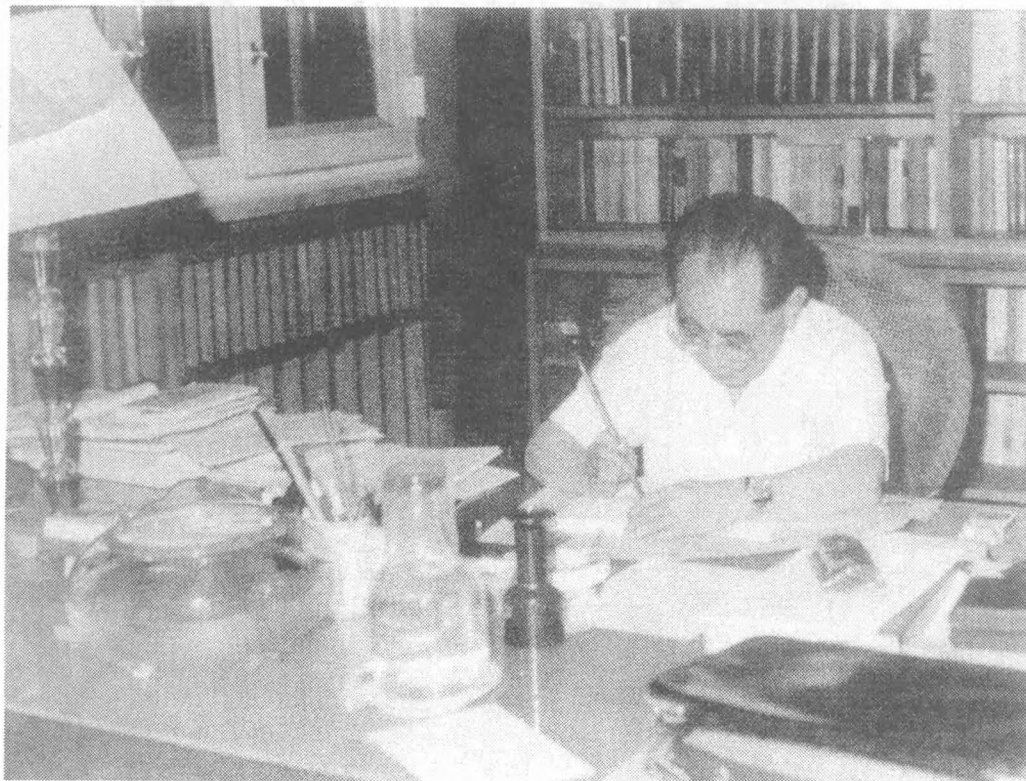
华国锋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上的责任。

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很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认为,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胡耀邦对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自我批评是肯定的,他强调,召开理论务虚会,不能重复“大批判”的错误,要“只换思想不换人”。但是,耀邦十分清楚,为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和为现代化服务的目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扩大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思想成果,进一步确立以实践为标准,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解放全党全民的思想,深入拨乱反正。

从1979年1月初开始,耀邦紧锣密鼓地进行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组织筹备工作。为了实践他的把这个务虚会开成“转化”、“团结”会的思想,在大会领导小组成员构成中,耀邦坚持安排两名中央工作会议中受过批评被认为是“凡是

派”的代表人物;把曾经反对过真理标准讨论并有影响的同志都邀请入会。耀邦反复强调,坚决执行“三不主义”、和风细雨、各抒己见、自由讨论的方针,会上会下“不搞大批判”,“不搞点名批评”,提出:“为了畅所欲言,所有的会议记录、文字等都由自己定稿,不审查。”



胡耀邦在工作

1979年1

月7日,耀邦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并将起草好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和会议通知草案报送中央。耀邦在信中写道:

理论务虚会的开法,我考虑了一个初步设想,先请在京的理论工作者二百人左右,一月下旬或二月初开会,开二十天左右。然后休整几天,向中央汇报。再请各地的理论工作者二百人左右共四百人左右,再开十天左右。第一段会,主要是大家讨论,小组座谈和大会发言相结合,让大家把思想敞开,畅所欲言。

第二段会,想请国锋同志、剑英同志、小平同志讲话,引导大家集中讨论解决思想理论战线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先民主,后集中,把思想统一起来,促进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的理论工作做得更好。

华国锋主席和邓小平副主席都表示同意和支持。(叶剑英和李先念不在京)华还答应在会上讲话。

1979年1月18日下午,理论务虚会的第一段(又称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务虚会),以中宣部、中国社科院名义召集,在北京友谊宾馆科学厅拉开帷幕。胡耀邦主持会议。他的《引言》和讲话,在会内会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令人“提神儿”(耀邦常用语)的是,他第一次引述了毛泽东讲过的两段话:

一段话是1965年底,彭德怀同志分配到三线当副总指挥,毛主席请彭老总吃饭,主席对彭老总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第二段话是1968年10月14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我亲自听见的。这天下午一点钟,主席讲了几句话后问我们:“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没有反应。毛主席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毛泽东的这两段话耐人寻味,胡耀邦引述这两段话更有深意。意思是说,历史上的是非,只能“由历史做结论”,这是历史实践使之然。毛泽东尚且如此,在“文革”宣布结束,三中全会也已开过的今天,人们有什么理由还抱着“两个凡是”而诚惶诚恐,还不敢尊重实践的检验,打破禁区、解放思想呢?

会议开始不久,刚从邓小平家回到会场的周扬又传达了邓小平对务虚会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更加使与会者心情舒缓,敢吐净言。

1月22日,耀邦又向大家传达了邓小平对会议的几点意见:

要敞开思想谈。真理标准问题还有多少谈的,可以谈得快些。理论问题很多,没有说清楚。例如:民主、法制问题,经济管理问题。“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谈,是否采用那种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也可以讨论。今后不要提“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应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耀邦根据各组汇报的情况,结合小平的意见,又归纳出若干问题,建议大家深入思考研究。如,怎样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党的基本路线是怎么来的;建国以来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对“文化大革命”的估价——“文革”性质、要求、教训等;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从十月革命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好,民主是集体的行为;康生问题——他究竟是马列主义理论家还是假马列的骗子,或是一个棍子;突出宣传个人问题;对马列毛能否一分为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

耀邦再三强调:“这次会不强调什么人都检讨,不开成批判人的会。检讨也可以,但要讲出道理来。”“敞开思想谈,三不主义,但不要向外扩散,使用的材料一定要准确。”

1月27日,邓小平听取了耀邦等关于务虚会讨论的汇报,要求会议讨论民主问题,并写出文章。他说:十月革命后60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与发展。

胡耀邦认为,邓小平这次讲民主的观点比较彻底,非常重要。他要求文件起草小组,把它加以发挥,写进邓、华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讲话中去。

务虚会的第一段,从1月18日一直到2月16日休会,整整开了30天,超出预定时间十天,会越开大家兴味越浓。期间,许多省市也开了本地区的务虚会,做到上下呼应,此起彼伏。在总



胡耀邦会见华罗庚(中为胡克实)

集中到对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的看法上。从外传来了这样一类的顺口溜：“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思想混乱；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社会秩序混乱；落实政策过了头，引起阶级关系混乱；重点转移过了头，丢了纲和线。”

1979年1月2日，华国锋找耀邦和乔木谈“注意当前社会上的政治动向问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宣部顾问胡乔木，在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谈话的内容。

结这段会的收获时，代表们认为：“这次会议是30年来理论战线上最生动活泼的一个会议，大家敞开思想，冲破禁区，说真心话，说实在话，对长期以来未能触及而影响很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敢于发表意见，这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可喜现象，也是理论工作开始富有生气的实际体现。”

充分肯定思想解放的大好形势 继续反“左”不戴帽子不反右派

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务虚会召开以后，国内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一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二是，思想的解放，激活了30年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形成对各级政府的重大压力。三是，中美建交后对外开放的局面更加扩展，引起社会思想、行为（尤其是青年人）的诸多变化。四是，农民自发创造的“包产到户”，在全国各地蔓延，打破了人民公社的基本体制。五是，中苏冲突和对越反击战，并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程度的震荡。

究竟怎么看待这种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举国上下反应是各异的。而且问题的焦点

接着说，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有的地方闹事了，也是一种潮流，对现实生活不满。西单民主墙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我们要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现在，中美建交了，北京成为一个国际城市。对资本主义如何认识，问题很大。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现在的情况，很多和1957年初相似。那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结果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对于另一种倾向，我们要考虑到。现在的形势比五七年初复杂得多。

乔木讲完后，耀邦补充说：“华主席特别要求，掌握全国的政治、思想动态，看出总趋势……现在形势很好，不要使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颇有意味的是，华国锋特别强调说：“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

务虚会第一段结束后，在形势发展和变化面前，在来自各方面压力之下，耀邦也显得处处谨慎了，而且经常把“慎重”二字挂在嘴边。但他对三中全会精神和历史意义，对理论务虚会成果的高度评价，从没有含混过。对这时出现的种种责难也做到了泰然对之，冷静处之。

3月18日下午，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耀

邦郑重评价：“理论务虚会开得很好，要充分肯定。”同时，他也冷静地对这个会提出一些批评：

既然大家同意意识形态容易犯错误，可在批评别的同志时太尖锐了。“凡是派”的帽子到处套，这不好。两年半前，把咱们打成“走资派”，谁也不舒服，现在人家就舒服呀？戴帽子的事，千万不要干。

（会上）很多意见是个人意见，讲出来当然好，可不是中央定论。结果现在传得很开很广……理论务虚会对一些同志的批评没有核实。有些同志发表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但不是中央的定论。

对于有人攻击务虚会“把思想搞乱了”，以及一些领导层人物为之惊惶失措，耀邦则给予十分理智的针锋相对的回答：

最近有同志说，现在是什么思想解放！现在是思想混乱，不叫思想大解放。有没有这个情况？大混乱的估计过头了！思想活跃就带来某种程度的混乱，这是正常的。活跃中间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观点，混乱，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用不着慌乱。（1979年3月18日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从三中全会到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段，一些人对报纸和新闻界责难更甚。对此，耀邦（在1979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回答说：

“粉碎‘四人帮’后，报纸、新闻起了根本变化。拨乱反正，报纸起了很好的作用，对扭转局面有巨大贡献。我们的《人民日报》，站在斗争前面，站在扭转乾坤前面，这个要肯定。这是个大账。”“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有些同志对我们报纸有些意见，突出的是认为在某些问题上不够慎重。这种意见要听，听了对我们有好处。……有些问题不能由新闻工作承担。这是讲我们中央部门，……甚至是指政治局。听一听有好处。……这不要紧张。报刊、杂志、新闻、广播、中央、省市做了大量工作，成绩要充分肯定。……我个人也做了些不慎重的事情嘛。”耀邦继续呼吁：“应着重发挥新闻战线同志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段是以中央名义召开

的，又称“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区别于第一段的“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务虚会”。

开会前夕，3月18日，耀邦在新闻工作会议上透露了第二段务虚会的安排，他说：“小平同志讲，一个省可以来三个，增加两个做实际工作的。听了小平同志报告后，各省讨论五六天就回去了，理论务虚会就算结束。”

3月28日，务虚会复会，主会场在京西宾馆，部分代表活动在友谊宾馆。耀邦在预备会上强调：“要学会科学的领导方法”。“民主是原则问题，克服官僚主义就靠民主”，“一定要尊重三中全会决议精神，不要以个人的讲话否定集体作出的决议。”

3月30日下午，邓小平来会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

4月2日下午，耀邦在京西宾馆礼堂作了结束会议的讲话。

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耀邦没有说什么话，只是意味深长地说：“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要历史的考验。实践是唯一的标准。”

最后，耀邦抑制不住激动正色道：“现在某些人说，要‘收了’，要‘反右’了，普通群众讲就算了，可是党员、干部讲就太错了。我们能糊里糊涂、匆匆忙忙再搞‘反右’吗？原来的‘反右’还没纠正过来呢！”

4月4日，延续两个半月的务虚会终于结束了。

（责任编辑 洛松 杜晋）

作者更正

《炎黄春秋》2002年第1期发表的拙作《江青复仇和扬帆蒙冤》一文，由于疏忽，两处（均见43页）误将李银桥同志错写成叶子龙同志，特此更正，并向读者和当事人表示歉意。

尹 骐

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率船回归记

● 刘 力

当前，我国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回顾历史，民族资产阶级为创建新中国也作出过重要贡献。

解放前夕，我国航运业巨头、私营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千方百计率领其沿海船队摆脱国民党反动统治，胜利回归新中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

童少生淞沪巧护船

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强渡长江，攻克南京，直逼上海。这时上海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已成惊弓之鸟，随时准备出海外逃。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出布告，指令各轮船公司在沪船只，凡能出海的均要开往台湾，不准把船只留给共产党，并随时准备破坏不能出海的轮船和相关设施。5月12日，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知照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轮船业公会招商局、航政局等单位，“即日起各该海江轮应即实施军事管理”，并指定停泊码头，向每艘轮船派驻联络军官一名、士兵半个班（江轮）或一个班（海轮）。民生公司当即有“怒江”、“龙江”、“渠江”等6艘近海轮船被强征待命；接着，刚刚修好的“民本”轮和正好回到上海的“民丰”轮亦被强行征用。

与6艘轮船被征用的同时，航行于上海至宁波之间的“民俗”轮也在1949年5月13日被宁波当地国民党军扣留。消息传到上海，留驻在上海的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焦急万分，寝食不安。恰在此时，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派人秘

密通知童少生：你们的任务就是保护船只，不要害怕，不要转移，不要破坏，共产党是鼓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这给了困境之中的童少生以极大的鼓舞。

于是，童少生立即派遣上海区公司业务部经理王化行于5月18日前往宁波交涉发还“民俗”轮事宜，并让他抵宁波后直接向总经理卢作孚汇报请示；同时，童少生还加紧部署保护尚在上海修理的几艘主力轮船和泊沪的一批驳船，他通知厂家：还在墩上的“民权”轮不要下水，尚未装机的“民众”轮暂不装机。此外，他还在每条船上准备了几百元银洋，以随时给前来炸船的国民党兵“塞红包”。5月23日国民党下了最后命令：黄浦江口内所有船只一律自行凿沉，否则将用炮击毁。

当童少生在他下榻的上海环龙路金城银行招待所内，苦苦思索着怎样保全留沪船只的时候，民生公司一位搞机务的职员韩开弟，主动到招待所找到了他。韩开弟献策说：“童总，国民党既然叫我们‘自行凿沉’，我们就在这四个字上做文章：每条船的底部都有海底凡尔（阀门），我们悄悄把它打开，让船舱进水，待船沉到一半而又不淹没轮机时，再把凡尔关闭；这样从岸上看过去，船就好像已经沉底搁浅了，检查人员一般也不会下底舱去潜水检查的。一待时局变化，只要泵出积水，船体就会上浮，那时再稍加整修，船舶立即就可启航。”“好！这办法太好了！”童少生感谢韩开弟送来了良策。旋即，他命令这位机务人员立即秘密通知各船：照此办理，严格保密。这样，民生公司滞留在黄浦江内的船舶，在职工们机智勇敢的护卫下，终于全部保住了。

王化行东海救六轮

民生公司上海区公司业务部经理王化行，奉童少生之命于1949年5月18日赴宁波向国民党当局交涉放还“民俗”轮之事，不料“民俗”轮已被武力胁迫开往定海。于是王化行立即赶到定海相机行事。

定海与宁波水上相距约50公里。此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已迁到这里，整个岛上挤满了国民党残兵败将。

王化行到定海一看，果见“民俗”轮与“民本”、“渠江”、“怒江”、“龙江”等共五只轮船都被封锁在定海海面上，互相只能以船上电台相互联系；船上数百名船员处于一无钱、二无粮、三无淡水的绝境。王化行当即将上述情况用密码向已到广州的总经理卢作孚作了汇报，卢作孚对情况之严重甚为吃惊。他以密码回电王化行，要王对被困在定海的五只轮船全权负责，一定要保证轮船和船员的安全，尽力设法摆脱目前被控局面，把船带出定海，开到安全地带去。

根据卢总经理的指示，王化行同“民本”轮船长何志全和“民俗”轮船长海礼士(中籍加拿大人)，一起商讨如何首先解决几百名船员的生活问题。当时的定海，由于人冗如蚁，物价涨得吓人，粮食根本买不到，淡水已卖到三块银元一吨。经商定，由王化行出面以卢作孚的名义去找卢的好友——国民党联勤总部高级顾问陈地球，请他帮忙为民生公司的船员弄点口粮。几经周折之后，国民党当局总算同意将民生公司五艘轮船的船员登记造册，每人每月配给25斤口粮，淡水问题则由船员们共同凑钱购买而得以解决。

接着，王化行开始实施卢先生制定的“脱险”计划。他手持卢先生的电报，去找与卢先生有旧谊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岳，电文曰：“民本”、“民俗”是两艘只能走内河的江轮，不能出海，敬请周主席代为交涉，望予放行。周岳阅后很客气地对王化行说：“卢先生的事，我一定尽力而为。”即便如此，办起来仍不容易。王化行上下奔走交涉了一个多月，官方才同意“民

本”、“民俗”两轮离开定海，但只准直开台湾，不准旁驶。王化行立即发电请示已回重庆的卢作孚，回电曰：同意这样办。因为当务之急是让船只离开定海，摆脱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下一步可到台湾后再做打算。

江轮要航海，面临着极大的危险：第一，船上没有航海罗盘，甚至连海图也没有一张，极易在海上迷失方向；第二，江轮船帮低且开口处多，在风大浪高的海上航行，极易被海水灌进舱内而沉没；第三，何志全、海礼士虽是长江上经验丰富的船长，但却缺乏航海经验。然而为了脱离“虎口”，再困难也得干。于是船员们立即动手封堵船帮开口、甲板舱口并加固轮船，然后雇了两名渔船“老大”担任领航，启锚离开定海，紧贴海岸线往南驶去。两轮先到福州，然后冒险驶过风浪很大的台湾海峡，安抵基隆，受到民生公司基隆分公司经理韩时俊的迎接。

这时，国民党当局对台湾海峡及附近海面封锁得更紧，没有签证，任何船只都不准离开台湾。遵照卢作孚电示，王化行和韩时俊仍以“民本”、“民俗”是江轮，无法在海上服役为由，向国民党当局反复交涉，请予放行。经过极大努



卢作孚



解放前夕,卢作孚在民生公司负责人会议上作出护船决定

力,在联勤总部高级顾问陈地球的帮助下,在基隆船厂修理后的“民本”、“民俗”两轮,最终拿到了离台签证,于1949年9月平安航抵香港。

1949年10月初,王化行奉卢总之命由台湾重返定海,去营救“渠江”、“怒江”、“龙江”三艘轮船。但这一次就办不通了。因为这时新中国已经诞生,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加强了海上封锁,加之这三轮乃是民生公司购买美军退役小型登陆艇改建的,国民党当局认为可作军用,坚持不放,他们还扬言要把一再前去交涉的王化行扣押起来。无奈,王化行只得返回台湾发电请示卢总。卢作孚立即拟了一份给国民党联勤总部副总司令何世谊和高级顾问陈地球的电文,称这三艘船太小,不适于航海,仍请他们帮助放行。最后,何世谊采纳了陈地球的建议,由联勤总部另派一艘大型登陆艇赴定海,将“渠江”、“怒江”、“龙江”三轮换回台湾。三轮在横渡台湾海峡途中遭遇飓风,“龙江”号被刮上大树岛触礁搁浅,只得救出船员,将船放弃。

“渠江”、“怒江”二轮抵台后,王化行坚持二轮非要大修后才可供军用,二轮遂进入基隆船厂修理。该厂厂长周茂柏抗战时曾任民生船厂厂长,与二轮轮机长和部分船员很熟,也十分同情二轮船员的处境。于是,周茂柏佯称台湾没有修理二轮所需的美制配件,船厂无法承修,建

议前往香港修理。陈地球这时也暗中相助,终于使二轮于1949年11月初获准开往香港修理。

这时,王化行又接到卢作孚的密电,要他设法将原来行驶于上海—台北航线,因上海解放而被迫滞留台湾的“民众”轮弄出台湾。王化行立即找“民众”轮船长万竞吾密商后,以开辟台北—香港航

线创收为由提出申请;又由万竞吾找旧日海军学校同学马纪壮(台湾海军司令)、刘广凯(台海联勤司令)从中帮忙,再由民生公司找了金城银行等三家铺保,担保“民众”轮抵香港下客卸货后立即返台。这样,“民众”轮才于1950年元月驶达香港。圆满完成救船任务的王化行,也随“民众”轮一同抵港后转回重庆。

在民生公司被困于定海、台湾的“民本”、“民众”、“民俗”、“渠江”、“怒江”等5艘主力船,全部安全集结香港的同时,被国民党当局扣往黄海、东海执行军运任务的“太湖”、“宁远”、“定远”等轮,也先后设法摆脱了敌人的控制,平安开抵香港,加上由加拿大新造驶回的“荆门”、“夔门”、“雁门”等七艘“门”字轮,集结于香港的民生公司轮船已达18只。

卢作孚在香港运筹帷幄

民生公司的轮船齐集香港,摆脱了国民党的控制,但那时香港还在英国统治之下,国民党残余部队尚盘踞着海上的一些岛屿,如何把所有轮船安全运回祖国大陆,仍然存在着尖锐的斗争。

这时已到了1950年6月,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原先已与共产党地下组织

有联系的卢作孚先生被邀请抵达北京参加了这次盛会,并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民生公司制定了周密的把所有轮船从香港运回祖国的计划。计划内容是:民生公司在香港的船只均以承接日本或韩国运输任务的名义,驶离香港,待绕过台湾海峡脱离危险区后,再向西驶往上海;为了保密,不发电报,不打电话,每艘船开出后均由香港民生公司经理杨成质直接派人到上海与上海民生公司副经理宗之琥联系,然后宗之琥再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汇报并准备迎接。

1950年6月7日和9日,“怀远”轮和“宁远”轮分别在船长黎明和汤镇瀛的率领下,趁国民党未摸清民生公司船舶动向之时,佯称装货去韩国仁川而驾船离港,到东海时突然转向,分别于6月12日和15日胜利抵达上海。

6月13日,“民众”轮在万竞吾船长率领下,也以开往韩国釜山为名,冒着恶劣的气候,勇敢地夜闯台湾海峡。行进中突然有探照灯扫射过来,情况异常紧张,这时万船长机智地将船靠向台湾岛驶去,造成敌人的错觉。拂晓,台湾岛早已消失在身后,“民众”轮立即快车向长江口前进。他们绕过国民党残军盘踞的岛屿,又通过水雷封锁区,在迷雾初散的6月18日清晨驶入长江口。当大家刚刚兴奋地挂上五星红旗时,前面又遇一艘军舰拦路。大家都以为是国民党军舰,于是在万竞吾船长带领下,大家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坚持既定航向,全速猛冲过去。抵近之后,才发觉对方是艘英国驱逐舰。对方这时也看清了“民众”轮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们也不敢再做什么,把舵往左边一打,从“民众”轮右侧擦舷而过。看着灰溜溜远去的英国驱逐舰,“民众”轮上顿时爆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这些船员平生第一次体验到,做一个五星红旗护卫下的中国人的尊严!

正当在上海接应的宗之琥盼望第4艘船的消息时,忽然接到上海市军管会负责人于眉的电话,命其速与香港联系:若第4艘船还没启航就不要开出了。因为此时港、台报纸已刊出“怀远”、“宁远”等轮回到上海的消息,国民党军舰已加强了对长江出海口的封锁,民生公司回归

船只再走上海已不安全了。但这时,第4艘船“太湖”号已于6月21日晚开出。不幸的事果然发生了,“太湖”轮刚进入公海便被两艘国民党军舰劫持,押往台湾高雄。后来才知道,船上的三副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他利用协助办理结关出港手续之便,获悉了船只启航时间,并密报了台湾当局。面对敌人,“太湖”号船长周曾怡大义凛然地独自承担了全部责任,被台湾国民党当局判刑13年,关押于火烧岛(刑满后,周船长流落台湾街头,受尽屈辱;1990年终于由台回沪,受到上海市政协和统战部热烈欢迎,并与家人团聚,后逝于上海),其余船员则被国民党军队押至汕头海域放逐,后由我沿海军民救回。

就是在这个多事的1950年6月,接着又发生了泊在香港油麻地的民营庆华公司“华福”轮船夜间上岸,被国民党特务劫往台湾的事件。卢作孚得知“太湖事件”和“华福事件”后,非常着急,当即商议决定:回归船只一律不再驶往上海,改为驶回广州。

这时,民生公司尚有“渠江”、“怒江”两轮停泊在香港油麻地。为了把二轮送回广州,香港民生公司经理杨成质、襄理王德润,会同“石门”轮船长王明德、轮机长王崇让秘密商定:由王明德、王崇让牵头,挑选驾驶船员、轮机船员各5名,组建送船小组,先率修船队对二轮进行检修并暗中补足燃料,然后以试航为名将二轮驶离油麻地,回航时却悄悄移泊于偏僻的荃湾锚地。

1950年7月31日清晨,王明德和王崇让各率精兵5名,携带轻武器悄然登上“怒江”轮后,马上关闭驾驶台和轮机舱门,并持枪守卫,不准他人进入,然后立即启航向广州进发。当行至我大铲边防站时,他们立即挂上五星红旗,交出武器,接受检查,随后在胜利回归的欢呼声中开往广州。到达广州南石头锚地时,他们受到华南海员工会及有关部门领导和民生公司广州分公司职工的热烈欢迎,华南海员工会还向他们赠送了锦旗,祝贺他们胜利回归。

稍晚些日子,王崇让等人又以同样方式把“渠江”轮送回广州。

随后,“民俗”、“民本”二轮也于1950年8月27日和10月12日,由“祁门”轮船长周有

彤领航开回广州。稍后，“黄海”轮在船长祁沧帆率领下也驶回广州。

这时，仅剩下7艘“门”字轮尚未回到祖国的怀抱。这7艘“门”字轮是民生公司向加拿大三家商业银行贷款1275万加元建造的。为还贷问题，民生公司与加拿大的谈判破裂。这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加方秉承美国旨意，企图通过港英当局扣留这7艘轮船。

卢作孚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下达了反扣船指令，要求利用7艘轮船尚在运营的有利条件，采取相关措施，巧妙地回归祖国。

当时，7艘“门”字轮共以四种方式在港、澳、粤之间航行：“石门”、“剑门”在港粤间每日对开；“虎门”、“祁门”在港澳间每日对开；“龙门”在港、澳、粤三角线上穿梭，“雁门”、“玉门”则不定期行驶于港粤线。

1951年10月底，7艘“门”字轮的回归行动开始了。为了不暴露回归目的，这一天，首先由行驶港澳线的“虎门”、“祁门”从香港载客驶澳门；同时，不定期开港粤线的“雁门”、“玉门”装货运往广州。当“雁门”、“玉门”在广州卸货时，“虎门”、“祁门”已由澳门载客向广州驶来；这时，“龙门”、“剑门”已由香港直发广州，而原与“剑门”对开的“石门”，依然同时由广州向香港驶出。待“石门”轮行至广东虎门附近时，预先安排的一艘大陆海关巡逻艇追了上来，声称船上有走私物品，将船押回广州检查；此时，“龙门”、“祁门”、“虎门”、“剑门”诸轮均已进入中国水域。待7艘“门”字轮全部集结广州后，香港民生公司为抗议加拿大政府背信弃义、恶意刁难、置中方数千船员和家属的生计

于不顾的全员总罢航行动在广州展开了。

恰在此时，加拿大政府请港英当局代为扣押民生公司船舶的起诉书传到了香港，但由于船员在广州罢航，香港根本没有民生公司的船舶，使港英当局扑了个空。这样，7艘“门”字轮终于无一缺损地回到人民的怀抱之中。

不久，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为民生公司提供了一千六百元（旧人民币，相当于现在1600万元）的贷款，使其不仅还清了外债，也发展了生产。后来，“绥远”、“定远”两艘租给丹麦宝隆公司的轮船，于1953年9月解除租约后也分别回到了海口和广州。

至此，民生公司于解放前夕被迫滞留海上的20只轮船，除“民丰”轮被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扣作军用、“太湖”轮回归途中被国民党海军劫往台湾、“南海”和“渤海”二轮因太旧而在海外标的拍卖外，其余16艘轮船全都回归人民怀抱，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就连被飓风刮上大树岛的“龙江”轮，也由民生公司将其完好的主、副机打捞起来，运回上海江南造船厂，于1954年建造了一艘长80余米的新“民众”轮，成为长江上最大的客货轮。

卢作孚先生和民生公司职工为护船归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等谈到我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曾说过有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责任编辑 林耀）

2001年12月24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读书》“韵语书话”栏刊登贺《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诗一首，转载如下。

《炎黄春秋》 创刊十周年

● 顾人疏

《炎黄春秋》杂志忠于史实，有董狐之

风；代人民写历史，有当代太史公之概。用文字做建筑材料，为人民英雄树起了丰碑，以纸上之声，鞭挞了魑魅魍魉的丑行。

抚卷三叹董狐忠，
益信人民太史公。^①
通天大路谁铺就？
试看青史血花红。

①刘少奇同志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由国民党失意元老转为 历史学家的冯自由

● 傅国涌

冯自由原名懋隆，字建华，广东南海人，出生于日本横滨一个侨商家庭。祖上以行医为业，祖父因为结交“红头贼”的嫌疑被逮捕下狱，死在南海狱中。父亲冯镜如愤然出走日本，在横滨经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他父亲毅然剪除辫发，成为旅日华侨中第一个剪辫易服的人，被人叫做“无辫仔”。1895年，他父亲与亡命日本的孙中山结识，加入兴中会，任横滨分会会长。一次孙中山在他家吃饭，少年冯自由也坐在一起，便询问他喜欢读什么书。他说，喜欢读《三国演义》。孙中山又问他，最喜欢《三国演义》哪个人物？他说：诸葛亮。孙中山笑着说：你知道喜欢诸葛亮，就是明白古今顺逆的道理。我们兴中会便是汉朝的刘备、诸葛亮。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们起兵驱逐满洲，就如同诸葛亮六出祁山。孙中山对他父亲说，你儿子能熟读《三国演义》，何不叫他人会？冯镜如于是叫他填写誓约，正式加入兴中会，那年他只有14岁，是年龄最小的革命党，他后来因此自称“我是马前一小童”。

1899年秋天，他到东京梁启超任校长的高等大同学校读书，开始接触到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等，逐渐明白了平等自由天赋人权的学说。同学有蔡锷、秦力山、范源濂等三十多人，都是志大才大，各以罗伯斯庇尔、丹顿、华盛顿、卢梭等自命。那时梁启超正和孙中山商谈合作的事，康有为震怒，严令梁离开日本到檀香山。梁走后，大同学校和《清议报》都交由麦孟华主持。康有为遥控指挥，报中连“自由”、“独立”等字眼都不准提。冯愤然说，你们怕老康如虎狼，真不脱奴隶根性。你不敢说自由，我即更名自由，看谁人可以侵犯我

的自由。说罢，就在黑板上大书“冯懋隆即日改名自由”，同学都为他鼓掌。

从1900年到1902年，冯自由办刊结社，倡导自由平等学说，短短三年间就做了不少足以载入革命史册的事情。如：他与郑贯一等创办了《开智录》，与秦力山等合办了《国民报》，与王宠惠等组织了广东独立协会，与章太炎、秦力山等发起召集了影响很大的支那亡国242年纪念会等。

这几件事都得到孙中山的赞成，也是他年轻时的得意之作。随后，他担任香港《中国日报》驻东京记者，美洲致公堂《大同日报》驻东京通讯员。东京的革命军事学校、檀香山的《檀山新报》、新加坡的中和堂及《图南日报》，也都由他从中传递消息，进行联络。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他在横滨的家几乎可以说是革命党各方交通线的枢纽。

1905年7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冯自由是第一批参加的会员。8月孙中山派他到香港、澳门、广州各地设立同盟会分会，并任《中国日报》记者。“三民主义”这个简称就是他最初提出的。1906年，《中国日报》改组，冯自由任社长，同时以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身份主持南方各省的党务、军务，直接指挥了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还参与了1907年的钦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新军起义失败后，他到加拿大，任温哥华《大汉日报》总撰述，同时向华侨筹措军费，为黄花岗起义做准备。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到美国协助旧金山洪门筹饷局募集革命经费。从《黄兴集》中可知，黄兴有关筹款的许多信函都是写给冯自由的。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两个月后,旅美致公堂及同盟会洪门筹饷局等团体公推冯自由为美洲革命党总代表,回国参与组织共和政府,并带了筹饷局两年内发行的革命军债金币券收支总册向革命军政府报销。回国以后,他曾列席旁听各省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的盛会(当时尚无华侨享受参政权之条文),参加过孙中山的就职典礼,并出任总统府的机要秘书。

1924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会后十几天,冯自由等五十余人在林森寓所秘密集会,反对国共合作。李大钊、鲍罗廷将这一“不守党员纪律及挑拨国共恶感”的举动报告孙中山,要求严惩冯自由等四名为首分子。孙立即在大元帅府召集冯自由等,声色俱厉地训斥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

这年冬天,冯自由到上海活动,主张“号召同盟旧人,重行集合团体”,由章太炎领衔发表了《护党救国宣言》,签名的包括他和居正、马君武、田桐、刘成禺等12个老同盟会员。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5月中旬,冯自由从北京来到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发表宣言称:“吾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绝不相侔”,反对“强效苏俄”,当即为多数国民党人反对,俱乐部被强令解散,冯自由被开除出党。

冯自由一生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主义,恪守原有的三民主义立场,被看作是国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作《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他说:“国民党改组时,反对改组最坚决的是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冯自由、谢持这些人。”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后,经孙中山、黄兴推荐,冯自由出任临时稽勋局局长,直属国务院,在各省成立分局,负责搜罗征集国内外革命党人的大小事迹,调查、审议后分别呈请政府褒奖或抚恤,以贯彻“崇德报功养生恤死之大业”。

在职15个月,冯自由做了大量认真、谨慎的调查、核实工作,把为缔造民国而牺牲者的抚恤报告提交给袁世凯,袁以财政困难为借口,批转

国务院存案听候办理。袁滥赏勋章,如同雪片一般,“大惹国人非议”,有人误会是稽勋局审议失当,严厉指责冯自由。当时他正在各省稽核革命勋绩,不能替袁受过,随即以稽勋局名义通电否认,使袁十分恼怒。期间他还以“稽勋事大,入阁事小”,拒绝出任工商总长。

“二次革命”发生后,冯自由突然被捕,关押了五天,出狱后匆忙离京。

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冯自由是受排挤的过时人物,他名为“自由”,却把自己的书斋叫做“不自由斋”,由此可见他当年的处境。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冯自由痛感民国成立十几年了,而国人对于革命开国的往事,茫无所知,足以影响国运的兴亡。于是“发愤搜集三十年来所宝藏之各种书札、笔记、表册、报章等等,并广征故旧同志所经过之事迹”,撰写了洋洋百万言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分上、中、下三卷,是第一部史料翔实可靠的辛亥革命史。上卷出版于1928年11月,中卷出版于1930年11月,因环境及时势的关系,下卷一直未能在大陆出版。1928年7月,章太炎为之作序,感叹辛亥革命17年了,还没有一部信史:

南海冯自由与同盟会最久,又尝为稽勋局长,以其所见,又遍访故旧,而作《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虽未周悉,然阿私之见少矣。其以开国前名者,以为情有诚伪,事有轻重,事后之所为者,不得与事前比,且将以前之艰难,晓示后进,...

故自民国九年以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亦曷足怪乎?

“阿私之见少矣”是章太炎对此书极高的评价,如李燮和民国以后成为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子”之一,但冯自由没有因此而否认他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绩。光复上海、促成江、浙独立,他是关键人物,这是无法抹杀的事实。冯自由的革命史不虚构、不夸张、不隐晦,是尊重事实的。

1936年,冯自由环顾国内当时出版的有关历史,大多浅陋不详,国人对于辛亥革命的伟业也“多数典忘祖,喜谤前辈”,认为这是民国盛衰存亡的大关键,开始编写《革命逸史》。动笔之时正是日寇压境、民族危亡的关头,民国成立已25年,当年参与革命的人,兴中会时代的志士早已

零落殆尽,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员活着的也寥寥可数了,这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辛亥革命元老,当年的“马前一小童”不禁感慨万千,大有白头宫女闲谈开元、天宝遗事的悲怆,信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白头宫女谈天宝,古董山人说晚明;
今古兴亡多少恨,狂歌当哭万千声。

《革命逸史》历时十几年,直到1948年才得以全部完成。商务印书馆1949年前只出版了前五集,1981年中华书局首次出版全部六集。此书可与《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互相补充、印证参考,《开国前革命史》记载了海内外革命党人起义建国的始末,对个人言行事迹和团体构造活动则语焉不详;《革命逸史》侧重于个人传记和逸事,可以弥补前者的不足,为研究辛亥革命史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的可信资料。

《革命逸史》是冯自由根据香港《中国日报》及他自己多年笔记、往来书信、稽勋局调查表册等编写的,所记载的都是最有根据、最有价值的正史材料,他却“暂以革命逸史名之”。

从1895年参加兴中会起,冯自由曾亲历辛亥革命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与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史上异彩夺目的关键人物都非常熟悉,如秋瑾1904年10月,曾参加冯自由在横滨组织的“三合会”,她加入同盟会也是冯介绍的。冯担任过15个月的临时稽勋局长,调查搜集了大量革命史料,这些因素都是他研究革命史得天独厚的条件。

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后,他在政治上不得志,以一个失意的革命元老发愤著书,研究革命史,正本清源,他的历史著作是建立在第一手史料基础上的,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他在《革命逸史》自序中指出清代有革命党始于兴中会,这以前如白莲教、天地会、洪秀全等,“所企图,所建树,均不外夫以暴易暴一家一姓之帝王系统”,与近代民权主义无关,最多只能说它是私人的或狭义的革命党。兴中会率先举起民族民权主义的旗帜,开创了我国历史的先河。这些见解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新鲜的。

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再到中华革命党的党务部副部长,冯自由始终追随孙中山,可以说是革命党的“正统”,但他对光复会、华兴会和其他革

命党人的事迹都能如实记载,公正评价,在研究历史时没有派系的狭隘性,在他身上不仅体现了中国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而且蕴涵着他对民主、自由、平等始终不渝的追求。他著史首先起源于对当权者歪曲和篡改历史的痛心,同时也是深感民权落空,自由未成。《革命逸史》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希望引用的人一定要分别注明出处,由此也可见他治史的严谨。他曾说袁世凯、黎元洪都不是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前后,屠杀革命党人,证据确凿,以他们为民国元首,则破坏共和、颠倒功罪都不足怪。遗憾的是国民党自掌握政权以来,“以革命党而行革命党应行之事,虽褒扬先烈之令,不绝如缕”,但只限于大名鼎鼎、妇孺皆知的少数领袖人物,而对于开国前和开国时断头流血、舍生取义的大多数无名英雄,并未按照当年稽勋局的调查表册分别抚恤,他说这是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缺憾。他一直认为饮水思源、养生恤死,是后死者应尽的责任。他后半生执着于革命史研究与写作,这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他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著作,并不是为个别领袖树碑立传,而是忠实地记录了革命史上无数无名英雄抛洒热血、舍生取义的业绩。在举世滔滔,数典忘祖大有人在,沐猴而冠、粉墨登场的年代,他以革命的亲历者、以严肃的史家态度,编写革命史,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

冯自由既不见容于孙中山晚年,也与蒋介石不和,长期得不到党国重用,只能担任立法委员等闲职。1949年他取道香港去台湾,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1958年在台北病逝。

在20世纪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在缺乏宽容的一元化的政治环境下,这一切自然决定了1949年后他的名字在大陆被遗忘。其实,在辛亥革命史上他是一个不能否定的人物,他20年代后期开始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著述鸿富,成就斐然,有《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华侨革命开国史》等著作传世。1936年9月,毛泽东致信蔡元培先生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其中列举的人中就包括了冯自由。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一些著作已在大陆公开出版。

(责任编辑 刘家驹)

民国前总理 熊希龄的风云人生

● 周秋光



熊希龄和夫人毛彦文(1935年)

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
鞠躬尽瘁，救世惜无老子军。

这是1937年熊希龄逝世之后，蔡元培为他撰写的挽联。挽联形象地概括了熊希龄由“从政”到“从善”；再由“从善”到“救亡”的人生之路。

熊希龄的政治生涯是悲剧性的。虽然他在民国初年曾一度居于国务总理的高位，并有心想在他的任内把中华民国纳入资本主义法制建设的轨道；但是，遭到狡悍的一代枭雄、大总统袁世凯的百般钳制，使他无从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最后带着抑郁、负气的心绪辞职下野。然而可贵的是：在政治上不能有为的熊希龄，并未因此消沉颓废，而是另行开辟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在旧中国兵燹迭起、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的艰难岁月里，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在全国范围内救灾办赈，并手创驰名中外的北京香山慈幼院，教养孤贫。适逢日寇侵华事起，他又舍生忘死地奔走呼号，救死扶伤，为抗日救亡历尽辛劳，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1870年7月23日，熊希龄，字秉三，出生在湖南省凤凰厅（今凤凰县）一户三代从军的人家，7岁那年，随父母迁居芷江县城，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

熊希龄少有才子之名，年14中秀才，1891年中举，1894年成庶吉士，1897年便怀抱经国济世之志，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

那时，他助湘抚陈宝箴锐行新政，如改革书院教育，设立时务学堂，创办《湘报》，组织南学会、延年会、湖南不缠足会，开办各地团练和制订保卫局章程，以及兴办湖南近代铁路、航运和各类新式工矿企业等等，初次施展了自己的才华和抱负。湖南在维新运动中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省份，他是重要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之一，并因此成为守旧势力攻击的主要对象。后戊戌政变发生，六君子罹难，他被指为康梁党徒，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当时他才28岁。

1903年，赵尔巽抚湘，因看重熊希龄的才

干,遂上奏清廷,为之解脱“严加管束”,令助理学务,以观后效。历两年,熊希龄以其才智,不仅办理学务成绩卓著,而且在实业上也作出了贡献。驰名中外的醴陵瓷业,就是他手创。同时在中国的边情外交方面,也多有建议。于是赵尔巽第二次上奏清廷,请免其“永不叙用”,开复原官,发往奉天差遣委用。随即熊希龄又被继任湘抚端方看中,极力保奏他充当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随员,任二等参赞官。自此,熊希龄的政治桎梏得到解脱,英雄又有了用武之地。

随五大臣出洋期间,熊希龄曾请他的老朋友梁启超、杨度撰写宪政文章,沟通了梁等与五大臣间秘而不宣的关系。在梁启超开展的立宪活动中,从制订计划、筹措经费到设立宪政会(后改名政闻社),熊希龄都是核心人物与决策者。出洋归国后,他被戴鸿慈、端方奏保,以道员衔外省补用,记名四川,属候补官员,然由于他的杰出才干已广为人知,一时成为内外大臣竞相延揽的对象。

1906年,盛京将军赵尔巽调熊希龄任奉天农工商局总办。一年后,赵被调往四川,署江苏巡抚陈启泰奏调熊到苏。熊到苏后,两江总督端方与陈启泰争相招致,陈委他任江苏农工商局总办,兼苏属咨议局会办;而端方则委他任督署总文案,兼宁属咨议局总办,还命他办理南洋印刷官厂。他身兼五职,奔走宁、苏两地,又参与筹办当地宝应长湖垦殖股份有限公司,还要兼顾湖南醴陵瓷业,一年四季,碌碌道途,极少回家居住。他的那种兴利除弊、振作创业的抱负,勇于任事,通权达变的才具深为同时人所折服。故当时任安徽学政的沈曾植与梁启超谈论当世人物时,“推秉三并时无两”。

1909年4月,度支部尚书载泽因为两年前收到熊希龄上他的一个《论财政书》的呈折,深为他所陈述的8条理财意见所叹服,适清廷清理财政,遂奏请赏给熊希龄四品卿衔,派充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至此,熊已身负重任,端、陈不敢再留。

1909年7月,熊希龄到奉天履任,开始做清理财政方面的工作。次年,载泽兼任督办全国盐务大臣,又奏保熊任奉天盐运使。1911年4月,赵尔巽回任东三省总督,委任熊兼任东三省屯垦

局会办和奉天造币厂总办。三年间,熊希龄经历了财政、盐运、制币等多方面的锻炼,从一个引入瞩目的实业家,又成了名重一时的盐政专家和理财能手。

二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时,黄兴拟推熊希龄担任财政总长,但孙中山认为熊属立宪派人士,以“财政不能授他派人”为辞,改用广东人陈锦涛担任,熊希龄未被重用。

然而熊希龄毕竟是清末官场上有影响的人物。1月3日,章炳麟发起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选熊为该会的参议员,该会成员多系立宪派人士和旧官僚。它以“新共和国家统一主义”为宗旨,制订了10项政纲,在维护共和、反对君主专制等方面,有积极进步作用,但对同盟会则“取嫉视态度”。3月2日,中华民国联合会上海举行大会,改会为党,称统一党。熊与章炳麟、程德全、张謇、宋教仁5人被选为该党理事。

袁世凯攫取临时大总统权位后,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深悉熊希龄善于理财,便邀熊入阁担任财政总长,但熊希龄却不愿就任。因为在他看来,民初的财政,不过是烂摊子,“名为财政,一钱不名,不问何等财政大家,亦无从着手。”

熊希龄辞意如此坚决,袁、唐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别的人选。可是一则别人也同样不愿就任;二是在袁、唐看来,也实在没有比熊希龄更为合适的人选,因此,尽管熊已力辞五次,他们硬是要把他给请出来。唐绍仪则干脆专程到上海坐待熊希龄答应,并且还电邀张謇来沪“协力劝驾”,到了这种地步,熊希龄不好再辞,只得应允。

既经接手财政,熊希龄便集中精力谋求解脱民国财政所面临的困境。而要解燃眉之急,就不得不继续与四国银行团磋商贷款。5月17日,熊希龄与银行团议定了1200余万两的贷款。预付第一批款项后,缓和了当时政府的财政困难。但是却因为借款书上开列了“银行团与财政部各派一人为核算员,稽核贷款支付的用途”一项“监督条件”,一时招致舆论哗然,群起反对,特别是同盟会的革命党人,纷纷来电切责,黄兴更

指责熊是“违法专断”，“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熊希龄简直成了众矢之的。于是从5月19日开始，熊便向唐、袁坚请辞职，但袁、唐决不答应。唐绍仪鉴于熊辞职的主因系来自革命党人的“不见谅”，遂于28日致电黄兴陈述利害。于是黄兴又赶紧电熊，劝勉熊希龄继续任事，故熊希龄顾全大局，继续与银行团谈判，希望能够将监督条件取消。然此时的银行团增加日、俄，成了六国银团，地位比过去更为垄断。他们明知中国人反对监督条件，不仅不愿更改，反而提出比原来更为苛刻的条款。9日，谈判中止。此后熊希龄便再也不愿留任。

熊希龄辞去财政总长后，袁世凯改命他担任热河都统。1913年3月，熊到热河就职。在此约4个月，他曾筹划热河建省、修筑铁路和修葺避暑山庄诸要政。

热河首府承德是清廷行宫所在地，这里存放着许多清宫故物。熊在热期间，曾延聘前清知名人士设立古物整理清查委员会，将宫物一律编列造册，分别保藏，并会同装运一部分至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但是在清理过程中，准军宿将姜桂题因于边事有功，熊拟呈请给予他勋章“以旌其劳”。可是姜却示意欲得清帝纪念品，于是熊希龄“即检康熙、乾隆御笔联、扇各一赠之，并报国务院转呈立案”。此事本来有案可稽，没想到后来竟被袁世凯利用，捕风捉影，罗织出所谓“热河宫物盗宝案”，生出许多麻烦事来。

1913年5月8日，熊希龄以自己“现服军役，理应不涉政治”，宣布脱离共和党（1912年5月9日，统一党与民社、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国民党五政团在上海合组共和党，熊转为共和党员）。但是不久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又合并组成进步党，不管熊同意与否，还是将他选为名誉理事。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国民党与袁世凯剑拔弩张，于是发生了“二次革命”。刚成立的进步党站在袁世凯一边，“促令政府迅速戡乱”，故袁世凯用武力镇压“二次革命”后，欲在政治上有所表现，乃利用进步党组阁。进步党的领袖本是梁启超，可是袁对梁存有戒心，怕梁一旦组阁后像宋教仁那样，挟持进步党的国会议员的多数，不便于己，于是他就选

择了与进步党有点关系，而又可以控制的熊希龄出来组阁。当然熊希龄是不愿轻易就职的，经袁世凯三番五次电邀，熊推辞不脱，只好从热河来到北京。

经国会通过，1913年7月31日，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受命后，熊内阁却一时难产。按熊的意愿，他要组成“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内阁”。他指的“第一流人才”是梁启超、张謇、汪大燮、杨度等人。梁启超欲长财政，杨度欲长交通，然而袁世凯开给熊希龄的一张总长名单是：财政周自齐、交通杨士琦、外交孙宝琦、内务朱启钤、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只剩下农商、司法、教育三个闲曹让熊支配。这样一来，梁启超便不愿入阁，张謇、汪大燮皆以梁启超不入而相率不出，杨度则以“帮忙不帮闲”而断然拒绝，一时成了僵局。8月26日，熊希龄就总理职。但他视事一个多星期，这个僵局尚未解开，熊十分不快。可他无法改变袁世凯的意向，只能劝说梁启超：“公既不出，则张季直、汪伯棠皆牵连不出，熊内阁势将小产，此时进步党将持何等态度？又如公等均不出，熊内阁纯以官僚组织之，舆论必不满意，此时进步党又将持何等态度？故为进步党计，公亦不可不出。”梁启超当然不愿看到熊内阁流产，适稍后袁世凯也略有变通，即财政总长改由熊希龄自兼，周自齐任交通，梁于是答应出长司法，张謇、汪大燮遂也同意填补农商与教育两个空缺。9月11日，经国会通过，这个内阁总算草草组成了，阁员9人中，进步党4人，北洋系5人，可以说是个联合内阁。

熊内阁组成后，倒是有心要干一番大事业。它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发布了《大政方针宣言》，对于民国的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实业、交通、司法、教育诸大政，都作了详细的论说。要言之，其根本之点在于立足建设。政治上，其主旨在于贯彻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制精神，建立“一真正共和国”；经济上，则是要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资，增加关税，裁撤厘金，保护实业，奖励垦殖与私营工商，兴修水利，改良农业，发展邮、电、航、路四政，将中国尽快纳入资本主义建设的轨道。

然而，熊内阁的大政方针触犯了袁世凯蓄谋推行的封建军阀独裁统治和扩张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意图，故袁世凯虽表面上表示“赞

许”，暗地里却生出种种阻力，使熊内阁几乎无时无刻不陷于困境。

事实上，袁世凯特命熊希龄组阁，并非看重他的经纶大才，而是利用进步党人来排除国民党“暴烈分子”的愿望，进而为自己攫取更大的统治权力扫除障碍。其最狠毒的一招，就是在以非法手段逼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总统之后，又以非法手段利用熊内阁为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当然，这一手是不易达到的，于是，狡悍的袁世凯便将所谓“热河官物盗宝案”作为王牌打出来，对熊希龄进行挟制。

袁世凯挟制熊希龄达到目的后，进而又想通过“约法会议”制订“袁记约法”，推行“总统制”，决心赶熊下台。袁赶熊下台依然是利用“热河官物盗宝案”，1914年2月6日，熊向袁呈递辞呈，9日，袁免其财政总长，12日，免其国务总理，改由孙宝琦代理。

三

袁世凯还需要熊希龄，因为熊毕竟是全国名流，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和影响，故依然委以职位。据当时的报纸报道，熊辞职后的数天，袁委任熊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熊未接受；但3月3日，袁委任熊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5月26日，又任命

他为参议院参政，他却拒绝。自谓“卸任国务，即不与闻政治，专以实业韬晦”，盖以煤油矿事属于实业范围，所以他乐意为之。从1914年3月20日开始，他颇费心力地从事筹办全国煤油矿的勘测及其开办诸事。直到1915年秋，当袁世凯野心勃勃地欲登上皇帝宝座，在北京掀起了一股帝制复辟逆浪，他进一步看清了袁的真面目，才打算与袁真正脱离。

1915年8月13日，熊借故母亲“病重”，请假离京回湘省视，所有煤油矿事，请派坐办袁乃宽兼代。袁世凯不知是计，当即应准。然到了11月13日，假期已满，熊仍不返京，袁世凯急了。因为袁的帝制闹剧正在紧锣密鼓之中，他怕熊希龄在外于己不利，于是一面连连电催入京，一面就从熊夫人朱其慧身上施展手段。其时，袁正筹划将总统府改为新华宫。12月22日申令“永禁太监，内廷改用女官”。女官额定12人，上设女官长1人，人选颇为慎重。“宜以世家命妇，德望可领袖宫仪者任之”。当时筹备大典诸臣，有的推举现任国务卿孙宝琦夫人，有的则推熊夫人朱其慧。最后由袁世凯决定，以朱其慧乃“名门淑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者俱备，法度容止，可教六宫”，遂确定为朱，随即颁发诏书至熊府，熊氏京中亲友皆视为异数。有此一招，令熊希龄哭笑不得。因家室已在袁氏手中，故熊虽一再延宕，



熊希龄和香山慈幼院的孩子们

也不得不首途北上。1916年1月16日,熊希龄从湖南返京,袁世凯立即授他为中卿,加上卿衔,恩礼优渥。一时石附马大街熊宅车水马龙,贺客盈门,咸谓熊秉老位授上卿,朱夫人仪同特任,位视宫中大臣,真是“一门双贵”。熊苦笑对来宾说:“内人是一个乡里人,当今任以宫廷职掌,如何能谙新国礼节?”又话中有话地说:“予夫妇蛰居山林,不闻朝事,今日所获,天外飞来。当日任国务院,讥之者谓凤凰集于灵囿;今真凤凰齐飞入上林矣。”

正当袁世凯做着“洪宪”美梦的时候,蔡锷等已在南方组织护国军,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军讨袁。1916年2月3日,贵州的护国军攻入湖南西部,在凤凰、麻阳、芷江一带拉开战幕。此时,熊希龄遂趁机以老母在家乡芷江“被兵情急”为由,再度向袁“请假”回乡迎母。袁知道这是熊的脱身之计,但欣然应允。原来袁世凯见护国军“其势已成,决非武力所能征服”,他需要借重熊希龄为他当使臣,利用熊与梁启超、蔡锷的关系,到南方“疏通意见,商议调和之策”。当然,他也怕熊一去不返,于是不准他携带家室,意在“质其妻而监视之”。

2月8日,熊希龄出京南下。袁世凯深恐他倒向护国军一方,于是3月10日,由政事堂发出申令,任命熊为湘西宣慰使,并拨给现洋6万元,任其所用。熊鉴于家乡惨遭兵祸,老幼死亡载道,情殊可怜,于是他“勉暂担负”这个职位,借“宣慰”之名,以行卫乡救灾之实。并且他暗中策动辰沅道张学济与湘西镇守使田应诏于5月中、下旬在乾州、凤凰相继独立。直到袁世凯气绝身亡后,6月14日,他方进入北京,随即力请恢复民元约法,表明他始终维护共和的立场。

袁世凯败灭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段祺瑞组阁,仍实行责任内阁制。黎、段都想请熊出掌财政,熊坚辞不就。1916年12月13日,黎元洪任命熊为赴日赠勋特使;1917年2月27日,又任命他为平政院院长,往下还有诸多参政要事委之于他,他均一一拒之不受。自涉足政坛以来,他几度浮沉,历经炎凉,从而开始产生了“归隐深山,奉母终养,不再与闻世事”的想法,甚至还表示要“皈依佛教,以出世间”。

这年熊希龄才47岁,正是经验丰富、精力尚

称旺盛的年龄,对于许多看不惯的或有害国计民生的事情,他还是要过问的。例如,1917年5月1日,当国务院提出对德宣战一案,并将提交国会讨论通过时,他默察时势,认为此事“关系国家将来命运”,“若无戒慎恐惧之心,和平委婉之策,天时人事,变故交乘,必反为国家无穷之害”。因于5月8日致函段祺瑞,希望他不要“一意孤行,酿成大故,以致不可收拾”,“使国家陷于危亡之境”。7月1日,张勋搞帝制复辟,他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力加声讨。此外,他还极力地调停南北的局势,表现了对于国事仍然难以忘情的一片忧虑焦灼之心。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阴雨连绵,山洪暴涨,永定、大清、子牙、南运、北运5条大河同时漫溢,决口数百余,洪水泛滥各地。报载北自张家口,西至房山,东至山海关,南抵黄河,受灾计达103县,田亩25万余顷被淹,灾民逾600万,如此浩劫,“为五十年来所未有”。

面对如此巨灾,熊希龄良心不忍。他当即奔赴北京,力告政府救灾办赈。可是没想到北洋政府开会讨论,除非熊希龄出来主赈,方可定义。

熊希龄考虑再三,“遂不得不勉为其难”。

从1917年10月4日开始,熊希龄受命就任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督办。他在北京、天津两地设立治水救灾的办事机构,选择任事各员分担职守,并次第制订各项办事规程和章则,以及救灾治水步骤。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熊希龄的赈务、河工两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效,京畿直隶灾民几乎全活。

在从事京畿直隶治水救灾的过程中,熊希龄得知受灾各地留下许多无家可归的老人、儿童无人抚养,于是在各县设留养所170处。留养人数近4万。又专门在北京设立慈幼局两所,收养儿童千余名,这就是驰名一时的北京香山慈幼院的嚆矢。

京畿直隶水患平后,所收留的儿童大部分由家长认领回籍,余尚留下200余名无人认领。于是熊希龄请求大总统徐世昌向前清皇室内务府商洽,指拨已废弃的行宫香山静宜园为基址,建造慈幼院,收留上述无人认领的儿童,另接收北京贫苦旗、汉儿童500余人。1920年10月,香山慈幼院成立,熊自任院长。

香山慈幼院办理一年后,熊希龄感到贫苦儿童中不乏天资颖悟者,于是决定造就人才为主。从幼稚园起,次第设立小学、中学、师范。凡经慈幼院收留的儿童,从襁褓起即施以教育。从婴儿园升幼稚园,进入小学后,满12岁即安排到农工实习场从事农作和手工,半工半读。高小毕业,大多数分发到农工各场当徒工,计工授食,满3年后技艺精熟,即毕业出院独立谋生,一部分入中等职业班和幼稚师范。少数学业优异者,入普通中学。无论院内院外的孤贫学生,均给以贷款资助升入大学,毕业后分期偿还,不计利息。

熊希龄除了办理香山慈幼院外,还从事着其

他各种社会慈善活动。综计他从督办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起,历任的各种社会救济、慈善福利的职务计有近20个。此外,他还首倡发起或赞助各种救济组织。熊希龄把后半生的几乎全部心力倾注在济贫施教、改良社会、造福人群的事业上,表现了他同情劳苦大众、期望教育普及、社会进步、民安物阜、国富民强的心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熊希龄投入了抗日救国高潮。

1937年熊希龄于香港逝世。1992年5月,熊灵骨由香港移葬北京香山其生前所营造的墓茔。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邓小平时代(上下册)	杨继绳	32.00	3.00
红墙回忆录	纪 学	48.00	5.00
叶剑英在关键时刻	范 硕	23.00	3.00
陆定一传	陈清泉 宋广渭	29.80	4.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 分析与反思(上下册)	张 化 苏采青	59.80	5.00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	纪希晨	49.00	4.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张湛彬 刘杰辉 张国华	25.00	4.00
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	15.00	3.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上下册)	曾繁正	39.80	4.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灵芝军 马立诚	23.80	3.00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命运	吴 江	20.00	4.00
斯大林秘闻—— 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	爱德华·拉津斯基	39.00	4.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16.00	3.00
包拯身前身后世	张国华	26.00	4.00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徐晓 丁东 徐友渔	26.00	4.00
野百合丛书(共六册)(邮购全套六册邮费减半)			
之一 王实味——野百合花	黄昌勇	14.60	3.00
之二 胡风——死人复活的时候	晓风 梅志	18.80	3.00
之三 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	叶永烈	15.00	3.00
之四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	罗银胜	16.60	3.00
之五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谢 泳	14.80	3.00
之六 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	谢泳	16.60	3.00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是《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的作者推出的又一部力作。书中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那个“乍暖还寒”的季节写起,叙述了2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变革中思想界的“交锋”。那些人们所熟知的“华国锋与两个凡是”、“胡耀邦与文章救国”、“邓小平力挽狂澜搞改革”、“包产到户与人民公社的终结”、“失去邓小平后的中国”、“邓小平理论的确立”,以及姓资姓社的争论内幕,在书中尽现。人们能从书中体验到20多年来的变革,甚至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是中共建党后70年党内是非曲折的大写真。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发生过不少悲剧,教训太深刻了,其主要表现就是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路线,使许多忠诚的战士在貌似革命的口号下做了无谓的牺牲。甚至使党内多次面临分裂的危险。如三次“左”倾路线指导下的“肃反”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可以使我们警钟长鸣,不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史无前例的年代》作者是人民日报的老记者,“文革”中目击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采访了包括叶剑英、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华国锋在内的许多当事人,并参加了窝里斗“两案”的采访。他撰写的这个纪实作品,从1965年起围绕历史事件依次展开,记录了大量真实情节,是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

社 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

邮 编:100007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红军西路军烈士首级照片考

● 李敏杰、李宣辰

在甘肃省档案馆里，珍藏着三十多幅红军西路军将士血染河西的历史照片。这些照片是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时，被我军从马家军的地下室和国民党甘肃省警察局刑警大队长范宗湘家里查获的，它真实地记载了半个世纪前，高台发生的那桩动天地、震人寰的历史血案。其中一幅三颗烈士首级的照片尤其令人惨不忍睹。

尽管这些照片早已成为历史，然而，这三颗烈士首级是谁？有的展馆和陈列室里照片的说明是：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左）、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中）、红十三师参谋长刘培基（右）；有的纪念馆的照片说明，却说右边那颗烈士首级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为查清真相，笔者对照片进行了细密的调查考证。

董振堂领导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931年在宁都起义后，由中央军委命名为红五军团，下属三个军，共1.7万人。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中，曾参加过著名的赣州战役和水口大战，打得很漂亮。长征路上，五军团一直担任后卫，用殊死战斗和巨大代价保卫了中央纵队的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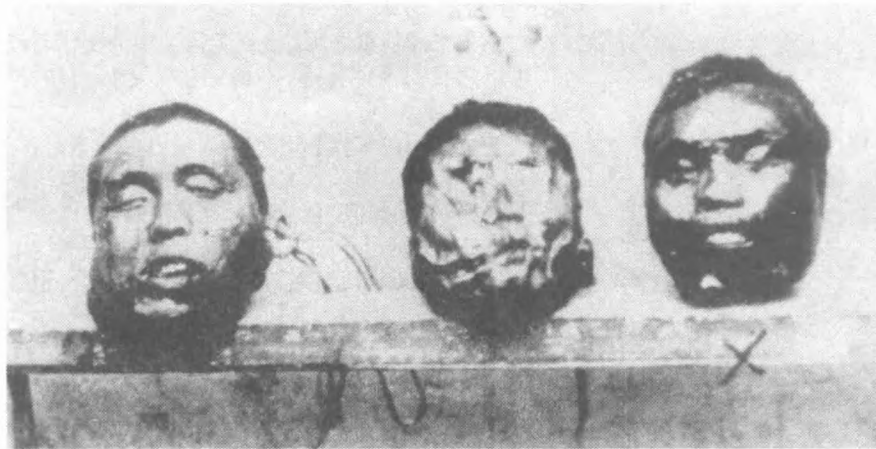
1935年8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奉命担任左路军前卫，率先走过草地。10月，三军会师前的华家岭之战，为阻击胡宗南部主力的进攻，副军长罗南辉牺牲，部队减员。11月，五军奉命渡过黄河西进，沿途与敌马家军苦战三个月，进至高台，又与敌血战九天九夜，直至弹尽粮绝。

1937年元月20日凌晨，敌人倾其全力再次冲上城墙。守城的红军战士用最后的手榴弹和捡到的石头、瓦块与敌进行殊死的厮杀。正在这个紧急关头，红五军刚收编的民团八百人哗变，他们打开了城门，敌人像蝗虫一样扑进城内。

顿时，城墙上、巷道里、民宅、农舍到处都展开了白刃格斗。上午7时左右，军长董振堂在东城门楼上让通信员找来骑兵团团长吕仁礼，眼中喷火，大声喊道：“吕仁礼，我要你把东城门守住，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人！”吕仁礼带着两个连立即奔赴东门与敌拚杀。激战中，吕仁礼头部被敌军骑兵的马刀砍伤，不省人事。

此时董振堂带部分机关人员从东门城楼沿着城墙向东南角冲去。当他们冲出大约四百多米的

地方，只见董振堂身子一歪，就从城墙上摔到了城墙外脚下。警卫员急速沿着城墙壁飞下，接着，科长寇惠民和几名警卫战士也来到墙根下。参谋孔建光将董军长的衣服撕开一看，惊愕地张大了嘴巴，只见子弹从他的左胸穿过，血流不止，孔参谋一直不停地呼喊：“董军长！董军长！”过了一会儿，董军长苏醒过来，慢慢地睁开眼睛，微弱地说：“我



董振堂

杨克明

孙玉清



西路军之一部

不行了，别顾我了，不走就冲不出去了……”讲着讲着，头一歪，就停止了呼吸。警卫员林炳才扶着董军长的头猛摇，可是，他再也不能说话了。

在高台之战中，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也光荣牺牲。高台县城的许多老乡都认识他，因为红五军一举攻占高台的第二天，即元月二日，杨克明在高台县城的十字街头，召开群众大会，宣讲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穷人起来求解放、参加红军。高台失守，敌人闯进街巷，杨克明带领几名警卫员，在城东南角的一座财主宅院里指挥战斗，高呼：“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坚持到底！”突然，敌人的炮弹将房子击中起火，杨克明头部被烧伤。在烈火中，杨克明带伤组织战士们增援西关，和敌作殊死搏斗，刀砍石砸，拳打脚踢，最后中弹壮烈牺牲。

高台之战，董振堂、杨克明和十三师师长叶崇杰、参谋长刘培基、二十师师长吴代朝以及前来援救五军的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等以下三千多名将士，除少数同志幸存外，都光荣战死。

高台失守后，马步芳、马步青下令把董振堂、杨克明、叶崇杰、刘培基四烈士的头颅砍下悬挂在高台城楼上示众。1937年2月中旬，这些头颅又被马步青带回武威新城兵营。为了向主子请功领赏，他特地叫传令兵把四颗烈士首级送往骑五军医院保存。当时敌八战区政治部搞宣传的李启之等人拍摄了照片，由兰州大北照相馆洗印、放大。照片中，还有红五军年轻的护士长被钉在街头的大树上，狞笑着的数十名敌人与之并列合

影。拍摄中还强令几十名被俘的红军战士分成两排，前排蹲，后排站，合影，继之打死，再留影……

三颗首级的照片中，除左边董振堂、中间杨克明外，右边的首级到底是孙玉清还是刘培基？为弄清情况，西宁市档案局副局长陈庆春等，以对先烈高度负责的精神，几经走访查询，获取了许多第一手资料，终于解决了这个长期争议的疑点，准确详实的资料证实，这颗有争议的烈士首级是孙玉清，而不是刘培基。

孙玉清，湖北红安县高桥乡孙家湾人。1929年11月参加红军，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历任战士、班、排、连、营、团、师长等职，长征途中的毛尔盖会议之后，他由红三十一军调任红九军军长。

在西征路上，红九军奋战古浪失利后，孙玉清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后被撤职，调到总部直属队当指挥，他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战斗意志。黎园口一仗之后，他和王树声、李聚奎、方强、朱良才、徐太先等领导干部组成一支小分队，艰难地沿着祁连山向东前进。一天，他们刚刚准备宿营，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小分队被打散了，孙玉清又一次负了伤。在这紧急的时刻，孙玉清还一心想着党中央，带领十多名干部战士准备化装奔向陕北，不幸于1937年3月，在酒泉南山三道沟被搜山的地方民团包围，孙玉清被俘，押到敌二九八旅旅部后，因叛徒告发，敌人弄清了孙玉清的身份。

受审时，他慷慨激昂地回答：“老子就是红九军军长！”

马步芳闻报孙玉清军长被俘，即令二九八旅

旅长马步康进行诱降,其参谋长受命陪孙玉清洗澡,同吃同住,形影不离,但孙玉清不卑不亢,漠然视之。5月17日,孙玉清被敌团长马忠义从张掖提解到西宁。

马步芳在“会见”中,得意地说:“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今日被俘有何话说?”孙玉清从容自如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从参加红军时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我死而无憾,并引以为荣。”他还当场揭露了马家军征夫抽丁、耗资派兵不抗战、专打红军的罪责。

马步芳还是决定以“情”感化,派人“陪”着孙玉清来到敌一百师陆军医院,看望被俘后在这里服苦役的岳兰芳。孙玉清看着显得过早衰老的妻子,疼爱、难过、愤恨之情一起涌上心头。岳兰芳有多少心里话要说,但身处虎狼窝,怎能将这一切流露给敌人。孙玉清抑止住感情,重重地说:“不要怕,战死和被杀一样光荣。”不久,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下达了“处以极刑”的命令。

当年杀害孙玉清烈士的凶手喇文彬交待了具体情况:那是1937年的5月,西宁古城,寒气袭人。身陷囹圄的孙玉清被关押在敌旅长马忠义的土楼里,他们得到密裁孙玉清的命令后,派出两个传令兵,先把孙玉清押到一家照相馆给他照了相。这张照片解放初曾存放在青海省档案馆里,后来,经过一番周折,青海省的同志终于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查到了孙玉清一张单人首级像,照

片背后写着: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他们将这张照片精心复制,带回西宁,与西路军三颗烈士首级照片对照,大家发现,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照片和右侧的照片完全是一个人,从而断定,三颗首级照片右侧的人是孙玉清,不是刘培基。

为了更加可靠起见,青海的同志又将革命博物馆的照片寄到了孙军长的家乡——湖北省红安县委党史办,请求找孙玉清的亲友辨认。红安县委党史办复信说:经熟悉孙玉清烈士的同志反复看过后,认定他就是孙军长。请孙玉清军长当年的老战友王定国(谢觉哉夫人)、程世才(红三十军军长)、石忠汉、陈宜贵(红九军保卫部长)和孙玉清的警卫员黄科林仔细辨认,他们都说:“很像!很像!”

在此同时,又请当年国民党方面的有关人员作了辨认,都认定是孙玉清军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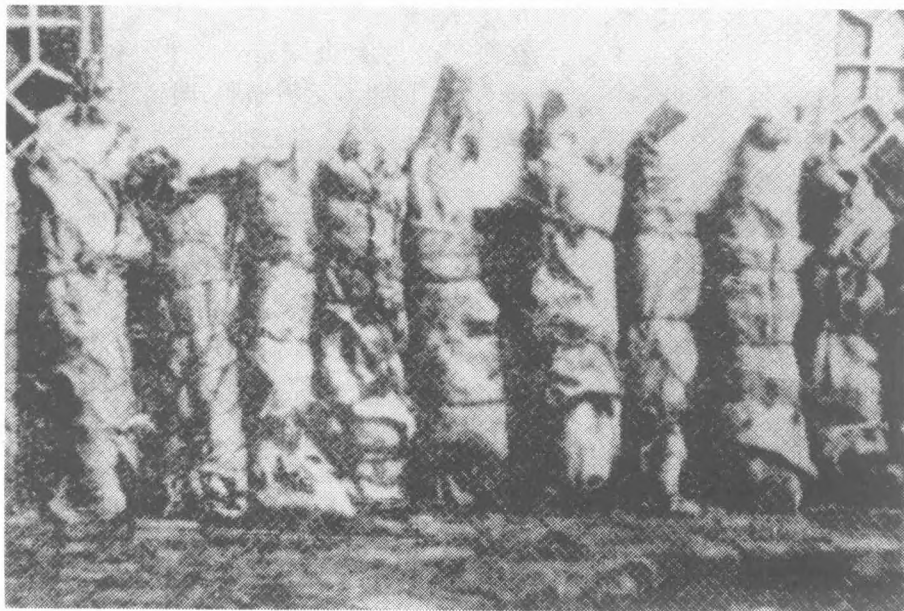
同时还发现这三颗首级的照片是在西宁照的,而不是在高台照的。据骑五师河西医院院长张琪回忆:董振堂等烈士的首级在高台示众后送到河西医院,用烧酒制作的酒精泡在白铁皮桶子里,在河西医院放了两三个月后,由匪徒们送到西宁交给马步芳,并未送到中央领赏。运到西宁后放在伪中山医院保存,以后腐坏了,埋在中山医院西墙外的空地内。

孙玉清被害后又由喇文彬和马昌隆找了马车,将孙玉清埋在南门外体育场一个坑内。第二天

为了给孙玉清照相,喇文彬和马昌隆又到孙玉清被埋处,由喇文彬抱住孙玉清的肩膀,马昌隆将孙玉清的头割下来交给邴应南送到马步芳的一百师师部(地点在火神庙)照了相。

最后,董振堂、杨克明和孙玉清三烈士的首级,在西宁火神庙前被敌人摆在一条长凳上拍了照。

(责任编辑 刘文)



被杀害的西路军战士打包后准备送南京请赏

我军第一个驾机 远航的人

● 孔迎庆

1924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粤军中尉军官冯达飞闻讯后即辞去军职前去报考，被录取编入学生4队，成为黄埔一期生。

冯达飞，1899年出生于广东连县（今连州市）一个小贩家庭。其父早逝，家境贫寒，靠亲友资助，他才读了小学，中学。1919年9月，冯达飞毕业于县立连州中学，此时的他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立志报国，投笔从戎。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他接触了周恩来、蒋先云、陈赓等共产党人，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底毕业后他留校在教导团任职，于次年参加了讨伐反动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战役，在作战中他身先士卒，勇敢顽强。

同年3月，广东革命政府在苏联的帮助下成立了航空局，并在广州大沙头举办了飞行学校，由李维（苏联人）任校长，冯达飞由于学业优秀、作战勇敢而被选中，与其他7人一同被从东征前线调回，进入飞行学校学习飞行驾驶。入校后，每天安排4小时学习飞行理论课、八次飞行练习。

同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为了培养高级飞行员和空军指挥人员，决定派遣冯达飞赴莫斯科航空学校深造。经过学习，冯达飞已全面掌握了指挥等专业技能。学习结束后，党又选送他人莫斯科的苏联高级步兵学校进修，学习了苏联红军的正规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由于他成绩优异，毕业后又被选派到德国的炮科研究院将校组学习，在这里，他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炮兵理论和技术。

就这样，冯达飞成了我党我军当时唯一的一位进过院校最多的人，他既懂航空、步兵炮兵理论和技术，又有指挥大兵团作战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能力，同时又掌握了英、俄、德3门外语，是一位难得的军事人才。

1927年11月，冯达飞秘密回国，于同年参加了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后又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

左、右江起义。在广西的作战以及后来向湘赣根据地的转战中，冯达飞先后在红军中任营长、团长，在艰苦的作战环境中，他指挥镇定，多次率领部队化险为夷，充分显示出了他高品位的军事素质。1932年初，冯达飞先后被任命为红独立师师长和红八军代军长。

就在这年4月，中央红军转战福建，攻克了漳州，俘获了国民党空军的两架德造“容克”飞机。中央军委当即决定将飞机驾回“红都”瑞金。由谁来执行这一使命呢？惟有冯达飞。冯达飞赶到漳州后，立即对已损坏的飞机进行了认真地检查、修理，终使其中的一架基本具备了适航条件。这时的冯达飞已数年没有接触过航空飞行了，他凭着由于数年前刻苦学习航空飞行技术而留下的记忆，在没有领航图和任何导航设施的条件下，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毅然驾机起飞，在漳州上空试飞了3圈——第一圈摇摆；第二圈稳定；第三圈正常，尔后他便掉转机头向西北飞去。当时在漳州的数千红军将士都仰目天空，深深地为他捏了一把汗。

奇迹出现了。这架飞机飞越了闽赣两省的崇山峻岭，航程数百里，终于成功地降落在“红都”瑞金沙洲坝的一块草坪上，整个瑞金为之轰动……就这样，冯达飞成了我党我军第一个驾机远航的英雄。

当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冥想了半天，终于回忆起他当校长时那个不爱说话的黄埔一期的矮个子、大脸盘的广东人……不禁哀叹：怎么有本事、有胆量的人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后来冯达飞在红军中从事军事教育工作，执教炮兵科目，参加了长征。1938年秋，他从延安“抗大”调到了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教导总队副队长兼教育长。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意在消灭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时任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员的冯达飞在率部突围战斗中大腿中弹骨折，不幸被俘。

他在被国民党三战区长官部设在江西上饶的集中营关押期间，蒋介石对他这个“有本事、有胆量”的学生起了莫大的“招安”之心，曾指使在黄埔一期时任教官的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黄埔一期生、三战区政治部主任邓文仪（邓与冯在黄埔时同队并睡上下铺）前去诱降，对此冯达飞晓以哲理：“你们既知晓我是黄埔毕业的，可见得我反对蒋介石并不是盲目的；我到过苏联，可见得我知晓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1942年6月初，日军突破国民党军的浙赣防线，进逼上饶。6月8日深夜，按蒋介石、何应钦的旨意，冯达飞被宪兵八团秘密杀害，时年43岁。（责任编辑 刘文）

方志敏的最后知音——胡逸民

●
张林

1935年1月27日，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的方志敏，在江西怀玉山区给国民党打散后被捕。

1月30日他被解送进了南昌北营坊看守所，在这里，相识了原国民党中央监狱长胡逸民。

这个一生营造过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徐州军人监狱、汉口军人监狱，曾被称为“北伐军中刽子手”的人，是怎样和方志敏结为“生死之交”的呢？

1933年国民党在庐山制定了第五次“围剿”计划。会后，希特勒派来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携妻子回到南京。正好胡逸民的同乡、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胡春小姐，在其家里当家庭教师，于是趁其不备取得了会议的绝密文件，将它送到了党中央。

因胡逸民与杨虎城素有隔阂，且有一次为朋友之事，胡写信大骂杨虎城。此时的蒋介石为了拉拢杨虎城，便抓住泄漏五次“围剿”计划事件，让胡逸民当了替罪羔羊。

1933年秋天，蒋介石电命胡逸民速到南昌，一见面，蒋介石便大骂胡逸民是共产党的间谍，当即撤销了他的中央监狱长及其所有职务，并将其关进了南昌北营坊看守所。

1935年1月30日，天空下着大雪，此时，狱中流传抓到了一个共产党的三省主席，胡逸民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跟着过去看热闹。当时，他没想到，眼前这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大汉子，就是过去常听说的方志敏。

第二天，胡逸民再次来到方志敏的牢前，他想借机接触，了解些内情，却得到的是一脸蔑视。又过了些天，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的胡逸民，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打通看守所所长的关节，由所长陪他来到方志敏的囚室。

“我叫永一。”胡逸民用化名自我介绍，“我很同情你们，我从前在清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胡逸民是清党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曾经设法开脱过你们不少同志。”

方志敏仍是一言不发，但当他得知胡逸民也是囚犯时，对他现在的处境感到十分惊讶。方志敏开始向这个受优待的犯人，讲起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讲共产党人的信仰，并直言不讳地指责蒋介石是“破坏革命的历史罪人”。

临走时，胡逸民真诚地问方志敏有没有什么困难。

方志敏告诉他狱中无聊，想看点书。

第一次交谈后，胡逸民每天给方志敏送去报纸和各种书籍，有时还和他一起吃饭，情感逐渐增温。

方志敏初入监狱时，由于遭受惨痛的失败，心情特别沉重，行为十分急躁，一次因写好了的东西寄不出去，一气之下撕掉了所有的稿子。胡逸民知道这件事后，寻思再三，决定利用妻子探监和送饭的机会帮方志敏把稿子带出去，后来方志敏写的许多东西都是胡逸民妻子送出去的。这突如

其来的友情，使方志敏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寻找一丝心灵上的慰藉。

当时，蒋介石派人用各种手段诱降方志敏，为了方便写材料，把方志敏转到优待单人牢房，这个囚室恰好就在胡逸民囚室的对面，而新来的所长和胡逸民又有点私交，允许胡逸民在夜间到方志敏囚室闲谈。从此，胡逸民和方志敏对身世国事无话不谈。

交谈中，胡逸民把自己的出身，参加文官考试，当中央监狱长，以及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加入国民党等事全部推心置腹地告诉了方志敏。

一天，胡逸民对方志敏说：“第一位知我者是孙总理，你是我的第二个知音！”方志敏给以感激的目光。

真切、诚挚、坦荡地交谈，把两颗苦难的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一次，顾祝同带来蒋介石口谕见胡逸民，要胡逸民“劝方自首，将功赎罪”。

第二天，胡逸民把顾祝同让他劝降的事坦率地告诉了方志敏。

方志敏嗤鼻一笑：“老胡，投降那是大笑话，自从我被捕入狱以后，在这里实际观察的结果，更证明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是十分正确的。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铮铮之言使胡逸民脱口赞道：“好样的，不是软骨头！”

胡逸民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感慨地说：“我感到方志敏信仰坚定，胸怀广阔，是一个非凡的人才，狱中结识他，是我一生中不幸之大幸。”

一天，胡逸民告诉方志敏，本来拟定要枪毙他的文件，现在批成了“缓办”，方志敏面对有生的希望，便和胡逸民商量，求他帮助安排越狱。

胡逸民知道，越狱不但希望渺茫，而且一旦失败，说不定连他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得搭上。但良知告诉他，作为方志敏生命中的最后一位朋友，他没有理由拒绝这个请求。

胡逸民想利用监外就医的机会，让方志敏乘机脱身，但由于方志敏是重犯，上面以“病不严重”为由，不肯让方志敏到监外就医，所以这

个“行动”很快就夭折了。

第二次胡逸民找妻子在外面借来四百多块钱，买通了所长和一些看守。一天晚上，趁着夜黑人静，方志敏刚逃出了监狱，国民党特务早就在监狱的外围布置了大量的哨兵，方志敏走出大门不远就被他们发现了，重新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1935年秋，蒋介石带着一帮人马来南昌对方志敏投降，先是对其赞扬一番而后许以高官厚禄，但蒋得到的却是“我的生命只有36岁，你赶快下令执行吧！”

对于方志敏的“顽固不化”，蒋介石感到异常的气愤，离开南昌后不久，便下达了“秘密处死”的命令。

8月初的一个晚上，在黑沉沉、阴森森的监狱里，方志敏告诉胡逸民，也许这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了。后方志敏从床底下取出一些稿子，交到胡逸民手里，拜托他出狱以后，把这些东西交给鲁迅先生，并把一封写好了的介绍信交给了他。胡逸民噙着泪水一个劲地点头，他知道这位亲密的“囚友”是在安排后事。

1935年8月6日，蒋介石下令把方志敏秘密地枪杀了。

得知方志敏被害的消息，胡逸民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写下了一首小诗，诗中寄托他的内心情感和他对方志敏的无比崇敬之情：

伤心今日泪如丝，忍看方郎作国牺。

三界英华今方尽，一朝事迹夕阳知。

江山顿觉灵光天，草木同深陌上愁。

最是逢君偏易别，泪痕犹染白杨枝。

1936年秋，在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出面说情和冯钦哉将军的担保下，蒋介石释放了胡逸民。出狱后，胡逸民先是到杭州，然后下决心去上海找鲁迅先生，完成亡友的遗愿。到上海后，他按信上的地址找到了鲁迅寓所，但碰巧鲁迅不在。第二天，胡逸民把这些手稿交给章乃器和胡子婴，二人答应一定面交鲁迅先生。这些手稿中包括《可爱的中国》、《清贫》和《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其中最后一篇还记述了与胡逸民交往的经过。这些珍贵的文献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责任编辑 刘家驹）

保举徐向前考黄埔军校的人

● 何 奇

《徐向前传》和《历史的回顾》两书，记载1924年，在太原，徐向前经其兄认识的一位姓郭的军官，保举他考了黄埔军校。这位姓郭的军官是何许人呢？他就是我的祖父郭宣三。

最近，我看《徐向前传》，发现该书编写组的同志们对那位姓郭的军官保举徐向前考黄埔军校一事，作了一番分析。书中讲到，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与会的国民党员和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共产党代表，都受到委托，回到各地选拔优秀的进步青年去报考陆军军官学校。因此，编写组认为：“看来那位在太原阎锡山部队的姓郭的军官，所以保荐徐向前一行10人考黄埔，也是事出有因。”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想方设法找到《徐向前传》编写组副组长(主编)张麟，跟他进行了诚恳的交谈。张麟说：“徐帅对那位姓郭的军官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印象很深，那位姓郭的军官是徐帅的哥哥认识的。”我问：“徐帅是否讲过那位姓郭的军官的名字？”张麟说“徐帅没有讲，我们也没有问。”

那么，情况究竟如何？现将我知道的情况及祖父的为人如实地叙述如下：

我祖父叫郭懋德，字宣三，山西省定襄县智村人，生于1886年。辛亥革命后，他考入阎锡山创办的警官学校，毕业后，先当巡官，后任定襄、繁峙、静乐、潞安等县公安局局长和太原市第一区公安局局长。1929年辞职回家，在村里当村长。保举徐向前报考黄埔军校的事，就发生在他任太原市第一区公安局局长的时候。

祖父跟我讲徐向前考黄埔军校的事，是在说念我父亲的情况下顺便讲的。我父亲郭克勤，20世纪20年代初，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白区从事党的军运情报等工作，1936年任北方局军委军运领导小组秘书长，1938年春到晋察冀边区，1939年在“反托派”审查中被错杀(1998年中央组织部予以平反昭雪)，但当时家里人并不知道他的不幸遭遇，因此，长期打听不到他的下落，祖父母经常说念他。

皖南事变后，1941年2月的一天晚上，祖父对我说：“发

生茂林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军在安徽茂林地区包围消灭了新四军一万多人，叶挺军长被俘，项英副军长牺牲，不知你爸爸是不是在那里，他也可能牺牲了。”祖父还说：“大革命时期，我认为蒋介石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1927年‘4·12’清党后，我看出蒋介石不能容人，要独霸天下，现在小日本入侵，大敌当前，他却自己人打自己人，真是！”停顿了一会儿，他深沉地说：“你爸爸是做事的，不像我是混事的。1924年我做太原市第一区公安局局长时，徐向前来太原找工作，徐向前的哥哥徐寿谦同我是半个老乡，他是五台县永安村人，没有修汽车路以前，咱智村是五台、定襄到太原的必经之路，有个车马大店，供来往行人打尖住宿，徐向前和他哥哥，有时就住在咱家，来往比较多。在太原，徐向前有时也来咱家坐坐。我对徐向前谈过你爸爸，我说：‘我本想让克勤(我父亲)和阎锡山军政要人的儿子们多来往，将来在官场上也好有个照应，可是克勤不听我的话，总是和那些家境贫寒、思想激进的同学接近。’徐向前说：‘孩子们的事你别管，

他愿接近谁就接近谁吧！我看克勤是个有作为的青年’。”祖父说：“有一天我对徐向前说，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革命学校，在上海招生，要不你考黄埔军校吧！徐向前同意后，我介绍他考了黄埔军校。现在，人家徐向前是八路军赫赫有名的领导人，你爸爸却打听不到下落，他可能牺牲了，唉！”当时，听了祖父的话，给我的印象是，祖父既埋怨父亲不听他的话，没有走升官发财之路，又赞赏父亲不自私自利，有崇高理想，是一心进行革命事业的人，而且徐向前是支持父亲的。那时，我15岁，正在高小读书。

1937年“七七事变”后，祖父忧心忡忡地说：“发生卢沟桥事变了，日本人贪得无厌，占了东三省，还想侵占全中国。亡国之奴，不如丧家之犬，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了。”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抗日的思想。可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他又当了汉奸。1938年5月，有一天我们刚吃完早饭，日本鬼子突然来到我家，要祖父进县城担任伪警务局局长。祖父不想去，竭力推脱。他说：“我年纪老了，身体有病。做不了，请另找别人吧！”日军头头很不高兴，板着面孔，硬要他去。与日寇一块来的伪县商会会长李能文说：“宣三兄，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走吧！”就这样，祖父被强迫进城，当了定襄县伪警务局局长。大约在1940年的一天晚上，日军头头带着几个日本宪兵恶狠狠地来到祖父在城里的住处，把他

逮捕了，投入宪兵队监狱。原因是，前几天夜里，中共定襄县基干游击队摸进城里活动，给日本鬼子造成损失，有人向日寇告密，说我叔父郭克俭是八路军，可能和我祖父有联系。徐向前后经家里托人情、花钱，保释出狱的祖父，没有敢



徐向前

回智村，先在忻县城住了一段，后转到太原。在这个时期，祖父的心情是十分忧郁的。

1943年，祖父回到智村。他支持我参加中共太原地下党工作。以后又支持我爱人董文祥从敌占区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村党支部书记杜二好被敌人逮捕，他亲自进城保释出狱。中共县区干部时常来智村看他。中共定襄县政府认为他是个开明绅士。不幸的是，1948年春夏之交，伪39师来智村要接他到忻州城，说是保护他，他不去，藏在邻居家，被搜出，迫使他到忻州城，后转到太原居住。

1949年4月24日拂晓，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徐向前下令总攻太原城。几百门大炮向太原城垣轰来，震天动地。开始，我祖父、祖母、婶子和八岁多的弟弟（郭兴华）躲在床铺下。大约上午七八点

钟，祖父从床下爬出来，站在床上，从后房墙的小窗户向街上瞭望，见解放军已经打进城，从东向西冲来，他高兴地说：“进来了，解放军进来了！”他想太原解放了，就能见到自己的亲人。就在这时，解放军从城外打来的一颗炮弹，正好落在他们住的房子上，一瞬间，他不幸地了却了自己的一生。与他同时，从床下爬出来正在捅火做饭的婶母也被砸死。

当时，我是中共太原市东北工委秘书，太原解放后，当日进城，第二天抽空去看望他们时，见到的就是这个惨象。一直在床下躲着没有出来的我的奶奶和弟弟，向我叙述了上述情况。

（作者原名郭重华 中国企业联合会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程度）

王树声警卫何福圣 与 许世友比武

● 云 龙

王树声的警卫员何福圣，绰号崽哥，家住河南光山县仁和集。何福圣 10 岁那年，父亲决定让他拜武林高手邱固元为师，随邱学习武艺。邱固元师承僧门高手，拳脚器械无一不通，内功更是十分了得，曾在一个赶集日里当街一拳打死一头疯牛而名声大噪，所以就连这一带的悍匪都对他畏惧三分。能跟这样的武师学艺，何福圣自然高兴异常。

师父对徒弟要求很严厉，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从不懈怠。在邱固元手下足足学了七年功夫的何福圣，已长成高大壮实的小伙子，而且功夫在师兄弟中也算得佼佼者。

1931 年 9 月的一天，鄂豫皖一带大名鼎鼎的老三十团团长王树声特意前来仁和集武馆拜望邱固元。他带了一个班的红军，有长枪也有短枪。邱固元很佩服这位二十来岁的青年团座。为了显显自家气派，师父特地挑选了何福圣和七个精神抖擞的师兄，一式对襟黑短褂，一色崭新的驳壳枪，齐整整地立在他两边。

师父设宴款待王树声，何福圣和一帮师兄则在外面的大坝子上陪红军士兵畅饮。送走王树声的当天晚上，师父就叫徒儿们把仁和集的三百多名赤卫队员全部通知到武馆院子里。邱固元当众宣布，他已接受王树声团长的劝告，把仁和集保民团的队员拉到新集去参加红军，不愿跟他走的不勉强，愿意跟他投红军的，回去安排一下，天一亮就随他出发。

第二天上午，82 个追随者跟着邱固元当晚

便赶到新集红三十团驻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带去的人马被编为特务连，师傅任连长，何福圣虽当上个班长，但实际上仍给师傅当保镖。那一年，他才刚满 17 岁。

参加红军没多久，红军就大举进攻高家寨。这次打高家寨，许世友担任敢死队队长。不幸的是，他攻到城墙脚下时却被插木砸中头部，当场昏死过去。幸亏被罗应怀等敢死队员奋力将他救回，躺了一个多月，命虽保住了，一身武功却从此大打了折扣。

战斗激烈时，老三十团的特务连也拉了上去。几次冲锋下来，邱固元阵亡，还丢了二十来个弟子。何福圣跪在师父的尸体前嗷嗷大哭，邱固元死时还不到 35 岁。可惜了他一身好武艺，周身被机枪子弹打成了个蜂巢。

战斗部队撤回新集后，已经升任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就将何福圣调去当他的警卫员。实际上，他还兼任起了武术教官，团部的一帮人都来找他学功夫，连队的不少人也跑来拜师，因为当时红军中大力提倡官兵习武。这样，军内外很快便传开了：王树声的警卫员崽哥是个武功了得的高手！

1932 年 5 月上旬，鄂豫皖苏区党代会在新集召开。代表们在竹棚里开会，各级首长带来的警卫员无事可做，便聚在坝子边上摆龙门阵。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认识何福圣或听人说起过他的名字。这时便鼓动他走几路拳脚，让大家开开眼界。小何年轻气盛，禁不住众人捧，想露上一手，

但又担心影响开会,就说在这里不合适,嘈杂起来影响了首长开会可不得了。有人便提议到附近的城隍庙坝子上去。于是他在百余名警卫员的簇拥下到了城隍庙。何福圣先打了一路僧门的看家拳“虎抱头”。稍一凝神,把气运上,一个覆手便打将起来,气势风猛而动作干净利落,顿时激起一片叫好声。走罢拳,何福圣又找来了一根木棍子代剑,舞了一套“惠灵剑”,赢得了众口喝彩。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一到会场,邝继勋军长的警卫员李守贵给他透风,说十二师的许世友团长,听说何福圣武功了得,一会儿要来会会他。何福圣一听就急了,这许世友出院后刚调到红十二师当上了团长,而自己只是个警卫员,怎好和这位全军知名的大英雄比武?而且他早就听说许世友在少林寺当过几年和尚,武艺高强,尤擅腿功,心里不免有几分敬畏。

会间休息时,就见一大群党代表走出竹棚,来到了坝子边上,王树声副总指挥也在里面,他笑呵呵冲何福圣喊:“崽哥,快过来。这位是许团长,他听说你武功厉害,一定要来以武会友,你莫怕他,把他丢翻了,我这里有赏。”许世友笑嘻嘻地把军帽揭了,紧紧腰带,嚷道:“谁丢翻谁,还得拳脚上见哩,莫把话说早了。”何福圣见大呼小叫着赶过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便紧张地说:“许团长,我们……以武会友,点到即止。”

许世友咧嘴一笑,豪爽地说:“你莫怕!我要挂了红、带了彩,决不怪你。大家都是会家子,武德为重嘛。”说罢,亮了亮招,示意他招架,紧跟着就攻步上前进击。何福圣只好出手相迎,几招过后,他见许团长底盘扎实,身手朴实严谨,绝非花架子。但许似未摸到何福圣的虚实,所以也不敢贸然起腿。交手十余个回合,谁也没占到便宜。王树声在一旁见自己的警卫仅是一味游走闪避,不敢主动攻击,知道他心中有压力,就大声喊着给何福圣打气助威:“崽哥,莫打让手!丢翻了他,我赏你两板子弹!”警卫员们也一齐吼喊:“崽哥,上、上!”

这一阵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助威声显然刺激了许团长,只听他大喝一声:“小心,我来了!”话音刚落,他便展开猛烈攻势,何福圣虽仍是一味游走闪避,却渐渐看出许在急欲求胜中露出了可乘之机。

此刻,观战的人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将他们围了个密不透风。何福圣偷眼看到不久前刚到鄂豫皖的张国焘主席与邝继勋军长等好些高级首长也都站在一旁观看,他心想,无论如何,还得让许团长下得了台。于是他便以“克法”出拳,让许团长占尽上风。

许世友果然腿上功夫厉害,裹风挟雷,频频向对方袭来。何福圣暗暗聚起内功,当许世友又一腿向他腰部扫来之际,他提足气、牙关一咬,身子猛地一扭,装着避闪不及的样子,用肩背之际硬接了对方一记飞腿。围观者看来他是重重地挨了一下,许世友却不糊涂,脸上顿时露出惊讶之色。然而他这一腿已让何福圣胸中有数,再度交手时见许团长刚一起腿,何突然急步上前“抢背”,紧跟着一记“劈山靠”,将许世友仰面朝天地掀翻在地。顿时,掌声、喝彩声打雷一样响起。

何福圣慌忙上前,双手去搀许团长。许世友一跃而起,连声道:“厉害,厉害!暗地里让着我三分,我许世友仍不是他的对手。”邝继勋军长笑道:“你这许和尚,刚从医院里出来,身虚力乏,咋能登场较技?”

“小鬼,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啊?”张国焘满面笑容上前问何福圣。在后人看来,张国焘是一个历史罪人,可是,那时候的张国焘就是共产党的化身,威风凛凛,赫赫有名。

“报告主席,”他向张国焘行了个军礼,大声回答,“我叫何福圣,是王树声副总指挥的警卫员。”张国焘赞扬道:“好,很好!红军战士,就要像小何同志这样,精精神神,会打枪,会武功,上了战场,才能以一当十。”随后张国焘拍了拍站在他旁边的王树声的肩膀,笑着说:“小何是红四军中的一个宝,你要给我好好爱护哟。”

话虽如此说,王树声却已经没有机会来爱护这位“爱将”。不久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周纯全便通知王树声,速调何福圣去担任张国焘主席的警卫员!夜里,王树声叫伙房宰了一只鸡,给何福圣饯行。

次日一早,何福圣得意洋洋地走马上任,当上了战友们开玩笑说的“御前带刀侍卫”。那时怎么也没想到,他踏上的竟是一条充满风雨泥泞的人生路。

(责任编辑 刘文)

由“管好身边人” 想到曾国藩家书

● 曾彦修

年来，我看到一些文章，甚至是一些号召叫做“管好身边人”，这身边人大概是指配偶、子女和秘书等吧。长时间以来，我对这个提法颇感惊奇，正像号召共产党领导人要“廉政”一样，我也一直对此同样感到有点哭笑不得。何谓“廉政”？不就是不贪污、不敲竹杠、不营私舞弊么，就是说，不要做贪官污吏，这算什么标准呢！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全人类的解放，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贪污、不盗窃（不好听吧？其实，廉政的意思就是如此，即只收俸禄以内的收入），实实在在是任何一个普通人的起码做人标准。

“管好身边人”，开始我也觉得同样可笑，共产党员要管好一个部、一个省、一个所、一个局、一个县、一个公司……他要禁绝所辖范围内的一切贪污舞弊，怎么连“身边人”也管不好呢？不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儒家的理想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仅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两事，连“齐家”都办不到的人，“修身”未必会好到哪里去。

因为修身不能不包括齐家在内，如果身边的人五毒俱全，自己就那么纯洁如玉吗？会不会也有点《官场现形记》中的人物的味道呢？

现在大家都在谈悬鱼太守的故事，我也来凑个热闹，说说“身无长物”的故事（长，去声，读如丈；长物，多余的东西）。这是东晋时期一个高官王恭的故事。有一次他从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回到京师建业（今南京市），他的叔父王忱去看他，一屁股坐到竹席上，好不快哉！于是叔叔对侄儿说，卿从那边来，这东西不稀奇，送给我一张吧！王恭即命人将此席送去，自己又只好坐在草垫上了。后此事被叔父得知，便对侄儿说：“‘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晋书·王忱传》及《世说新语》均载有此事，“世说”先出，且较生动，此处引“世说”文字。）这就留下了“身无长物”这么一句光照千秋的美谈。一个“身无长物”的旧时的高官，与某些贪污腐化、腰缠万贯、车府成群、外室成行的大中小党员官员比起来，如北京那个王宝

森副市长什么的，究竟哪个有点人味呢？当然是一千七百多年前那个“身无长物”的王恭倒更像一个人。

话转回到曾国藩家书来。此书我曾读过两遍。第一次在延安，是听毛泽东说“曾国藩家书也可以看看”的非正式传言之后很久才看的，第二次是解放后购得亚东图书馆的标点本之后看的，觉得受益不浅。（我家这些书连同陈独秀、胡适、梁启超、钱穆等人的书都已经在“文革”时作废纸紧急处理了。）那家书的史料价值也不小，这一点此处不去谈它了，这里只说一点曾国藩治家的严明作风。他长年在外指挥作战（攻打太平天国），留一个弟弟曾国华在湖南湘乡县乡下主持家务。曾国藩不断地与家中有书信来往，几乎封封信都是告诫家人要勤俭持家，切勿摆富贵架子的。曾国藩反复对弟弟讲，历来的巨室豪门，几乎没有持续三代的，不是败在第二代手里，就是彻底垮在第三代手里。（广东话骂人“二世祖”或“二世主”，就是说第二代就堕落得不像样子了。）他反复要家人以此为戒。他强调

家境要不垮,就必须抓住“书蔬鱼猪”四字不放,即自行经营或动手干农副业生产,还要加紧读书(当然是为了做官),家业家声才不会败坏下来。他警告家中,切不可仗势欺人,要和睦邻里,周济贫困。他告诫弟弟曾国华进城(县城,距曾宅40里)办事,能走路即走路,尽量不坐轿子。要即去即回,尤其不要去拜望知县,免去结交官府之嫌。他也不时叫人送点银子回家,数目都不大,以几十两、百把两的时候为多,而且有些是指名用以周济穷困本家及亲友的,谁家几两,谁家几两,都清清楚楚。家信中语多亲切平常,并不带多少教训口气,易于使人接受。对于他在家中的儿子曾纪泽的读书,尤其管教甚殷,经常要文章和习字去看,然后复信一一指出优缺点。曾纪泽后来成了清末有贡献的爱国外交家,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手边无书,上述银两数可能不精确)

我在南京及湖南均曾请教过一些同志,回答都是说曾家的后人,不听说有衰败得不像样子的,大多有所成就。例如,曾昭抡、曾昭燏、曾宝荪等,都是他家的直系后代。还有一位在台湾做大学校长,名字我一下想不起了。这与曾国藩一贯的严于家教而又善于家教,是不是有点关系呢?

现在管不好身边人(主要是后代)的大小官员,好像不在少数,因特转介曾围藩治家二三事,藉供有心人参考,幸垂察焉。不过,我明知这大约是白费力的事,并不真想有谁会去听我的废话的,自求解闷而已。

(责任编辑 杜晋)

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字都有相似的功能,汉字不同凡响的是,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之一,又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字体系。埃及的图画文字和巴比伦的楔形文字都已消逝,只有汉字沿袭几千年不衰。但是在西方中心论者的心目中,并不轻易承认这一事实。1667年德国祈尔歇的《中国图说》,1716年法国尤埃的《古代商业与航海史》,1758年法国德经的《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都认为中国文字传之埃及,这是一种偏见,因为直到18世纪古埃及的文字尚未得到解读。真正使这种说法不攻自破的,是一百年前,中国考古界一项伟大的发现:甲骨文出世。

1899年,北京翰林院王懿荣患病服药,发现名为“龙骨”的中药,带有类似铭文符号的碎骨片,经他研究认为这是三千多年前商代的遗物,由此发现了河南安阳小屯村的遗存,1936年发掘有1万7千片之多,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殷墟。

至今,出土的甲骨文已在15万片以上,每片字数少则一、两个,多的达130个,如果每片以10个字计算,15万片就有150万个字。它,字源雄厚,字义精细,生动传神,三四千年前的文字以如此高的质量和巨大的数量传到后世,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

然而,汉字在近代中国又蒙受过不白之冤。

辉煌的古代,屈辱的近代,迫使中国人民从沉睡中奋起,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些人以为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是由于民智不开,民智不开的主要原因是文化不普及,文化不普及是因为汉字难学、难写,一时汉字落后论呼声甚高,甚至主张废除汉字。诚如一切事物都未必尽善尽美,汉字笔划复杂,也给初学者带来一些困难,然而要文字承担国运衰败,民智不开的重责,岂不是不白之冤!

汉字落后吗?日本本来没有文字,纪元后日本借用了47个汉字,就能记写全部的日本语言。

汉字,有形可识,有音可读,有义可寻。从古到今各种书体都

永不凋谢的汉字

刘志琴

能被今人辨认,六千年畅通无阻,世界上还有哪种文字能与它匹比?

一些有识之士遵循文字发展的规律,寻求改革方案,取得卓越成效。辛亥革命后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建国后多次公布汉字简化方案,这对普及初等教育起了促进作用。每一步改进都使得汉字更加方便使用,更利于文化的普及。它特有的生命力显示,不是汉字落后,而是科技不发达,汉字研究手段的落后。

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使汉字重放异彩,赢得世界声誉。

1973年5月,美国费城举行第六次世界人类能力开发会议,在会上获得金奖,被授予“对世界人类作出贡献的”,是日本学者石井勋先生提供的,对日本儿童学习汉字提高智力的论文。他从1968年起就进行此项专题研究,探索“提高幼儿的智能,汉字是个未解之谜”。认为汉字的构成有很强的逻辑性,如学过“目”字,看到“见”字就会发生与目相连的联想;学过“鸪”字,见到未学过的“鹰”字,会想到这是飞鸟。通过大量实验证明,“汉字比语言更易默记”。

1982年5月,英国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刊载心理学家理查德·林的文章,引起世界轰动。文章披露日本、英国、美国、法国、西德五个发达国家的学者,通力合作,在共同的智能测试中,各自对本国的儿童进行智能检查,结果表明英、美、法、德的儿童智商是

100,惟有日本的儿童达到110。对这一结果的分析表明,大部分的欧美学者认为“学习汉字可能是个原因”。美国的梅尔·莫尔斯推测:“是否学习汉字,使得把握复杂结构的几何学的感觉特别发达”?

汉字实验证明,文字的形式联结比形音联结坚固耐久。使用汉字对左脑和右脑潜力的开发呈均衡的优势。汉字对开发智能的作用已超出中国,在世界也是个未解之谜。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与发达国家尚有不小的差距。当计算机在发达国家普及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出席国际会议,还在用笔作记录。汉字能不能编码输入计算机?中国五笔字型的发明人王永民拍案而起,首创五笔字型输入法,从此以后,表形码、自然码,万码奔腾。能多维编码的文字,容有大承载的信息量。

以形表意和一词多性的灵活性,使得汉字具有强大的造字功能,只要用六千多个汉字的不同组合,就能对付信息时代的知识爆炸。

汉字是世界上惟一独创的方块字,形、音、义的最佳组合,不论是从形、从音入手,或者形音并用,都能在电脑上游刃有余。由于汉语的音节只有英语的六、七分之一,特别适合物理通讯要素的需要,因而获得有可能成为声控电脑第一语言的美誉。科学技术在当代的发展,重新发现汉字蕴有巨大的能量。

汉字,葆有永不凋谢的青春!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不能

改革开放不能忘掉革命英烈和革命传统。现在我们回顾百余年来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历程,首先应当充分肯定千千万万革命前辈和先烈的丰功伟绩。一部伟大的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就是革命人民的血泪奋斗史。

在现代中国的革命过程中,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抛头颅,洒热血。据统计,中国工农红军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前,已发展到30万人的大军,但是长征到陕北的时候,全军却只剩下了七八千人。抗日战争中我国死亡了3500多万同胞,其中不少人是在战场上和刑场上献身的英雄烈士。决定中国命运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中,也有百万以上献身。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也有大量英雄光荣献身。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人事的变化,当今已存在着忘记革命英烈、丢掉革命传统的实际危险。事实上,在有些地方英烈已被遗忘,革命传统已被丢掉。尤其是在经历革命历史的老年人越来越少、不了解革命历史的青少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如果不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教育,革命传统和

遗忘革命英烈

● 何辛

革命英烈就可能被慢慢地遗忘掉。战争时期河北老区赤城县，当时全县只有 7.5 万多人，但在战争中却死亡了 1.5 万多人，其中大多数是为革命献身的英雄烈士。可是 1983 年这个县修建烈士纪念塔时，只收集到 2000 多烈士的姓名，其余大部分烈士姓名都不知道。1983 年，笔者遇到一个青年，他是 1948 年牺牲的一位烈士的孙子，这个青年告诉我：不知道他爷爷怎么死的。按照他的回答：“我爷爷死时还没有我，我爸爸死时我还不懂事，我长大后又没有人给我讲爷爷的历史。”乍听这位青年的话，感到震惊，但仔细一想，不能怪青年人，主要是老年人没有尽到责任。由于长期忽视宣传英烈事迹，青少年对英烈的纪念已很淡薄。一位参加过大庆石油大会战的老干部异常感慨地说：“现在石油系统工作岗位上 20 多岁的小伙子，不仅不知道革命时期的著名英烈，就连王铁人也不了解了。”

还有些事令人痛心。1928 年爆发的陕东渭华起义中壮烈牺牲的著名农民运动闯将、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共产党员薛自爽烈士的坟，竟在解放后连续不断地横遭平

毁，他的遗体在战斗结束后被匆忙埋在战场一角，后来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其堂侄在革命仁人志士的支持下，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将薛自爽烈士的遗骨迁回老家坟地。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尽管敌人对烈士坟墓视若眼中钉，但因他们怕激怒人民，也没有敢动它。不幸的是在解放后却被“革命后来人”一次次地平毁了。同时有不少在那次起义中献身的烈士也遭受到这种待遇。直到 1988 年，才修建了渭华起义纪念馆、烈士纪念塔，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徐向前、习仲勋等题了词，并首次举行了渭华起义 60 周年纪念会，才使九泉下蒙冤受屈的革命忠魂得以安息。去年清明节，笔者为薛自爽扫墓，发现薛坟又被破坏了，遗骨不知迁往何处。据报载，延安市志丹县境内，由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刘志丹烈士纪念陵园，也遭到侵占，陵地被开挖盖上房子，果木被挖掉不少，类似的事件其他地方也时有发生。我认为事情虽然发生在基层或普通群众中，而根子却是由于有关部门长期忽视对英烈的宣传，以致造成群众尊敬英烈的社会意识淡薄。这类事件的严重性

和危害性万不可轻视，表面上看破坏的是个别烈士陵园，而实则是在挖掘人们头脑中的人民共和国大厦的基石！

上述触目惊心的情况，与我国崇高的民族精神相比有多么大的反差啊！这说明，在目前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加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革命传统的宣传教育，努力提高民族精神是多么重要、多么急切、多么刻不容缓啊！

小平同志说得好：“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像我们的前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

我们现在已经走进新世纪，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把继承传统（包括革命传统）和创新结合起来。中国有句老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乘凉的后人，必须爱护前人栽的树，对它浇水、施肥、除害，使它继续生长壮大、枝叶茂盛、长青不衰。我国人民现在乘凉的这棵大树，是百余年来全国各族人民用生命和鲜血培育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树。我们要坚持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这样才能使这棵社会主义大树永远长青，为子孙后代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未来。

（作者系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国共两党斗争中的《大公报》

● 舒 展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直到今天仍在香港特区继续出版。如今它已度过跨越两个世纪的百年寿诞，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报业史上，算得上是一大奇观。评说与考证《大公报》领导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百年沧桑》，作者是中国杰出的政论家、《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先生的哲嗣王芝琛。我觉得对《大公报》是一份厚重的百年纪念贺礼！

自从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以“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以来，其社训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数十年来，以胡政之、张季鸾和王芸生为首的领导人，是遵守这“四不”社训的。上述的“党”字，我以为是用孔子的“君子不党”

（《论语·述而》）的原意，即“正直的人是不偏袒的”，更不应结党营私。事实上，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大公报》自我宣称的就是“自由主义”与“中间路线”。

我想举钱钟书为例，他既非中共党员，也非国民党员，但他却是《大公报·世界思潮》的积极撰稿人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发表了《为什么人要穿衣》、《休谟的哲学》等大量纵横捭阖的精彩文章。

萧乾也是无党派人士，他曾先后四次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发现培养了大批作家。杨绛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璐璐你不要哭》，就是20世纪30年代经萧乾发表的。另外，他们还设立了文艺奖金。卢焚的《谷》，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均得了奖。此外还发表了陈白尘轰动一时的独幕剧《演不出的戏》；胡绳的《上海通俗化问题之讨论》及《偶然论在上海》；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给刘西涓先生》；曹禺的《我如何写〈雷雨〉》……

任何报刊都有它的倾向性，或激进、或保守，或革命、或反动，有可能实行“中道而行”吗？

以胡、张、王等领导人所办的《大公报》，以出色的独家政论为最大特点，它培养出了大量名记者，许多大公报人成长为新闻界的名人，例如：范长江（建国后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杨刚（建国后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萧乾（1939年——1942年，任《大公报》驻英记者），彭子冈（解放后任《人民日报》记者、《旅行家》杂志主编），其他的诸多名流还有：徐铸成、李纯青、梁厚甫、曾敏之、费彝民、陆诒、梁羽生、唐人、徐盈、金庸、谭文瑞……真是群星璀璨，光彩夺目。其中李纯青、杨刚、彭



方成 1989

子冈、徐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大公报》几位领导人对他们的政治身份,采取睁只眼、闭只眼,心照不宣的态度。

《大公报》从张季鸾等人接办以来,20世纪20年代提倡民主政治,文人论政,主张保护与发展民族工商业。北伐战争期间,抨击军阀吴佩孚;后来抨击过汪精卫和蒋介石,也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过攻击。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此报因主张“缓抗”,受到读者警告和反对。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谴责日军侵略,支持十九路军抗战。1934年1月,辟“星期论文”,成为该报一大名牌专栏。约请胡适、丁文江、翁文灏、梁漱溟等名家撰稿,影响很大。1935年9月开始发表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向全世界公开报道红军长征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主张,引起极大轰动,集结成书后,半年内印行七次。1936年西安事变后,范赴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荣誉奖章,胡政之、张季鸾对美发表广播演说,一再强调“民主政治”和“文人论政”。同年9月6日张季鸾病逝,《大公报》正式成立社评委员会,经常撰写社评的有王芸生、李纯青、徐铸成等。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社评的基本立场是坚持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的妥协腐败,这是最得民心的大举措。1942年2月1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揭露国民党政府歌舞升平,无视河南灾区惨况,被当局责罚停刊3天。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社评的基本立场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反对内战。但也发表过一些混淆是非的社评,如1945年11月的《质中共》、1946年4月的《可耻的长春之战》,受到中共《新华日报》的批驳。随后,《大公报》载文反对内战,批评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和文化专制政策。1948年7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指名攻击总编辑王芸生。1948年11月,香港版《大公报》发表《和平无望》社评,宣布转变立场,靠拢人民。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2月27日,天津版《大公报》改组为《进步日报》。5月25日上海解放,王芸生等从解放区赶赴上海;6月17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纸归人民所有。1953年1月1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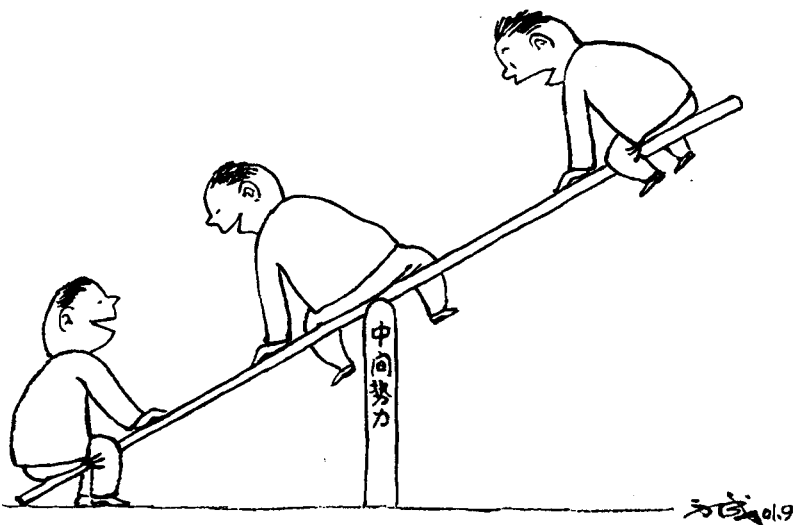
海馆北迁,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在天津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1956年10月1日经彭真请示毛泽东同意,该报由天津迁至北京出版。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陆版于当年9月10日停刊。在内地,《大公报》总计出版时间达六十四年零两个月。

对《大公报》的褒贬评说,一直是中国新闻史、政治史上争论不休、聚讼纷纭的大问题。笔者认为,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认识:如何看待中国政治的“中间势力”及其中间路线?他们比起国、共两极来,人数多得不可比拟。他们站在哪一边,这才能决定哪一边是赢家。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才有可能廓清《大公报》的是非功过,还它一个历史主义的公道评价。

20世纪30年代,在左翼文化工作者中,流传着一句出自王明的名言:“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这话是大有来头的——来自“共产国际”。斯大林说:“原则问题上的中间路线是引起思想混乱的路线,是掩饰意见分歧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灭亡的路线”(《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6页,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主义倾向》)。

然而毛泽东把团结中间势力的统一战线视为与党和军队平列的、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他认为:“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毛选》第二卷第783页)他还说:“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毛选》第二卷第742—743页)

中间势力的作用,我可以举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邓演达为例。他一方面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政权;另一方面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中,并非共产党员的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恺和于邦齐等优秀人物,惨遭蒋介石特务的杀害;知识界很有威望的



重量级人物黄炎培、张澜、沈钧儒、史良、胡愈之、楚图南、费孝通等都是中共反蒋的战友。

1948年5月1日，中共向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发出号召：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很快就得到了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及其他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拥护，并于5月5日公开通电表示支持。但是，这些支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大多数还分散在全国各地。怎么办呢？党中央决定，为了及时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辗转解放区，特别是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由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等同志，租船把他们秘密送往青岛、塘沽、大连，然后到河北平山集合。当时，由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有：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邓初民……以及许多作家、演员，还有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总共有350人以上。《大公报》总编王芸生当然也在其中。这就是中共重视爱国统一战线的最有力的证明。

团结争取中间势力，不仅是党在30、40年代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也不仅是要在当时不折不扣地付诸实行的问题；我认为，它还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理论问题。

对团结争取中间势力真正进行了理论思考的，我认为是晚年的胡绳。他说，解放前的中国文

学界，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中间势力占大多数，政治也是如此，中国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

我认为《大公报》在20世纪20、30、40年代之所以赢得了那样众多的作者和读者，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中间势力的声音。1944年春中外记者组成赴延安参观团，当时国民党骂共产党为“匪”时，毛泽东对

《大公报》记者孔昭恺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他还说：“抗日战争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此言极是！当时，各国在重庆的驻华使节，最爱聆听的是张季鸾为他们作世界与中国的形势报告。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关系好到这种程度：不用事先通报，随时可以面见老蒋。他与周恩来更是密友，在他肺病病危时，守护在身边的朋友有周恩来和老蒋派来的卫生部副部长。这个平静场景，就像是一幅油画：两极对中间势力的激烈争夺。

张辞世后，蒋介石为拉拢王芸生，让他赴美访问，后因特务报告：王与周恩来往来密切，此行乃作罢。

《百年沧桑》作者王芝琛说：国共两党对《大公报》所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都是反对的。毛泽东称自由主义者为“民主个人主义者”。有意思的是，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把《大公报》及其总经理胡政之，纳入“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之列进行拉拢。在胡政之赴香港恢复《大公报》香港版前来到南京，急于物色“民主个人主义者”来取代蒋介石统治的司徒雷登，郑重其事地派秘书傅泾波前往拜访，准备了洋房汽车，并试探请其出任行政院长。胡政之毫不为动，毅然赴香港去开辟自由主义者的舆论天地……

毛泽东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此话是在1958

年对吴冷西说的,那时四周早已是“讨伐”《大公报》的一片喧嚣。1938年周恩来在汉口曾对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王芸生自进入《大公报》后说,我服从司马迁的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意思是说,头上已经戴上了“官衔”的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王多次拒绝国民党的“官衔”引诱,当《大公报》刚迁入重庆不久,国民政府就给王芸生下了“聘书”,聘他为“军委会参议”。“聘书”刚到,紧接着陈布雷(蒋介石的笔杆子)的电话就来了:“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勉强收下吧。”到了月底,“军委会”竟给王送去了丰厚的“薪水”,王芸生并没给陈“面子”,将“聘书”和钱一律退回。

王芸生在他临终前大彻大悟。他说,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我都不该写那篇“自我讨伐”式的长文,即《1926—1949的旧大公报》。该文不仅对自己,也对张季鸾,使用了极为刻薄甚至污秽的语言,悔恨自己也参与了那场对《大公报》可耻的“围剿”。张季鸾病重时曾说,“能写我的传记者,惟王芸生一人耳。”王芸生也多次动了念头想写,但多少次又不得不放弃了。王说,季鸾兄潇洒、儒雅、大度、宽厚,才思敏捷。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应该恰当地还一个真实的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代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支笔如何忍心下得?“对季鸾兄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在王芸生弥留之际,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指张),寄给他!我的白卷……”双眼已是黯然泪下……王芸生是自学成才的大知识分子,他才华横溢,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能于告别人世前,有这样极赋良知感人至深的自我忏悔的精神境界,令人敬佩!

以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先生为首苦心经营的《大公报》,其贡献在力求翔实,讲求新闻之效果,重视新闻的客观规律,但这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办报观点。

我们不可能把中国近代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用一个姓“资”的帽子与之一刀两断。先驱者们的精神遗产,理应受到尊崇,但这些先驱者不是圣贤完人,他们不能不受世界观、政治观、信息源的限制,缺点错误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这

是可以理解并应予谅解的。钱钟书在1932年《大公报·世界思潮》上曾经借评论休谟之际,痛斥文化虚无主义。他说:假使一个古代思想家值得我们研究,我们应当尊敬他为他的时代的先驱者,而不宜奚落他为我们的时代的落伍者。换句话说讲,我们应当看他怎样在他同时代人之先,而不应当怪他落在我们之后,古人不作,逝者如斯,打死老虎够得上什么好汉?(《钱钟书散文》第123页)

报纸要改革创新,乃大势所趋!但对中国近代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不能不屑一顾,来个一刀两断。办报人不懂办报规律,非碰钉子不可!

芝琛兄这本《百年沧桑》,也可以说是为《大公报》正名、辩诬、平反的好书,老《大公报》人看了,会长舒愤懑如释重负。诸如“《大公报》起义”说。周恩来多次称赞《大公报》是爱国的,是中国人民的报纸。既然是人民的报纸,人民怎么会向人民起义呢?还有“小骂大帮忙”说、“政学系机关报”说等等,作者都用铁的事实予以辩驳。为节约篇幅,本文不拟赘述。

从胡政之、张季鸾和王芸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大知识分子的骨气、才气、锐气和书生气。他们在中间道路上摇摆着如扭秧歌,但总的倾向则是两个字:爱国。为此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屡遭诟病。哲人逝矣,但他们胸中的浩然正气,笔下的壮阔波澜,在20世纪中国新闻事业上,将永垂史册。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如何从政治上文化上争取团结大多数,从而获得更加众多读者的青睐,仍然是所有报业和传媒面临的一个亟待回答的崭新的问题。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唐·孟浩然《与诸子登岷山》)长命百岁命中多舛青史标名的《大公报》,已经从20世纪跨进了很不寻常复杂多变的21世纪。然而,厉精更始,事在人为。“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汉书·司马相如传》)但愿这个有着勇于创新、精英辈出的光荣传统的战斗集体,焕发青春,真正做到“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为推动中国的和平、发展,为我国的新闻事业谱写出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方成图)(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 世纪 30 年代

影坛才女艾霞

● 夏秋雨

1933年,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影片《现代一女性》摄制完成并公映。该片不但因其追求妇女解放的鲜明主题引人注目,而且由于其中女主角葡萄的扮演者又是该片的编剧,而这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女演员队伍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能写点小文章便算不易的情况下,更显得难能可贵,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与赞赏,从而使这位女演员在众多走红的明星中脱颖而出,独放异彩。这位影坛才女便是当时明星影片公司声名日盛、年仅21岁的艾霞。

—

艾霞,原名严以南。1912年生于福建厦门,很早就随经商的父亲来到北京定居、求学。她聪慧伶俐,尤好读书,除了阅读了不少古典文学作品外,还通过进步书籍接受了民主思想的熏陶。

1928年,16岁的艾霞因逃避封建包办婚姻,只身出

走,来到上海谋生。不久,她加入当时由田汉等人组织的进步文艺团体南国社,从事话剧演出活动,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绘画创作和诗歌写作,从而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

在南国社从艺期间,她虚心好学,刻苦练功,很快在舞台上成熟起来,并开始采用“艾霞”的艺名。由于她表现出的进步思想倾向,很快被吸引了戏剧界进步团体“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

1931年,党为了加强各个影片公司的左翼创作力量,委派瞿秋白负责,在电影界中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其任务除了重视进步的电影剧本的创作外,就是把大量的以剧联盟员为主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陆续介绍参加到各个影片公司中去,以占领电影这块宣传阵地。艾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同王莹、沈西苓等一起加入到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

艾霞1932年考入明星影片公司后,不久即主演了影片《旧仇新恨》,以其清新的风格与真挚的表演崭露头角,引

起了人们的注意。之后,又相继主演了根据茅盾小说改编,反映农村悲惨现实生活的影片《春蚕》,反映知识青年不同生活道路的影片《时代的女儿》,并在描写职业妇女的影片《胭脂市场》、揭露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影片《二对一》以及反法西斯战争的影片《战地历险记》中饰演重要角色,显露出了在表演艺术方面的才华。

在影片《春蚕》中,艾霞饰农民李根生的妻子荷花。荷花因为在城里做过丫头,村里人看不起她,说是“白虎星”,还把一切罪名推给她。荷花对此十分反感,曾偷偷走进蚕农老通宝家的蚕房,报复地要“冲克”他的“宝宝”(蚕)。艾霞把人物那种不满社会旧俗、敢想敢为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又把荷花不为人们理解的苦闷神情真实地反映出来,给全剧增色不少。该片导演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称赞艾霞“演戏善抓性格,深入角色,掌握感情,真挚动人”。

影片《时代的女儿》描写

了1925—1927年暴风雨般的革命年代中众多知识青年的不同命运。艾霞在影片中饰演上海一家木机织绸厂老板的女儿。这位“千金”是女子中学的学生，因爱慕虚荣而生活日益放荡，最后成了男人的玩物而被学校开除，终离家出走，堕入红尘。艾霞很好地把握住了剧中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成功地饰演了这个悲剧性的角色，使其作为一个反衬，形象生动地昭示出：知识青年只有努力投身革命才有前途。影片上映后，这个人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艾霞的出色表演，得到了电影界和广大观众的肯定，使她成为了社会公认的当时明星影片公司演员阵容中“有才干、有希望的新人”之一，人们评价她“是辛苦、勤奋的，也是有成绩有创造活力的”。特别是因为她拍的这些影片都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影片”，因此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艾霞是颇有感召力的。而她自编自演《现代一女性》，使人们对她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使她获得了“影坛才女”的美誉。当时从影的女演员因为大多出身清苦，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而聪明好学的艾霞则利用原有的文学功底与艺术，笔耕不倦地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与诗作，其“文笔简洁明快，豪爽妩媚，为人称道”，因此人们把她与当时电影界的胡萍、王莹、陈波儿一起，赞誉为“作家明星”。“而自任编剧兼主演，集二者于一

身的女演员，在中国电影历史上，恐以艾霞为发端”，所以，一时间艾霞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与好评。

《现代一女性》这部影片叙述的是一个“希望用爱情的刺激来填补空虚的心”的女子葡萄的人生经历，着重写她在被捕入狱后如何在一个有着革命理想的狱友的教育下，从恋爱的迷梦中觉醒过来，走上“光明之路”。影片以妇女追求真正的彻底解放为主题，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艾霞作为女主角葡萄的扮演者也在表演上作了很大努力，可以说，影片基本是成功的。但由于剧本某些地方的先天不足，因此女主角的转变显得有些牵强与仓促，人物形象后半部不丰满，这的确是一个遗憾。后来有的影评家这样分析说：“这体现了艾霞当时对光明幸福的向往，也反映了她在创作思想上仍较模糊和对现实生活中妇女解放的真正出路难以寻找感到苦闷的心境。”

二

从1932年到1934年，艾霞在短短的两年里，已先后拍了8部电影，创作精力可说是十分旺盛。正当人们翘首以待艾霞获得新的成就时，却传来了一个惊人的噩耗：1934年2月12日艾霞吞烟自杀了。她在临终前留给在场者的最后一句话是：“人生是苦痛的，现在我很满足了。”

因为艾霞是一个颇有才华又很有影响的影坛才女，她

的死，立即成了当时引起轰动的重大新闻。各界人士发表谈话，广大影迷争睹遗容，曾有六七家报刊专门出了纪念特刊，以示哀悼；而对艾霞带着“人生是苦痛的”疾世之言愤然自绝的原因，则众说纷纭。

一说：缘于“经济拮据的窘况”。

艾霞父亲经商失败后，一家数口的生活重担要靠她微薄的收入来接济维持。成为明星后，受那个环境的影响，她对衣着款式、发型、佩饰等穿着打扮逐渐注意起来，并对生活、娱乐的档次有了讲究，这又无疑遇到了人不敷出的困难。这在当时视金钱为万能的社会，她感到了生存重负的压力。她又不肯随意出卖灵肉去迎合达官贵人以求荣华，这样，追求享受与工资收入一般且要保持独立人格便成了日益激化的矛盾，从而加重了她的厌世情绪。

二说：缘于“不能自控的任性”与“郁于孤独、空虚”。

了解艾霞的人都有这样的看法，自从成为明星后，艾霞做事说话更为任性了。心情好时，她极爱打扮，衣服、头发都很光艳；待人主动热情；走路载歌载舞，说话妙趣横生。但心情不好时，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说话粗气，做事随便，常手里拿着一罐纸烟，抽个不停；脸黄黄的，头发也乱蓬蓬的，或一个人在马路中到处绕圈子，或借酒浇愁，醉卧如泥。艾霞这种不能自控的任性、孤傲的性格，加上不时流露出来的明星架子，使不少人对她敬

而远之。艾霞此时有知音难觅之感，常在独居中与猫作伴，暗自伤悲。

三说：缘于“爱情的悲剧”。

艾霞是个才华横溢的影星，也是个善良的女孩，但她一直对爱情追求过于理想化，寄托过重，以致涉世不深，天真有余而数次受骗，身心受到很大刺激。进入明星公司后，艾霞才华显现，很快成为耀眼的明星，追逐者日增。她与一个姓林的有妇之夫谈恋爱，她的好友王莹几次找她长谈，希望她能追求纯洁、真挚的爱情。她却听不进去，并执拗地说：“恋爱的滋味是辣的，不是甜的。林先生已答应我，他要和原来的妻子离婚，和我结婚，并保证只爱我一个人。我相信他！”就在艾霞沉醉在婚前的美梦之时，那个玩弄女性的姓林的流氓却暗中与另一个女人打得火热，俨然夫妻。得知真相的艾霞顿时像掉进无底深渊，身心受到很大刺激，她痛心疾首地对王莹说：“我最爱的人，便是最欺骗我的人啊！”

三

对于艾霞的死，最痛心的莫过于她的挚友、电影明星王莹。王莹与艾霞同由话剧界转入电影界，来往很多，友情甚笃。虽然艾霞比王莹大两岁，但她一直把聪慧、持重的王莹看作是自己的姐姐，有什么知心话，都乐意跟她说。因此，对艾霞思想状况与工作生活情

况王莹都十分清楚和关心，经常提醒着她。可王莹万万没有想到她会自寻绝路，更使王莹后悔的是，她本有机会阻止这出悲剧的发生：1934年2月12日即腊月二十九那天，王莹正在公司摄影棚里拍摄《同仇》，晚上七、八点钟才拍完。在化妆间卸妆时，艾霞来找她，约她找个地方说说话。王莹因与别人有约在先，一时抽不开身，便对艾霞说：“好的，等我拍完了这段戏再说吧！”艾霞当时神情沮丧，脸上没擦脂粉，很苍白，眼圈红红的，披头散发，没有修饰。她在化妆室桌旁站了一会儿，便悲伤地走了。若是别人，王莹会十分关注，对艾霞，王莹知道这样子是常有的情形，她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天夜里，艾霞竟自杀了。大年初一的晚上，王莹在沪寓所环龙路小楼上正在看书，忽听楼下报童凄厉地喊叫着：“号外，号外，电影明星艾霞自杀！”王莹一下子惊呆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奔到楼下，买了一份晚报“号外”，双手颤抖着打开一看，“艾霞自杀”的大黑字，映入眼帘，王莹感到如万箭穿心般疼痛，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她为自己没能同艾霞作最后一次长谈而后悔，为自己没有阻止这次悲剧发生而自责。怀着深切的思念和无限的悲愤之情，王莹写出了题为《没有和艾霞说最后一句话》的悼文。文中第一次提出了“黑暗的电影圈”的说法，对黑暗社会扼杀艾霞的罪行，进行了控诉和抨击。接着，她又写出了

充满战斗激情的散文《冲破黑暗的电影圈》和《卸除一件五色的外衣》，号召电影界同仁同各种腐朽势力作斗争，不让艾霞悲剧重演。

艾霞死后，上海《电影画报》1934年第9期在《艾霞女士哀悼特辑》中，刊登了艾霞的诗作手迹和所绘油画二幅，睹物生情，诗画中洋溢的熠熠才华更使观者为之惋惜，感叹这位影坛才女的早逝。一年后，剧作家孙师毅以艾霞这位独特女性的一生为素材编写了影片《新女性》的剧本，由上海联华影片公司于1935年摄制完成并公映。该剧通过女演员韦明的悲惨身世的叙述，形象生动地揭示了旧中国正直的知识妇女被压迫、被污辱的命运，无情地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黑暗社会的腐朽与罪恶。这是对艾霞的追悼，也是对正义的呼唤。只可恨这个社会太黑暗、太残忍了，《新女性》女主角韦明的饰演者、著名女电影演员阮玲玉在《新女性》上演不久，也因为受反动势力的胁迫，深感人言可畏，而步艾霞后尘自杀身亡。

（责任编辑 舒元璋）



“不抵抗将军”的真相

——《世纪老人张学良的多彩人生》(连载三)

● 徐庆全 赵杰

1990年,张学良移居美国后,把定居地点选在了夏威夷与珍珠港相毗邻的希尔顿大酒店15H单元楼。从居处凭窗远眺,珍珠港尽收眼底。张学良每每凭窗远眺时,心中想必会浮想联翩。

1941年的12月7日,这个被美国人称为“黑色的星期五”的日子,日本在几个小时之间,将这个美丽的港湾变成了一片火海。一艘艘战舰和一架架飞机顿时化为灰烬,那些无辜的美国士兵也永远沉冤海底。面对着日本的暴行,美国人愤怒了,当年的总统罗斯福也愤怒了。12月8日6时30分,罗斯福向全世界宣布:美国人将不惜一切代价,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入侵。

珍珠港现在的美丽与安详,与当年历史上的这一幕的反差如此巨大,自然会令张学良长叹不已。他记得日本偷袭珍珠港!他也永远不会忘记,在早于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10年,在他的家乡,在他的辖区,在中国东北美丽的黑土地上日本关东军在1931年发动的“九一八”事变那悲愤的一幕。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

每当此时,这支凄切、哀婉、悲壮苍凉和令人心碎的歌,就会拨动他的心弦。“可以说我自己的一生是被日本人毁灭了。我父亲被杀,我的家庭整个被毁掉了,我的财产一切都没有了。”

“日本军人疯狂到那样,不但对中国人,对他

们本国的元老都敢杀。我在想,日本这个国家在经历了那次世界大战后,能像现在这样的存在,这是日本的幸运。”

已经皈依基督教的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仍对日本人发出了上述愤怒的谴责。这表明,“九一八”依然是他心中挥不去的痛!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31岁,1990年,他90岁,世纪之交的2001年,他百岁华诞。“不抵抗将军”的名声,依然是他心中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天夜里,张学良并不在东北,而是由两位女士陪同,坐在北平的中和戏院观看他的朋友梅兰芳演出的拿手好戏《宇宙锋》。

张学良是在1931年的5月离开东北的。张学良之所以在此时离开东北,还要从1930年9月18日发布的“巧电”谈起。

如果说1931年的“九一八”是张学良愤怒的日子的话,而此前一年的“九一八”,则是张学良名声鹊起登上中国政坛的开始。

1930年4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爆发了一场空前混战——中原大战。冯、阎、桂三派共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军总司令”,纠集60万大军,讨伐蒋介石。蒋介石也调兵遣将,率50万大军与冯、阎军厮杀于豫、鲁、皖,战火燃遍了整个中原,双方打了四个多月,互有胜负,难分高低。在僵持之中,他们共同把目光转向了拥兵关外、保持“中立”的张学良。在当时的局势下,交战双方任何一方,如果能取得张学良的支持,则立刻会打破僵局,成为胜者。

张学良成了这场战争的一枚关键的棋子。拿到这枚棋子,就成了交战双方共同的心愿。一时,

北宁线上,党政要人奔走如梭,少帅府邸更是说客盈门。双方封官许愿,一再加码。年轻的少帅在这令人扑朔迷离、眼花缭乱的外交攻势下,几经选择,终于,从“统一国家”、“维护中央”的立场出发,决定支持蒋介石。

9月18日,这天的电报韵目是“巧”字,张学良发表了震动全国的巧电,表态“拥护中央”、“呼吁和平”,随即发兵入关,反蒋联军顿时乱作一团,阎锡山退避三舍,望风而逃,一下退回山西,使东北军一枪未发,轻而易举地接收了北平、天津;冯玉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部下纷纷倒戈投蒋。10月5日,阎、冯联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停战,听候和平解决。10月15日,阎、冯联袂下野。至此,历时半年的中原大战以蒋氏胜利而告结束。

1928年张学良的“易帜”,促成了蒋介石的全国统一,而这次的出兵,又一次为蒋介石的政治生涯铺平了道路。蒋介石当然也有感恩戴德的表示,战后,张学良得到了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头衔,而总司令则是蒋介石。张学良成为国民政府内在蒋介石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政治明星。

蒋介石给了张学良超乎寻常的礼遇。11月12日,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赴南京,蒋介石特派张群、贺耀组到济南迎接。到了南京后,蒋又多次与他谈话,慰勉有加。在一次谈话中,蒋介石说:“北方冯、阎等人脑筋都太陈旧,你是青年,有朝气。我们二人合作,就一定能把国家弄好。”其推心置腹的口气,想来在蒋的政治生涯中并不多见。此外,蒋并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刚加入国民党后,张学良就直接走进国民党中央,出席了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和列席“四大”。从当年留下的张学良此时在南京活动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每次拍照,蒋介石都和张学良并立前排中央,以向世人昭示“二人合作”的局势。

至此,蒋介石依然觉得,他心中对张的感激之情表达的还不够酣畅淋漓,所以,1931年1月1日,由蒋签署的褒奖张学良的国民政府令发出。这还不够,在将于5月召开的国民党四中全会的会场上,蒋介石又特意给张学良留下了一个醒目的位置。

张学良就是为了去坐这一位置,而在5月离

开东北的。这一离开,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去,一直到百岁诞辰。

与1930年到南京相比,张学良的此次之行所受到的礼遇,国民政府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张学良一行由浦口过江时,江中的军舰和狮子山的炮台上,礼炮齐鸣,向他表示敬意;船到下关码头,这里早已麇集国民政府的各路大员,欢呼声不断;驱车上路,目光所及,满城都张贴了“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欢迎维护和平效忠党国的张副司令”的巨幅标语。

在国民党四中全会上,张学良成为国民会议的9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两次主持了会议。四中全会的所有摄影报道,蒋与张的位置永远没有改变:两人或者是并坐或者是并立在前排中央。会终人散之时,蒋介石不惜屈尊,亲自将他送到了机场。

张学良在陶醉之余,更加相信了蒋介石。他根本不知道,他所拥护和支持的蒋介石,在列强环伺之间,只醉心于权力,只醉心于以武力统一中国,而对于在他的家乡东北磨刀霍霍的日本人,则只幻想于列强的干预,根本不做实际有效的防范。

认识到蒋介石的这一点,张学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使他在一年之间,由耀眼的政治明星跌落为国人唾骂的对象。

9月18日夜,沈阳公署参谋长荣臻把电话打到了北平。张学良立即中断了看戏,返回协和医院与荣通电话。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副司令,军情十万火急,东北将士在等候您的命令!……”

张学良听着电话里的催叫,望着屋中人们一张张焦灼盼望的表情,他清楚人们的心在想什么,在盼望什么。

他知道,只要从他口中说出一个“打”字,东三省将士那早已郁积在枪口的愤怒就会倾泻而出,与日寇浴血奋战。但是,他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而是对着话筒说出了这样一番话:“目前沈阳空虚,抵抗无益,请转告各级将士,应避免冲突,勿逞一时之愤,忍辱负重,以待‘国联’处理。”

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不要抵抗!”这是张学良根据蒋介石半年来的多次训示而作出的选

择。

对于日本人蓄意出兵东北,作为东北的总司令张学良当然知道,而张学良所信赖的中央——在南京的蒋介石当然也知道。但是,蒋介石正忙于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围剿”,正忙于对付国民党内部反对他的派系,总以为,有《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牵制,日本如出兵东北,列强定会据以出面干预。而对张学良来说,既然东北归附中央,那么,在关乎外交的问题上,当然一切要听命于中央。所以,在东北形势日趋紧张之际,病中的张学良曾多次向蒋介石请问对策。

7月1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报告东北日军情势,蒋介石回电说:“日本诚狡猾阴险,但现非我国抗日之时,除另电外交部王部长外,希兄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张学良接电后,随即致电东北政务委员会,面对日本人的挑衅,“无论日方态度如何,我方只能据理以争”。同时,要求政务委员会制止民众的反日运动。

7月23日,在东北局势已经一触即发的形势下,蒋介石仍然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武力统一政策。张学良又派王树翰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示。蒋让王转告张学良说:告诉汉卿不必惊慌。他的理由是,有《九国公约》和国际联盟,日本不能强占我国领土。因为寄希望于《九国公约》或国际联盟,所以,蒋介石认为,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

蒋介石深知张学良年轻气盛的特点,很担心他自作主张。所以,在8月16日,又给张学良发出了著名的“铣电”,训示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言之恳切,足见蒋对张学良的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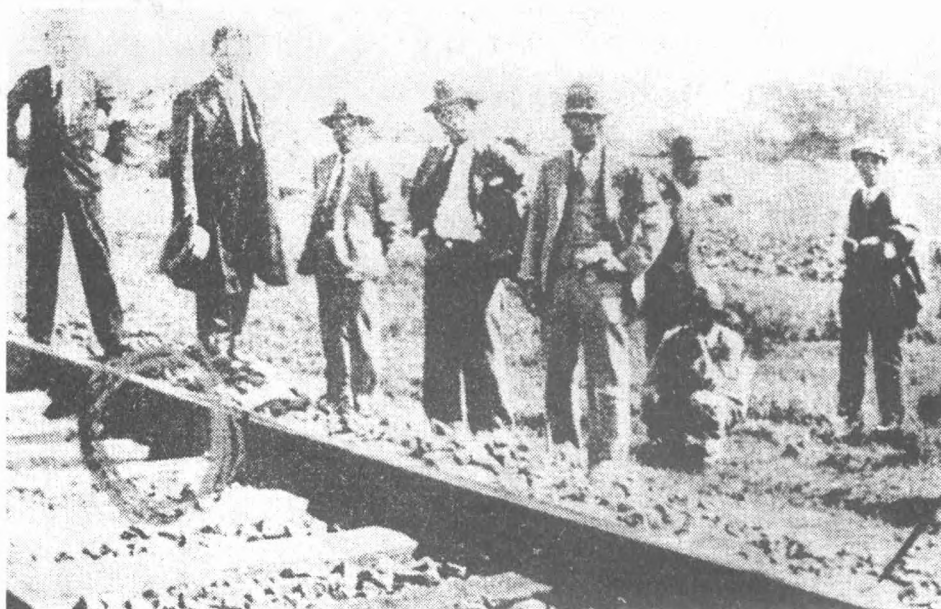
放心。

即使如此,蒋介石还是担心张学良会自行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前6天,即9月12日,蒋介石在石家庄火车站停留时,密电张学良前来会晤。谈话中,蒋介石明确告诉张学良: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要马上动手。谈及对策,蒋介石还是要不抵抗:“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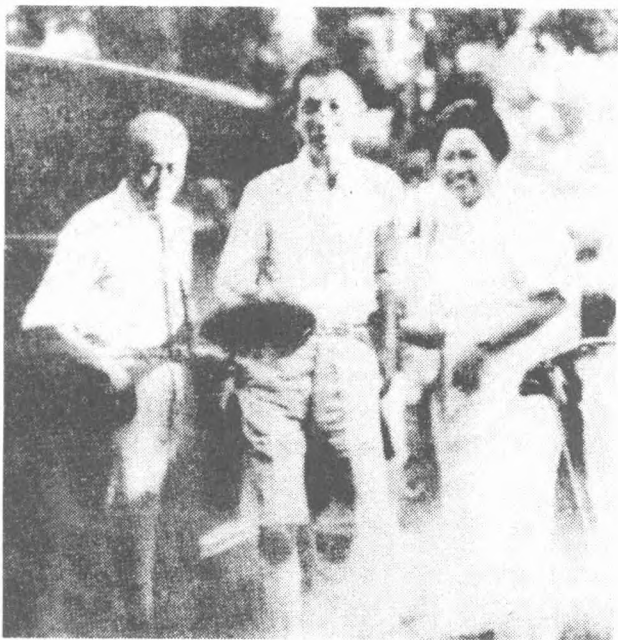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再次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置。”

即使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放心。他还特意让宋子文派人监视张学良的行动,以免少帅“逞一时之愤”,还击日本。直到宋子文报告说:“张副司令已命令我方军队将枪械藏于兵库,切勿还枪报复矣”,他才放心。

事实上,蒋介石的担心是多余的。年轻气盛的少帅,这次是严格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的。在收到“铣电”后,他随即转告东北各军长官,要他们一体遵守。在距“九一八”事变前12天,即9月6日,张学良仍给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发电,电文说:“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本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柳条湖现场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张学良离开医院处理军务

由于全军的统帅蒋介石和东北的统帅张学良对日本人的“不抵抗”对策，所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出现了令国人至今仍为之扼腕的局面：

作为全军统帅的蒋介石，正乘军舰由南京抵九江，部署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国民党中枢的铁腕人物也均到江西、湖南指挥内战。南京中枢仅有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朱培德及吴稚晖、邵元冲、朱家骅、王正廷等这般人物空守石头城。作为东北的主帅的张学良在观看《宇宙锋》，而留守东北的将帅们也大都不在军中：东北代理司令官张作相在老家为父治丧；参谋长荣臻则正在为父祝寿；驻沈阳的主力部队第七旅驻北大营，旅长王以哲也不在营内。

毫无疑问，从统帅到主帅到各级军官的懈怠，纵容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一日之内，日军占领了沈阳、海城、大石桥、公主岭、四平、开原、昌图、长春、凤凰城及营口、抚顺等要地。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连同大批军火、260架飞机，一夜之间，全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之手；紧接着，在以后的一周内，日军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三十多个城市。同年11月日军攻占了黑龙江省。次年1月，占领了辽西通往关内的重要通道锦州。仅仅四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同胞呻吟于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在此期间，东北当局要员

荣臻等11人成了日本的俘虏，王以哲率残部由沈阳向南撤退。

历史之所以让人感兴趣，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历史真相是要在若干年以后才能显现的。从前面我们简略地梳理的历史材料来看，张学良之所以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是由于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指示。但是，在当年及其后的若干年，历史的真相并不像现在这样清晰，张学良自然要成为国人责骂的对象。——当然，人们也并没有放过身居全国统帅高位的蒋介石。

直到张学良宣布下野出国后，著名学者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论语》杂志上，还登了一首打油诗讽刺道：

赞助革命丢爸爸，拥护统一失老家。

巴黎风光多和丽，将军走马看茶花。

当年，张学良要洗清自己，有两条途径，一是重整旗鼓，率师迎战日寇，收复失地。他确实这样做了。九一八事变后，他支持东北人民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敌政权；支持东北军爱国官兵的抗日斗争，马占山英勇抗击日本和锦州保卫战，张学良都是直接的指挥者。1933年元旦，日本侵略军进攻华北。当时，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得知日军行动后，未向南京政府请示，立即作了抗战部署。但是，由于得不到南京政府的任何支持，轰动一时的热河抗战也失败了。

东北弃师于前，热河再败于后，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对“不抵抗政策”的愤慨。张学良所遭受的谴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与此同时，蒋介石也陷入遭人唾骂的尴尬境地。

要减轻责骂，张学良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在适当时机公布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拍给他的电报，向国人说明事实真相。但是，张学良受固有的“忠君”意识的支配，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威信，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悄悄吞下了这个苦果。蒋介石恰恰利用了张学良的这一点，迫不及待地把丧失国土的责任转嫁到了他的身上。

1933年3月，蒋介石以亲临前线视察、筹划反攻大计的名义来到石家庄，并约张学良在保定会面。谈话中，蒋介石暗示张学良下野。他对张学良说：“现在中国大局危险万状，你我两人好比共乘一只漏船，必须先下去一人，才能挽救船沉，你

看谁先下去好？”

话既然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张学良当然明白，蒋是要让他来当“替罪羊”了。在无可奈何中，张学良还是答应了这样的要求。但是，他同时向蒋提出了要求：“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并再次请蒋考虑，动员全国的力量与日本作战的问题。

与蒋分手，张学良回到自己的专车后，曾伏枕大哭，痛心疾首。当时在他身边的外籍顾问端纳曾好心劝慰，让他“做个大丈夫，要勇敢，要坚强”。但是，对于一个有一腔报国之情而又无法施展的军人来说，不抵抗就是最大的羞辱，他如何又能坚强得起来？

三年后，张学良在西安与刘鼎谈到了当时的心情：看到全国人民要求抗日，中央军也北上，他很兴奋。可是，“哪知保定见蒋委员长，不谈抗战，反而逼我下台，所有以前的热情支持，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这是日、蒋合演的百戏（即把戏）而已！”“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我回到车厢，就闷倒在我的床上，嚎啕大哭，瞬息间，我猛地站起来哈哈大笑，对在面前的人说：‘我吓你们的。’唉，真是啼笑皆非！”

可惜，这是张学良三年后的认识！

3月10日，张学良返回北平。他的情绪依然很低沉。他沉痛地说：“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大家说我不抵抗，我不想辩白，但下野之后，这个罪名要背到哪天呢？”他也曾对王卓然等知己的人发牢骚说：“天知道，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张学良一个人担负，就算是我一个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国人皆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一致奋起，一致抵抗才是！”

张学良实在是不甘心，但他又相信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他让王卓然将林肯曾经说过的三句话抄录给他。这三句话是：“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

叱咤风云的少帅无法靠武器来洗刷自己，只好让这样的警句来给一点未来的信心了。

但是，牢骚归牢骚，既然已经答应了蒋介石，张学良还得背上这一罪名。3月11日，张学良就

下野出国一事通电全国：

……余就职以来，仍本先父遗志，始终以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兢兢业业，未尝或渝，即如不顾日本之公开恫吓而易帜。辅助国民党在东北之活动。与夫十九年秋季奉命入关，拥护中央统一。凡此种种，事实俱在。

“九·一八”事变发生，余正卧病在平，初以诉诸国联，必可主张公道，洎乎日军侵热，余奉命守土，乃率师整旅，与敌周旋。抗战以来，将士效命者颇不乏人，无论事之成败若何，然部下之为国牺牲者，已以万计矣！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健儿孰非国家之将士，十九年余奉命率其入关援助中央。于今，国难未已，国土未复，无家可归者数十万人。但盼中央俯察彼此劳苦，予以指导，并请社会人士，力加援彼等。为国为乡，皆抱热诚，并熟悉东北情形，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而效命，遂其志愿，免于飘泊，于愿斯足。并盼国人鉴余诚悃，谅余庸愚，虽怨尤丛生，而余本身只知为国，余皆不复计也。

细读电文，不难看出，张学良是颇有微辞的。但是，即使“欲说还休”，也只能就此打住了。

当天晚上，张学良在北平顺承王府与东北军的一些主要将领话别。这样一个场面，这样的时刻，熟知内情的东北将领自然要为张学良鸣不平。或许张学良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讲话中说：“感谢诸位对学良的厚爱。大家都知道了，我很快就要出国，但我不打算在国外久留，不久就回来。在当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我本不想离开部队的，但人家催得急，甚至连出洋的手续都替我办好了，怎能不走？不过，大家也不要误解，这次引咎辞职，对国家对个人皆为必要，蒋先生是为大局着想，对本人也是仁至义尽，大家服从蒋先生，就是服从我，对不起蒋先生，就是对不起我。所以，我走以后，你们更要以大局为重，好好地干，要团结对敌，共赴国难。东北，我们是一定要收复的，不收复东北，我对不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也对不起先大帅在天之灵。现在，中央给我们河北这个地盘子，由孝候（于学忠）负责，一定要全力以赴，守住我们的防线。”

众将领自然理解总司令的一片苦心。他们一

致表示,请他放心,他在国内也好,不在国内也好,他们都一定带好队伍,保存好东北军这支部队,珍惜这抗日的基本力量,以便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把鬼子赶走!

将领们的表态,多少给张学良带来一些安慰。但是,想起前尘种种,后事难料,年轻的少帅竟对泪把盏。

3月12日,张学良前往上海,他以极大的毅力,戒除了毒瘾。4月10日,他便由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等人陪同,登上了意大利一艘名为“康脱罗素”号的邮轮,出国考察。

临行前,张学良再一次致信东北军将领和东北名流,鼓励他们要患难与共,要精诚团结,要准备为将来收复东北尽最大的责任,其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但是,在他历经8个月的考察返回时,蒋介石却把他的军队调到了围剿红军的前线。

张学良下野后,蒋介石也并未改变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为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忙于策划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计划。而长城抗战的失败和屈辱的《塘沽协定》的签订,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全国的抗日浪潮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11月20日,被蒋介石派往福建去打红军的十九路军不愿再打内战,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主持下,通电反蒋,在福州建立了人民革命政府,并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蒋介石的政治地位又一次发生了危机。

在国外的张学良,虽然远离祖国,但是对国内的局势十分关注,也始终不忘国难与家仇。他在给国内友人的信中说:“现虽寄身海外,但有三事向不敢忘:一曰国难,二曰乡患,三曰家仇。”但是,国内传来的消息却是,国难日趋严重。

《塘沽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到国外后,张学良的心情十分沉重。作为一个本应奔赴战场的军人,却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浪迹海外,不能报效祖国,他是不甘心的。这年7月,宋子文出席国联在巴黎举行的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时途经意大利,张学良与之相见,向他提出了回国抗日的想法。但是,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这种想法早有预感,早已向宋子文表明了态度。因此,宋

子文对张学良说:“蒋先生希望您多在国外考察一段时间,现在没有适当的职位,可以给你。你应当安心下去,以待机会。尤其必须得到蒋先生的召唤,才可成行,这是特别要紧的。”

但是,当张学良得知“福建事变”发生后,他就将宋子文的叮嘱置于脑后,决定启程回国。1934年1月9日,张学良抵达了上海。

张学良的主动回国,引起了蒋介石的严重不安。虽然此时福建事变已在他的镇压下,形成不了什么气候,但是,国内反对他的势力依然存在,如果张学良拉上东北军加入这股势力,对他的政治地位依然会构成威胁,因此,蒋介石要继续控制住张学良。

1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了张学良。他并未对张学良擅自归国提出批评,而是与他商谈归国后的任职问题。

以张学良此时的想法,他很愿意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其目的是,“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帅东北军,为私情所累和他们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争。但其结果,事与愿违。”因为蒋介石自然不会同意,而是希望他继续统帅东北军参加打红军的内战。

对于蒋介石置外患于不顾而继续打内战的做法,张学良此时是反感的。但是,他认为,目前还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蒋介石来领导。他在回国时途经香港时,与胡汉民见面。胡认为蒋“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张学良认为胡的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但是,他反问胡:“环顾当前人物,在政治上、军事上真能领导全局者,除蒋先生外又有何人?”

抱着这一想法,他认为,要抗日就必须与蒋介石合作,拥护蒋介石统一中国。他曾无可奈何地对王卓然说:“目前,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回北平,掌握起自己的军队,整顿训练,待机而动。一条是拥护蒋介石,完全听他的。前一条路,必须得到日本人的谅解,受他们的摆布,不然,在华北是呆不下去的。我张学良绝不能屈膝事仇,甘做汉奸,这条路决不能走。要想抗日复仇,打回老家去,单靠我们几十万军队,是无法对日作战的,即使加上中央军,也未必于事有济,必须全国统一,再得到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的援助,才能对日本作

战。”

张学良依然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虽然在后来的围剿红军的失败中以及亲身感受到红军的抗日行动,他认识到了红军的力量,但此时此刻,他根本认识不到。所以,虽然他对蒋介石要他担任的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职务一再推辞,但最终还是走马上任。

接受了任命就要服从蒋介石的调遣。但当他真正指挥部队同红军打起仗来时,却屡遭失败,而军中将士也多怨言。将士们普遍的态度是,打内战而死,死得冤枉,不如打日本而死,死得光荣。特别是当东北军在湖北麻城一带遭到徐海东的红25军的打击后,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开始对自己的命运思考了。

首先对张学良提出忠告的,是他张家的“两世老臣”、抗日名将马占山。马在武昌见到张学良后,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犯了三大错误:一是1928年不该“易帜”;二是“九一八”事变不该听从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替蒋背上卖国罪名;三是回国后不该宣传法西斯能够救中国,拥蒋并参加围剿红军。马占山毫不客气地说:“剿共是卖命换饭吃,共产党打不完,东北军就先消耗光了,拥蒋打共产党是死路一条。”

马占山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东北军将领的心态,张学良并不是不知道。现实逼迫张学良去思考和探索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东北军的出路。

有一天,张学良忽然对自己的机要秘书张慎修说:“小张,我向你提个问题,好吗?”

“好!”张慎修以为他是询问工作上的问题,满口答应了。

不料,张学良却提出了一个使他大吃一惊的问题。那天,他一改过去总爱说笑的习惯,忽然压低声音,严肃地似乎也是挺神秘地说:“小张,你对共产党如何看法?”

张慎修不知道张学良的真实用意,不敢正面谈,因为当时是白色恐怖时期,这样问法是会使人大吃一惊的。“我没有研究过,副司令意见如何?”张慎修只有这样回答。

张学良知道张慎修是个进步青年,对共产党不会没有看法,现在之所以推托,显然主要还是顾虑,所以他也不勉强,自己略微想了想,坦然地说:“只是拼命地去打,那也是解决不了问题

的。即使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也是不可能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呢?”

既然承认共产主义不可能消灭,那只能与共产党联合共存了。从这个小小的事例不难看出,张学良开始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了。

要现实地对待红军,对待共产党,首先就必须了解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张学良责成机要组长黎天才(原为中共党员)组织人力,搜集有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有关资料。与此同时,在黎天才和潘郁文(中共党员)的帮助下,张学良从了解和研究共产主义的目的出发,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想来,张学良后来逐步走向联共抗日道路的思想基础,在此刻就已埋下了伏线。

在此期间,国内形势的变化,也使张学良极为心痛。

日本侵略者逐步将势力进入到了华北,而蒋介石仍采取妥协政策,先是《何梅协定》,继之又来了个《秦土协定》,把华北拱手让予日本侵略者。河北是张学良东北军的驻扎地和抗日前沿,一直被他视为“第二故乡”。现在,蒋介石迫于日本的压力,却让他们掉转枪口打红军,深深的刺激,让张学良终于看到了妥协退让的严重后果,终于省悟过来了。

“‘九一八’事变后,我们误信国际联盟及其他和平机构,错认公理可以制裁强权,所以步步退让,总希望得到外来帮助。现在这一切梦都可以醒了,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众,与日寇拚命。”他痛心疾首地说:“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一人承担,就算是我一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一人误,岂可全国也误,一时误,岂可永久再误。国人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一致奋起,一起抵抗才是。”

但是,全国的统帅蒋介石却不这样看,在得知红军要北上打通与苏联的交通联络的意图后,蒋介石立即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对于这一次任命,张学良并没有推辞,带着对共产党的认识,带着对抗日形势的认识,来到了西安。从此,张学良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致中)

史实中的康熙收复台湾

● 戴逸

编者按：电视剧《康熙王朝》热播，唤起观众对于有关重大史实的关注，本刊特邀著名清史专家、前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撰写此文，以飨读者。

康熙初年的政治形势

康熙幼年即位，他所继承的是一个饱经战火、经济凋零、国弱民贫、群雄逐鹿、四分五裂的国家基业。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将长年抵抗的南明朝廷追入缅甸，擒获永历帝，并将他处死。南明势力刚刚被消灭，代之而起的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藩，又盘踞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各拥重兵。他们的财政、户部不得核查。吴三桂且可向全国选派官吏，号为“西选”，吏部不得掣肘。军饷开支浩大，“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魏源《圣武记·康熙戡定三藩记》）。东南海岛台湾被郑经占据，郑氏本以恢复明室为号召，但自从永历帝和郑成功死后，失去了号召力和政治领导，郑氏集团内叔侄兄弟失和，内讧不息，已蜕变成失去政治目标的海上武装。东北则有俄罗斯人入侵，在黑龙江上设立许多军事据点，屠杀和掠夺当地人民。西北则有噶尔丹崛起，以伊犁为巢穴，其军锋和影响远及于内外蒙古、南部新疆、西藏、青海以及中亚细亚，势力强盛，窥伺中原，成为清朝的严重威胁。离北京不远，又有察哈尔蒙古布尔尼之心存反侧，蠢蠢欲动。中原地区，还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明朝遗民亦在积蓄力量，俟机待发。整个中国大地上布满了大堆干柴，一个火星的迸溅，就会燃烧起燎原大火，清王朝危机四伏，统治极不稳固。

康熙逐渐成年，首先擒拿鳌拜，夺取权力，消除了朝廷内部的隐忧，随即集中力量对付南方三藩，决心割掉这一恶性肿瘤。经过八年苦战，平定了吴三桂等三藩叛乱，趁着告捷余威，又把注意力转向台湾。康熙统一台湾是战争与谈判交替使用的复杂过程，是力量、智慧与争取人心的长期斗争。

与台湾又战又谈

清朝与台湾郑氏政权，两岸对峙20年，有时战争，有时谈判，打打谈谈，一直呈胶着状态。

1662年（康熙元年）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侵略者，不久即病逝，内部发生争讧。清朝乘机派使者，企图说服郑成功之子郑经归降清朝。郑经为了减

轻压力,与清朝谈判,交出南明皇帝赐给的敕书,印玺。清朝要求台湾人众迁回内地,剃发易服,郑经不允,谈判未成。康熙二年,清朝出兵攻打郑氏据守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据点厦门,郑经战败,退出厦门,逃奔台湾。清朝乘胜派舟师出征台湾,在海上突遇台风,船只沉没,无功而返。

当时两岸虽武装对峙,但又都有一定的和平愿望。清王朝三藩未除,经济不稳,无力用兵海上。而台湾郑氏,土地初辟,人口甚少,生产落后,经济困难,急需大陆的粮食和物资供应。且郑部大多是福建人,离家日久,思恋乡土,私下渡海来归者络绎不绝。康熙六年,清廷派总兵孔元章,赴台湾议抚,答应郑经如归顺,可封“八闽王”,郑经犹豫不决,后以“和议之策不可久,先王之志不可坠”(《海纪辑要》),拒绝清朝的招抚。康熙亲政后,刑部尚书明珠奉旨入福建,主持和议,派知府慕天颜入台,宣示招抚之意。清廷做了重大让步,允许郑氏封藩,世守台湾。郑经则提出:“苟能照朝鲜事例,不削发,称臣纳贡,尊事大之意,则可矣”(江日升《台湾外记》)。康熙答复:“若郑经留恋台湾,不思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康熙不愿台湾成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家,故谈判破裂。

此后发生三藩之乱,中原战火弥漫。郑经乘机与吴三桂、耿精忠勾结,发兵攻福建、广东,与清军作战,占领厦门与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各地。转战数年,吴三桂失败,郑经孤军难支,又退回台湾。清朝再一次争取谈判,福建总督姚启圣派副将黄朝用赴台。郑经要求“请照琉球、高丽外国之例,称臣奉贡,奉朝廷正朔,受朝廷封爵”,而康熙坚决不同意台湾比照琉球、高丽之例,认为:“台湾人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清圣祖实录》卷一百零九)。双方各持自己的立场,谈判又无结果。

决策选将

不久,郑经病逝,其子郑克塽继立。清廷讨论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反对武力攻取台湾的人很多。康熙二十一年“户科给事中孙蕙条陈,台湾

进兵宜缓”。“(二十一年)七月,彗星见,并宿度,尾长二尺余”。令百官言事,“尚书梁清标奏,今天下太平,凡事不宜开端,当以安静为主。左都御史徐元文奏请暂停台湾进剿。”(《清圣祖实录》卷一百零三)。康熙排除了众多反对意见,调走了认为“台湾难攻且不必攻”(《圣祖御制文集》三集卷二)的水师提督万正色与福建将军喇哈达。决定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一)。

台湾地处大海中,波涛万顷,作战需赖水师,满族将士娴习马步,而不习水战,必需另选将帅,训练士卒。李光地、姚启圣推荐施琅可当此重任。

施琅,福建晋江人,有勇略。早年为郑芝龙部下,后随芝龙降清。郑成功将其父子兄侄一门杀害,结下深仇。施琅在福建与郑氏作战多年,了解台湾情况,熟悉水师机宜及海上风涛之变幻。他一贯主张攻取台湾,但因曾是郑氏部属、清廷并不信任他,把他安置在北京居住,投闲十三年。

康熙决定起用施琅,授福建水师提督。此时,郑氏窜犯福建、广东的军队已被福建总督姚启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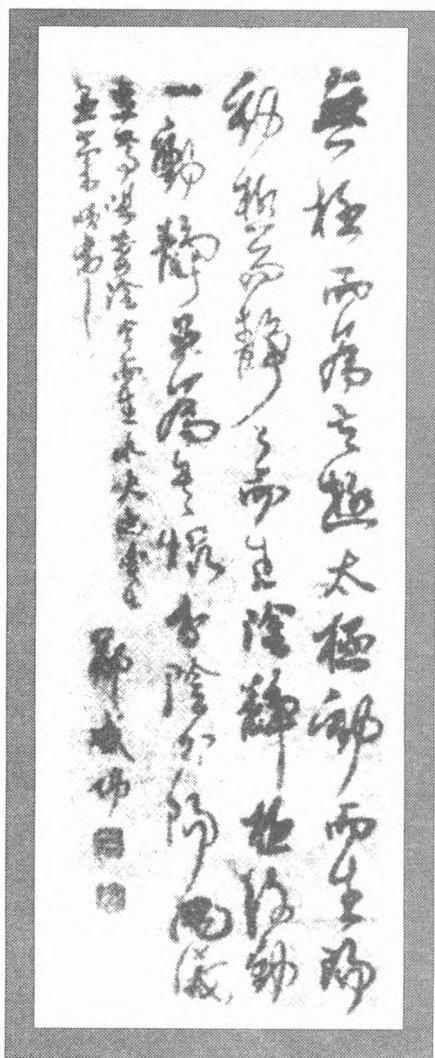
少年康熙

逐出。姚亦主张攻取台湾,说“台湾断须次第攻取,永使海波不扬”(姚启圣:《忧畏轩奏议》),并已训练了一支骁勇善战的水师。但作战方略上,姚启圣与施琅意见分歧,致出师日期一再推迟。施琅请求康熙给予“专征”之权。督抚只管后勤供应“摧趲粮饷”,指挥作战全部由自己负责。康熙同意施琅的请求。姚启圣此后无权过问作战事宜。但他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全力支援前线,保证了施琅出征的粮食和物资供应。

战斗与善后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683年7月8日)施琅率兵二万余人,乘战船二百余艘出征。郑克塽则派勇敢善战的刘国轩守澎湖,所率兵将战船与施琅相当。“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余里为壁垒”(《清史稿卷二百六十·施琅传》),两军展开激战,历时七昼夜。施琅右眼负伤,游击兰理中炮“腹破肠流出,为掬而纳诸腹,持匹练缚其创。理呼杀贼,麾兵进”(《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一·兰理传)。五年以后,康熙见兰理,极嘉奖他作战英勇,“问澎湖战状,命解衣视其创,慰劳甚至”。总兵朱天贵“以十二舟薄敌垒,焚其舟,杀伤甚众,战益力。俄中飞炮,仆舟中,犹大呼杀贼,遂卒”(《清史稿》卷二百六十·朱天贵传)。澎湖大战,郑军大败。清军击沉敌船159艘,郑军死伤12000人,浮尸遍海,刘国轩仅率31艘船逃回台湾。

澎湖战败,郑克塽等极为恐慌。施琅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对被俘的台湾兵将,优礼相待,赏给银米。800名伤残者医治之后,释放回台,令他们宣示招抚之意,台湾民众“莫不解体归心,唯恐王师之不早来”(阮旻锡《海上见闻录》)。郑氏



郑成功手迹

已无抵抗能力,于7月27日向清军奉表纳降,呈交延平王金印和户口土地册籍。康熙接受投降,优待郑氏,称:“尔等从前抗违之罪,全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煌煌谕旨,炳如日星,朕不食言”(《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一十一)。封郑克塽公爵,封刘国轩侯爵,“降众四万余,或入伍,或归农。”郑氏人众俱得妥善安置,台湾遂告统一。

施琅因平台湾功,封靖海侯。他与郑氏有杀戮父子兄侄的大仇,有人认为:施琅战胜必定会进行报复。但施琅未妄杀郑氏一人,他说:“绝岛新附,一有诛戮,恐人情反侧。吾所以衔恤茹痛者,为国事重,不敢顾私也”(《清史稿卷二百六十·施琅传》)。

收复台湾后,又发生弃留之争。有人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易藪贼,欲弃之”;也有人说:“海外泥丸,不足为中国加广,裸体文身之番,不足

与共守,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台湾历史纲要》135页)。施琅反对放弃台湾的主张。他认为:台湾是江浙闽粤四省之屏蔽,倘若放弃台湾,必为红毛(指荷兰)复占,“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康熙赞同施琅的意见说:“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始设台湾府与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属福建省,在台澎分别驻兵1万人,设官治理、筑城戍守,台湾宝岛得以统一于清朝政府之下。

(责任编辑 洛松)

评说历史疑案： “孝庄下嫁”与“顺治出家”

● 王俊义

近日荧屏上播放了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其中有两个情节——“太后下嫁”与“顺治出家”颇引人注目。关于“太后下嫁”，剧中曾通过顺治之口向孝庄太后说：“儿臣六岁登基，天下烽烟四起，宫中杀机危伏，母后为保住咱俩的身家性命，不得不下嫁权臣多尔衮。”孝庄还亲口对年幼的康熙说：“当年我为了保住顺治的皇位，不得以太后之尊下嫁多尔衮”；关于“顺治出家”，该剧更是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顺治在其爱妃董鄂氏病逝前后，独锁深宫，参禅论道，一意要遁入空门。甚至在高僧玉林琇要焚死为之化度的僧人行森时，仍执意落发具戒，着僧衣芒鞋，义无反顾，皈依佛门。面对此情此景，孝庄不得不下旨以“龙驭归天”的谎言来掩盖顺治实已出家的真相。此剧播放后，一些观众和读者纷纷询问：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我认为，要对之作出“有”或“无”明确回答，则难乎其难矣！因为这两件事并非出自剧作者凭空杜撰，事实上从清初以来，就已见诸文人的记述，而后野史裨乘更是广为传说，即使是在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清史前辈孟森先生就曾撰写过《清初三疑案考实》，对此二事是否存在均予否定。但胡适先生却提出质疑。随后陈垣等史学大师也撰文抒己见。直到目前，在清史学界仍既有肯定者，也有存疑者、否定者。可见，它已成为从清初至今三百多年来聚讼纷争不止的两大历史疑案。这两件事既关系到清初最高层的政治权力之争，又是一个涉及如何分析辨别有关史料的复杂学术问题。因此，

且莫将其视为仅是奇闻轶事。对此两大历史疑案传说的来龙去脉及其论争予以评说，或许对读者了解事情的真相有所助益。

三个当事人——福临、孝庄与多尔衮

福临，生于清崇德三年正月（1638年3月），乃清太宗皇太极之第九子，也是清朝入主中原、君临全国的第一代皇帝。值崇德八年（1638年）皇太极突然病死，引发了一场皇位的激烈争夺。经过相互权衡与妥协后，才由年仅6岁的福临继位，并由他的两位叔父济尔哈朗与多尔衮辅政。1644年9月福临进入北京，改元顺治，然朝政仍由多尔衮把持。多尔衮居功自傲，独断专横，根本不把顺治放在眼中。顺治七年多尔衮病逝，翌年顺治始亲政，不久，即以多尔衮擅权作威，谋逆篡位等罪名，将之削爵夺封。尔后，在其母孝庄太后的辅佐下，竭力摆脱满族权贵的干预，一度励精图治，重用汉

官，整顿吏治，奖励垦荒，经略西南，攻占云、贵，逐渐实行了对全国的统治。但顺治在个性方面，比较暴躁，感情脆弱，多愁善感，喜怒无常。他又笃于宗教信仰，初信奉天主教，尊称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为“玛法”（即“爷爷”之意），凡事必询问。从顺治十四年起，又转而信奉佛教，先后将南北高僧玉林琇等，召入宫中，论经说法。顺治十七年八月，其宠妃董鄂氏病逝，感情上遭沉重打击，万念俱灰，萌厌世出家之念，并削发受戒。后经孝庄太后与国师玉林琇竭力劝阻，才又蓄发留俗。此后，便一蹶不振，身体更加虚弱，终于患染天花。当自知死期



孝 庄

已至时，召亲信朝臣草拟遗诏，历数执政中的“罪行”与“过失”，宣布由8岁的儿子玄烨继位，并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深夜病逝，终年24岁。随后，遗体火化，骨灰葬于河北遵化清孝陵，庙号世祖，谥章皇帝。

孝庄文皇后，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1613年3月），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1688年1月），蒙古科尔沁人，博尔济特氏。天命十年（1625年）嫁于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封永宁宫庄妃。其

子福临即位后，尊为皇太后，其孙玄烨嗣位，又尊为太皇太后，因是皇太极之妃，而皇太极之谥号乃“文皇帝”，加之其子、孙又都是皇帝，因由妃称后，谥“孝庄文皇后”。她天质姿丽，聪明能干，且有谋略。其一生经历了清初三朝更替。在皇太极时期就“赞助内政，越既有年”。皇太极病逝时，她方32岁，当时由于“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其中最有力的争夺者为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在斗争甚为激烈的形势下，经她与孝端皇后多方斡旋，使多尔衮的谋位之欲未能得逞，终由其子福临继位。此后她又全力辅佐福临，由于多尔衮位高权重，谋位之心不死，时刻威胁着福临的地位。她为此，又对多尔衮施展谋略，软硬兼施，既笼络，又控制，从而巩固了福临的帝位。顺治病终后，幼年的康熙继位，她又辅佐康熙，授以治国安邦方略，当时的许多重大决策都与她的筹谋擘画密不可分，正如康熙所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鞠养教诲，以致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1668年1月）孝庄病逝，享年75岁，其临死前对康熙说：“太宗（皇太极）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意即，不必与其夫皇太极合葬。康熙遵旨将其灵柩暂停于遵化清东陵。直到雍正时，才将其正式安葬于沈阳昭西陵。



多 尔 衮

多尔衮，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十月（1612年11月），卒于清顺治七年十二月初（1650年12月底），乃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其青少年时代，就深受努尔哈赤器重。皇太极即位后，封贝勒，随之征战各地，“聪慧多智，谋略过人”，多有战功。崇德元年，封和硕睿亲王，旋又奉为大将军，统兵攻明，因战功显赫，其地位已远驾诸王之上。皇太极病逝后，本欲谋皇位，但因其他诸王联合反对，实力相较对其不利，权衡之下，终立福临为帝，并由他与济尔哈朗辅政。顺治元年统兵入关，降伏吴三桂，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即又派兵南下，灭南明弘历朝及农民军余部，对确立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功不可没。由于功勋昭著，顺治元年被封叔父摄政王，翌年又加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又晋封为“皇父摄政王”。随着爵位日高，声望日隆，专横擅权也日重。顺治曾说：“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多尔衮俨然是实际的皇帝。他在个人性格与生活方面，也恃功自傲，奢靡腐化，纵情声色，其王府金碧辉煌，雕镂奇异，远甚帝居。肃亲王豪格，是政争对手，多尔衮得势后，不仅将之置于死地，还将其妃博尔济锦氏纳为己妃。他还命朝鲜国王送女为妻。顺治七年十二月，在古北口外行猎时，多尔衮暴卒于喀喇城，年仅39岁。死后，初被追封为“诚敬义皇帝”，但仅两月后，即被告有“谋篡大位”等罪名，由顺治下诏削爵夺封，平毁宫室与墓葬。至乾隆四十三年，才以其“定国开业，成统一之业，厥功最著”，由乾隆为之昭雪。

“孝庄下嫁”说的由来及其论争

关于孝庄太后下嫁其小叔多尔衮的传说，在《清朝野史大观》、《清史演义》及《清宫轶闻》、《多尔衮轶事》中，多有记载，且绘声绘色，十分具体。但这些文人骚客的描写，与信史相证，常破绽百出，多不足为据。此事最早引起史家关注的文字是张煌言的《建夷宫词》十首，其中有一首说：

“上寿觞为合香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日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此词写于顺治七年，以当时人写当时事，似有所据。何况多尔袞恰于顺治五年已被称“皇父摄政王”，慈宁宫又是孝庄太后的寝宫。词中说的慈宁宫里张灯结彩，喜气盈盈地举行太后婚礼，显然是指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袞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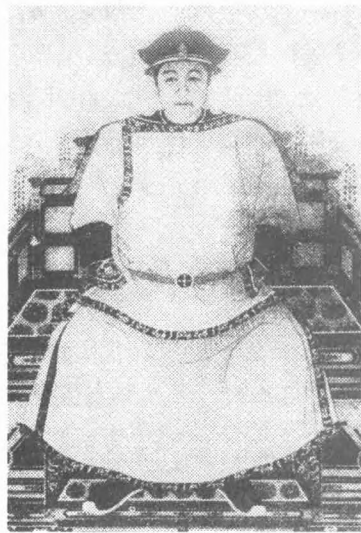
还有其他一些论据：其一，多尔袞被尊为“皇父摄政王”，由“叔父”改称为“父”，显然与母后下嫁有关；其二，据蒋良骐《东华录》记载，诏告多尔袞的罪状中有“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岂非暗指多尔袞迫使太后与之婚；其三，孝庄遗嘱康熙不要将其与皇太极合葬，是否因有再嫁多尔袞的难言之隐；其四，满族作为北方少数民族，素有兄终弟及、弟娶兄妇之旧俗，即使有下嫁事，亦不违伦理道德。

针对“孝庄太后下嫁”说的根据，孟森撰有《太后下嫁考实》，予以一一驳难。孟森认为张煌言是故明之臣，对清朝怀有敌意，所作诗句难免有诽谤之词，况且“诗之为物，尤可兴到挥洒，不负传言之责”。再者，顺治称多尔袞为“皇父摄政王”，寓有古代国君称老臣为“仲父、尚父”之意，此亦不足为据；至于所谓“到皇宫内院”，疑多尔袞另有乱宫之举，不见得专指孝庄太后；此外，孝庄之不愿与皇太极合葬，乃因昭陵已葬有皇太极之孝端皇后，第二皇后不与夫君葬，这在古代与此后都不乏实例。孟先生还认为既然“皇父摄政王”之称是公开之事实，倘若有“太后下嫁”事为何不见于清代官书档案？与孟森的看法相同，著名清史学者郑天挺教授也曾撰有《多尔袞称皇父之臆测》一文，提出“多尔袞以亲王摄政称皇父……疑皇父之称与‘叔父摄政王’、‘叔王’同为清初亲贵之爵秩，而非伦常之通称”，似与下嫁事无关。总之，孟森等认为，不能只凭张煌言的诗，以孤证论定有“太后下嫁”一事。

然而，孟森之说并未成为定论，胡适先生在读过孟氏的《太后下嫁考实》后，致书诘难，指出孟文“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的理由”，“终嫌皇父之称似不能视为仲父、尚父一例”。此后，无论是1949年之前，或者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仍不断有人肯定“太后下嫁”之说，作为清史专家的商鸿奎教授就曾在《清孝庄文皇后小议》一文中说：“即使有此事，也只能把它当作是一种政治手段来看，值此明清争夺天下之际，能息止满洲内部矛盾斗争”，将其视作“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也有学者在已有论据之外，又补充了新的依据。他们根据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收藏之《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书后有原收藏者所写之跋语：“清季，宣统改元，内阁库垣圯。时家君方任阅读，奉朝命检库藏。既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摄政王致史可法、唐通、马科书稿等，遂以闻于朝，迄今犹藏故宫博物院”，并据此认为“这可算是太后下嫁的有力佐证”。遗憾的是直到目前，并未发现和公布上述“跋语”中所说的“太后下嫁摄政王诏”，因而，至今“太后下嫁”说仍然是一个历史疑案。

“顺治出家”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关于“顺治出家”之说，最早见之于清初有“诗史”之称的吴梅村之《清凉寺赞佛诗》，此诗共四首，长达一百余句。一些文人学者在疏证诠释该诗时，认为诗句虽多迷离恍惚诡谲，却明显是影射“顺治出家”之事，如诗句中说：“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句中的“千里草”为董；“双成”乃用《汉武帝内传》王母侍女董双成的故事。都是影射顺治之董爱妃；另诗中的“晚抱甘泉病，遽下轮台悔”，是指顺治下罪己诏；而“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是暗喻顺治未死；还有“戒言秣我马，遨游凌八极”；“八极何茫茫，曰往清凉山”，是说顺治逊位出宫云游至五台山为僧。诗句之所以用影射手法，是因吴梅村身历沧桑，恐为时讳，不得不将顺治出家事以隐晦的手法记入诗中。此诗之后，在有关清代的稗史中，便将顺治出家一事演绎得既具体又神秘，从清初至清末流传不断。如说顺治



顺 治

耽于佛法，视帝位如敝履，并未终于帝位，而是于董鄂妃病逝后，弃政出宫，披缁云游，在五台山清凉寺皈依佛门。一些野史与演义中还说，日后康熙之所以多次奉孝庄太皇太后巡幸五台山，虔礼诸寺，其意在于拜谒顺治。甚至说光绪庚子年，两宫西狩，途经晋北，地方上接待中临时从五台山借来御用器具，都宛如宫廷之物，实是顺治的遗物。

针对上述各种顺治出家的传说，孟森在其《清初三大家疑案考实》之二《世祖出家事实考》中，以大量翔实的史实考证，顺治虽然好佛，但其确死于天花，终于帝位，并未离宫出家。尤其是孟森持论所根据的是王熙自撰的《年谱》。王熙是顺治时的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又是顺治的宠臣，顺治临终前的遗诏就是面谕他草拟的。王熙在《年谱》中，详细记载了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至初八这几日顺治帝及其本人的言行举止，而这几日正是顺治病死前的最后的一周，如《年谱》云：“辛丑三十四岁，元旦因不行庆贺礼，黎明入内，恭请圣安，吾人养心殿，赐坐、赐茶而退。翌日，入内请安，晚始出。初三日，召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圣躬少安，命至御榻前讲论移时”，“初六日，三鼓，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随勉强拭泪吞声，就御榻前书就诏书首段。随奏明恐过劳圣体，容臣奉过面谕，详细拟就进呈，遂出至乾清门下西园屏内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至夜，圣驾宾天，血泣哀恸。初八日，又同内阁拟上章皇帝尊谥，又同内阁拟今上皇帝即位年号，又为辅政大臣撰誓文。”王熙《年谱》翔实逼真地记述了顺治死前几日的活动，明确记载顺治是染痘（天花）病终于养心殿，并未有逊位出宫之事。无独有偶，孟森又举出当时在宫中担任词臣的张宸在其《青瑯集》中所记：“辛丑正月，世祖章皇帝宾天，予守制禁中二十七日。先是初二日，上幸悯忠寺，观内珰吴良庸祝发。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见宫殿各门所悬神对联尽去。一中贵向各大臣耳语，甚仓惶。初七日，释刑狱诸囚狱一空。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接着张宸又记述了顺治的整个治丧过程。王熙与张宸都是顺治病逝前后的亲身经历者、目睹

者，都说顺治死于天花。说明孟森的《顺治出家考实》有很强的说服力，从而也说明吴梅村以《清凉山赞佛诗》影射顺治出家之事不足为凭。

顺治出家的传说，事出有因，正如史学大师陈垣先生所说：“彼据《清凉山赞佛诗》等模糊影响之词，谓顺治果已出家固非，然谓绝无其事者亦未为的论。”陈垣老还曾撰有专文，说明“顺治出家之说，不尽无稽，不过出家未遂而已。”据有关佛教典籍，如《憨璞语录》、《续指月录·玉林琇传》及《玉林年谱》、《北游集》等书记载，从顺治十四年起，他与当时南北名僧木陈忞、玉林琇、憨璞聪、茆溪森等都有密切交往，顺治曾封玉林琇为“国师”，并请玉林琇为自己取法名“行痴”，号“痴道人”，且执弟子礼。他还请茆溪森为自己化度剃发，《续指月录》曰：“玉林到京，闻森首座为上净发，即命众聚薪烧森。上闻，遂许蓄发乃此”，说明顺治本已决心出家，经劝阻方罢（见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载《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与各种野史、演义中关于顺治出家的传说，似乎都是缘于顺治好佛的事实。

截至目前清史学界有关顺治的研究成果，较为一致的看法也都是认为顺治晚年确信佛、好佛，也有出家之念，但终未成为事实。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都有不少演义和传说，而关于清代宫廷的传说尤多，原因何在？我想主要是：其一，清朝乃由满族居统治地位，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有着不同于汉族的各种社会习俗，人们从有趣与好奇心理出发，编撰各种引人入胜的传说；其二，在明清易代之际及辛亥革命时期，一方面由于“华夷之辨”的观念支配，另一方面出于反满、排满的政治斗争需要，多有敌视与鄙弃满族的心理，出于宣传需要，人们编撰了各种带有丑化和夸大其词的传说。今天，从统一多民族国家之间的团结友爱出发，对之应有科学地分析；其三，宫廷内部的政治权力之争异常尖锐和复杂，加之宫闱之内又十分神秘与森严，发生在宫廷内的各种事件，经过口耳相传，难免失实。再加各朝统治者，又常常根据政治风云变幻而篡改各种官书档案，因此，今人对于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清代宫廷的传说，应明析有关史料的真伪，科学地予以鉴别。（责任编辑 仲文）

朱元璋的重典之治 与预防犯罪之策

● 江仁宝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政绩卓著的封建皇帝，他曾亲自经历过元朝的暴政，深感“元政湮扰”，“旧政不便”，“元制不足法”。因此，他在执政后，十分注意强化封建法制，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朱元璋强化封建法制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以猛治国”，即“重典”治国。他认为，必须用“重典”，才能使“事权归于朝廷”，以维护极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这是制定明律的指导思想。第二，重视犯罪的预防。朱元璋在“张刑制以齐之”的同时，始终贯串着“警省”臣民的预防犯罪的思想。

基于“重典”治国思想，朱元璋执政期间实行了严酷的重典之治。首先他用重刑思想指导立法工作。早在全国统一前的吴王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他令左丞相李善长、御史中丞相刘基、参知政事杨宪等二十人为议律官，根据他的指导思想参酌《唐律》制定律令。又恐“小民不能周知”，达不到法律统治的效果，命大理卿周桢制定《律令直解》。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冬，诏刑部尚书刘惟谦、翰林学士宋谦详定大明律。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以律条“犹有未当者”，又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详议厘正十有三条”。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刑部又奏请更定一次，重新编订。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五月，正式颁行全国，总其名曰《大明律》。《大明律》的颁行，是朱元璋“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的经验总结，朱元璋把它看成“一字不可改易”的治国法宝。

《大明律》与明以前法律相比较，就连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惠帝)也承认，“较前代往往加重”。为什么?因为明朝处于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统治阶级更加腐朽，广大农民的反抗斗争更加激烈，封建统治者的“典礼”、“教化”等欺骗手段，收效甚微，只能靠镇压的一手。例如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所谓“谋反”、“大逆”等，不仅本人要凌迟处死，其被株连的亲属包括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凡年16岁以上者一律处斩刑。凡强盗不分首从皆斩。明律对“谋反”株连达到惊人程度，甚至灭三族、九族、十族、左右邻里，以至乡里为墟。为了镇压人民反抗，明律还规定对“谋反”、“大逆”的罪犯，“有能捕获者，民授以民官，军授以军职，将犯人财产全给充赏；知而首告，官为捕获者，止给财产。”这是历代法律所没有的。同时还规定，凡伪造宝钞不分首从及窝主皆斩，财产并入官。私贩盐、茶，拒捕者斩。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奏启者，皆斩。”“大臣不经朝廷专擅选用官吏者斩”；对“亲戚非奉特旨不许授官职”，违者亦如之。“凡诸衙门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要鞫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宰执大臣知情与同罪。”所以，《大明律》是封建时代一部具有代表性的重刑法典。

在制定明律的同时，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亲自指导编纂了一部严刑惩治吏民的特别刑法——《明大诰》。《明大诰》共4编

236条,先后颁布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明大诰》择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摘录洪武年间的刑事案例;其二,结合陈述案例或另列专条颁布了一些新的重刑法令,用以严惩吏民;其三,在不少条目中,掺杂有朱元璋对吏民的大量“训导”,表达其重典治国的思想。这种以诏令形式颁布的,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法规文献,在中国法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明大诰》是明王朝推行重典之治的产物。与明律及历代封建王朝法规相比,《明大诰》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列举种种以酷刑惩治吏民的案例,公开肯定律外用刑即“法外之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明大诰》总共罗列族诛、凌迟、枭首案例几千件,斩首、弃市以下罪案万余种,其中酷刑种类有族诛、凌迟、枭首、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盖、断手、斩趾、刖足、枷令、常号枷令、枷项游历、重刑遇、充军、阉割为奴等几十种。据明史载,还有铲头会(十五人并列、挖泥埋其头、特露其顶,一削去数颗头)、刷洗(裸至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刷去皮肉)、钩背(背悬之)等。二是,同一犯罪,《明大诰》较明律大大加重,其中不少依明律只应处笞杖的,《明大诰》却加重为死刑。三是,设置了不少为明律所没有的禁令和罪名,如“禁游食”、“市民不许为吏卒”、“严禁官吏下乡”、“民拿害民官吏”、“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等。四是,强调重典治吏,其侧重点是惩治贪官污吏,条目的80%以上是针对官吏的。朱元璋制定、颁布《明大诰》是想通过颁布“大诰”峻令,使臣民畏而不敢轻犯,但实际上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诰一出,恶人以为不然,仍蹈前非”,“犯若寻常”。由于“大诰”倡导的是对人极度蔑视的封建强权主义和无节制的滥杀律令,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反对,朱元璋死后不久,就被其继承者逐步抛弃。

为了实行重典之治,朱元璋在司法上对人民、勋臣、官吏、富豪都实行残酷的刑杀。他曾是红巾军领袖,深知农民反抗力量的巨大威胁,因而对明初各地爆发的聚众起义给予严厉的镇压。如洪武五年九月,南海“黑鬼”聚众起事,被擒捕三百七十余人,尽杀之;洪武十五年正月,广东潮州海阳县曹名用聚众三百人反抗朝廷,“悉诛

之”;同年广东一起义军,首领号称“铲平王”,聚众数万人,明派兵镇压,残杀八千八百多人。可见,朱元璋重典之治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广大劳动人民的。

朱元璋又担心臣僚结党营私,削弱皇权,于是大肆诛杀元勋宿将。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他以“擅权植党”的罪名诛杀左丞相胡惟庸,同时被杀的有陈宁、涂节等数人。胡狱案,坐死之功臣封侯者至二十余人,坐诛者三万余人,此为明初“第一大狱”。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又以“谋反”罪名诛杀大将军蓝玉。胡蓝两案,史称“胡蓝之狱”,前后十四年之久,诛杀四万五千余人,“元功宿将相继尽矣”。除此外,还有朱祖亮、胡美、周德兴、王弼、谢成、傅成、傅友德以及冯胜等冤狱。

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惩治也极为严厉。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户部侍郎郭桓等的“秋粮案”,因收购浙西秋粮贪污,牵连官吏至数万人,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者皆处死,下狱拟罪者数万人,追赃粮七百万石。像这样的严刑和大规模的诛杀官吏,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朱元璋还常用剥皮之刑惩罚官吏。按《草木子》记:“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这些措施,对于建立专制君主的权威、巩固封建统治,确有作用,使封建官吏的贪欲有所收敛,因此应该说对人民还是有利的。

为防止豪族地主在地方上危害封建政权的安全,朱元璋进行了严厉的限制和打击。除施用严刑外,还将豪门富民之家迁徙出本地乡土,“亡其宗”。洪武三年徙江南十四万户于凤阳;二十四年徙五千三百户于南京;三十年又徙一万四千三百余户于南京。这些豪门富民,田地籍没,远离乡土,使之财势俱失,不能危害朱明王朝。

为了实行重典之治,朱元璋设立锦衣卫(即特务机关),建立廷杖制,这是极端君主专制制度在法律制度上的反映。洪武十五年(公元1389年),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皇帝专制,惟恐官吏谋逆,为“缉访”和审理官吏犯罪,所以特设锦衣卫等特务机关。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从事侦察、逮捕、审讯、判刑等活动,并直接承命于朱元璋,而审讯、杀人可以不丽于法,不通过明朝的最高审级即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

院共同组成的“三法司”，世称“诰狱”。锦衣卫凌驾于“三法司”之上，控制“三法司”审判，这是历代所没有的。

明代廷杖制度无法律规定，只要廷臣违忤旨意，朱元璋就命锦衣旗校“行杖”。廷杖始于元代，朱元璋施行得更为普遍厉害。《明史·茹太素传》称：“茹太素……(洪武八年)陈时务……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此后廷杖便经常施行。朱元璋时，永嘉侯朱祖亮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夏祥毙于杖下，不少廷臣往往被活活杖死，弄得京官人人自危。

朱元璋作为君主专制极端强化的皇帝，在实行“重典”之治的同时，还明确地提出以预防犯罪作为强化法制的目的之一。他的预防犯罪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重视法制宣传教育，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动手抓宣传措施的落实。《明大诰》成，朱元璋亲御午门，面谕群臣，阐明其制大诰示臣民之目的。他说：“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诰条目……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同时下令“使民知法”，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并要“臣民熟视为戒”；还规定为民家有一本《大诰》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并“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欲其自动知所遵守。”又令“民间子弟于农隙时讲读律令”，规定村社节日、民众集会时，官府派专人讲解《大诰》的内容。所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使人人不至为非”，“奉法守分”。

朱元璋特地把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放在官吏上，朱元璋要求对《大诰》必须“臣民熟视为戒”的策略思想，具体地说包含两个方面意思：一是“使民知法”可以减少社会犯罪；二是更为重要的是防止官吏弄法，在组织上解决官吏的知法守法问题。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朱元璋就将《大诰》颁赐监生，令全国各地学校都以它作为学习的主要课程。科举时，以《大诰》出题，以诸生对《大诰》熟悉的程度资以录用。朱元璋要求学校讲《大诰》，并以此作为录用的标准，既可以培养具有法律知识的官吏，也有利于他的法律思想熏陶这些官吏知法守法，从而在组织上保证法制宣传教育的实施，以期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朱 元 璋

的。

朱元璋用严刑酷法惩治，虽然对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却又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一是“法外用刑”破坏了封建法制，特别是皇帝特令锦衣卫特务组织，巡察缉捕，专理“诏狱”，驾于“三法司”之上，控制司法大权，严重阻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二是全国统一后，在其翼护之下新的官僚和地主阶级通过合法赏赐和非法兼并，迅速占有了大量土地和佃户，农民被迫四处逃亡或聚众反抗和起义，导致社会生产日益萎缩，广大农村一片荒凉，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三是，重典之治到了明朝中后期就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它们对在封建商品经济内部刚生长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实行种种禁令，进行严酷的摧残。如封禁全国各地出现的金、银、锡、铝、铜矿以及煤矿等开采业，并用重税手段对工商业者进行残酷的掠夺，以致“客商畏惮征求，多致卖船弃业”，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文化的进步，造成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矛盾突出，因而加剧了明王朝在农民战争的暴风骤雨中的衰退、崩溃和灭亡。(责任编辑 程 度)

李世民 纳谏的前后变化

● 徐澄清

如果从秦始皇建帝号算起（公元前 221 年），至清宣统宣布“退位”止（公元 1912 年），在这两千一百多年中，大约有二百多位皇帝，其中天下统一的皇帝约有一百二十多个。在这些诸多皇帝中，昏庸、残暴、荒淫之君众多，但也还有为数甚少的杰出明君。唐王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是一位有作为的杰出明君，他开创了我国封建历史上的“贞观盛世”，史称盛唐时期。其所以如此，固然原因很多，但作为李世民个人来说，这与他 18 岁从军南征北战的经历大有关系。他清醒地看到隋朝灭亡，无道暴君炀帝被士兵勒死江都的教训，看到人民的力量，从而能兼听纳谏。不过，他的纳谏又是前后不一的。

前期，唐太宗希望大臣们“直言颡议，致天下太平”（参见《贞观政要·求谏》），而且说到做到。当大臣们奏事时，则和颜静听，鼓励大臣们大胆提出谏诤之言。同宰相们商讨国家大事时，允许谏官旁听，并对直言谏诤者予以奖励。

在唐太宗认真求谏的鼓励下，贞观一朝君臣确曾一度形成了一种直言进谏、纳谏之风。民部尚书裴矩佞于隋，也能大胆进谏力争。司马光就说：“裴矩佞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参见《资治通鉴》）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在点兵年龄问题上采纳了封德彝之谏，将年龄由 21 岁改为 18 岁，下了几次诏敕，魏征则坚持认为不可，压发诏敕，唐太宗因此事盛怒，召见魏征，指责魏征固执。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可是自陛下即位以来，才短短几个月，已经有几次失信于

民了，怎能使民相信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魏征一席忠言，觉得有理，反而高兴地说：“过去我总以为你固执，不悉政事，今天听了你分析国家大事，甚为中肯。如果号令不信，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呢？看来是我错了。”于是点兵仍依原制，年龄仍限制在年满 21 岁的壮丁中，魏征也因为敢于直谏得到唐太宗奖赏。

贞观元年（公元 626 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读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怨反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以下，宜体朕意。”（参见《资治通鉴》）在这里唐太宗以史为鉴，将大禹治水与秦始皇修宫殿作比较、分析，同样是搞“建设”，为什么人们对大禹没有意见，对秦始皇却怨恨得甚至造起反来呢？原因就在于治水是为了人们的利益，修建宫殿是为了个人享受。然后说到自己原打算建造一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鉴于秦始皇的教训，决定不修了。这时太宗才 29 岁，头脑是清醒的，能做到“鉴秦而止”。

贞观四年（公元 630 年），太宗似乎把他说的话忘了，下诏征发劳力修复洛阳的隋代乾元殿，以备巡幸之用。大臣张玄素上疏反对，指出修复乾元殿有“五不可”，并说，如果陛下要这样做，“恐甚于（隋）炀帝远矣”（参见《贞观政要·纳谏》）。唐太宗很不自在，召见张玄素问道：“你认为我这样做还不如隋炀帝，那我比起夏桀、商纣又怎样呢？”张玄素答道：“如果陛下一定要修复乾元殿，那我看就同归于乱了。”（参见《贞观政要·纳谏》）唐太宗见张玄素把

这件事看得如此重大,经过一番思考后,为之转念,并感慨地说:“朕没有认真考虑,以致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于是下令停止修复乾元殿工程,并表彰了张玄素直言进谏的精神说:“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欲到南山巡幸游玩,一切准备就绪,结果未去。魏征问道:“陛下为何不去了?”太宗笑着回答说:“害怕爱卿责怪我,所以不去了。”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鹞,把鹞玩得正高兴的时候,魏征来奏国事,太宗慌忙把鹞藏于怀中,魏征奏事不停,鹞竟被捂死怀中。这种皇帝怕大臣的事,史属罕见。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太宗在一次上朝中,为魏征直言所激怒,罢朝回宫,向皇后说:“魏征每廷辱我。”我要杀魏征,深明大体的长孙皇后听了反而向太宗祝贺说:“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太宗冷静下来,觉得皇后说得很有道理,转怒为喜。看来,太宗的纳谏和睿智贤达的皇后也大有关系。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征在《十渐不克终疏》批评唐太宗说:“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意思说,皇上说起大道理来远远超过了历代最圣明的君主,可是实际行动上并没有超过一般的君主。魏征针对太宗“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的行为,而不是凭空而谈的。《疏》中又指出:“陛下……虽爱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意思是,您虽然在口头上念念不忘人们的疾苦,但是实际上对自己的享乐是最关心的。这种尖刻的批评,气量不大的人是受不了的,何况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唐太宗对魏征的批评并未治罪,反而是“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并写在屏风上,朝夕

瞻仰,又令“录付史司”抄给史馆载入史册,给魏征和直谏的人以奖励。这种接受批评的水平应是很高的了。

太宗的诚于纳谏之举,确实在封建历史上少见。从武德九年到贞观十七年(公元626年到643年)魏征为巩固唐王朝江山社稷,光明磊落,嫉恶如仇,犯颜直谏,前后向太宗谏奏二百多条。如:“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弊”、“任贤受谏”、“任贤无猜,可以兴矣”、“薄赋敛轻租税”等等。这些都为唐太宗采纳,对唐王朝的巩固和强盛起到了重要作用。魏征也受到唐太宗的器重。魏征言直,常为某一件事和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弄得太宗难看,下不了台,事后太宗仔细一想,觉得魏征坚持得对,言虽逆耳,却是忠言,又感激魏征的忠诚。为表彰魏征赐书写道:“疾风知劲草,板

荡识忠臣。”魏征接过赐书一看,摇头说:“谢陛下赐书。不过,臣不愿做忠臣。”太宗疑惑地问道:“爱卿此乃何意?”魏征回答说:“臣不愿做忠臣,愿做良臣。”太宗仍不解其意,继而追问道:“这忠、良有何不同?”魏征说:“做臣子的对人君言听计从,忠贞不二,乃忠臣也;直言进谏,匡正人君过失,君臣协力者为良臣也。”太宗听罢连连称赞,提笔将“忠”字改为“良”字。

贞观十七年魏征死,太宗思念不已,叹息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歿、朕亡一镜矣!”

唐太宗纳谏如流,贞观业绩,为后世传为佳话。看到史书的记载,令人啧啧赞叹!但也引起我的一些疑想,这该不是史家们笔下有泡沫



李世民

吧,该不会是有些夸大的包装吧?该不会是撰写《贞观政要》的吴兢“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吧!但不管如何,纵观诸多史料,赞太宗纳谏如流者甚多。

唐太宗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实为一代明君。从策动其父晋阳起兵反隋,到贞观前期的20年间(即20岁到39岁)这段时间是唐太宗的光辉年代。但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王朝统治地位的稳固,封建专制“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制度和奢侈的帝王生活,以及大臣们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使唐太宗往骄奢的方向变化。这样,贞观前朝较开明的局面开始有所下降,阴暗面开始扩大。唐太宗本人也逐渐骄奢起来,听不进直谏良言。正如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魏在一次上疏中指出太宗在贞观初年是“闻善惊叹”,到贞观八、九年还能“悦以从谏”,但已不像从前。从那以后就变得“渐恶直言”了,虽有时也能勉强纳谏,但不像以前那样豁达、痛快了。这样一来,心术不正的佞臣、逢迎讨好皇上的弄臣就可以“肆其巧辩”,“妨政损德”,贞观盛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唐太宗在贞观后期纳谏精神减退,听不进反面意见,盲目自信膨胀起来。不听大臣劝阻,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对高丽用兵,胜小失大。“游猎太频”,大臣纷纷谏阻,太宗反唇相讥,说什么“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疏,朕游猎仅在后苑,不烦百姓,有什么不可!”其实游猎早超过“后苑”范围。更糟糕的是上行下效,太子承乾就因好“游畋”而废学。另一位儿子吴王恪在安州“数出畋猎,颇损居人”。太宗又不惜国库,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竟下诏说:“从今以后,太子所用库物,有关部门不要加以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张玄素上疏反对,差点被太子家奴打死。太宗也忘记了贞观元年十二月他向群臣宣布的“鉴秦而止……宜体朕此意”的话,更把当年接受张玄素批评,停修乾元殿的事置于脑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就大动民力修仁寿宫,后改名九成宫,不久又修复洛阳宫。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又营造大明宫,意欲给太上皇李渊玩乐居住,但在第二年李渊还没住进去就一命呜呼了。贞观十一年(公元

637年)又在洛阳建飞山宫,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又建玉华宫,并说要“务令节约”,结果仍是“费资巨以亿计”。这些劳民伤财之举和贞观前期他赞同采纳魏征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相去甚远。

贞观后期太宗“轻用人力”,“东征高丽,西讨龟兹”,不吸取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征高丽损失惨重的教训,甚至连自己说过的话,征高丽“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也忘记了,不久又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三月再次发兵征高丽,并下诏大造海船。九月,雅、邛、眉三州少数民族因不堪造船之苦起来造反,有些州弄得民“卖田宅、鬻子女而不能供”的悲惨境地。

看来,唐太宗在40岁后,无论在思想、作风和健康等方面都走上了逐渐衰退的道路。这位杰出的明君在他的英武、豪迈煌煌伟业之中又带了些悲剧性色彩。

太宗45岁时已经早衰了。他不隐讳地对大臣们说:“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其后,他同样遇到皇位继承问题,太子谋反,魏王被黜,辅国大臣相继去世,使他一次次受到了很大刺激,这更加速了他的“衰怠”。再后来是多种疾病缠身,健康每况愈下。太宗曾嘲笑秦皇汉武相信方士长寿之术,但他自己仍然没有摆脱方士的长寿邪说,食方士金石之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又派人从中天竺访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食了这个异国骗子的“延年之药”,使疾病急剧恶化。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三月,唐太宗带着沉重的病体,宣布了他的最后一道敕令,五月腹泻不止,名医为之束手,弥留之际,向太子李治、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交待了后事,尔后永远地离开了他统治23年唐王朝皇帝宝座。

我们在谈到唐太宗和颜纳谏创贞观盛世的历史时,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是什么民主。因为纳谏本身仅是封建专制皇权的自我约束,并非权力制约机制。谏可纳,也可以不纳;秦可鉴,也可以不鉴。纳不纳谏,鉴不鉴秦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唐太宗“先纳后犯”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

(责任编辑 吴思)

溥仪是怎样走近日本的

● 爱新觉罗·毓嶙

溥仪六岁退位以后，还在紫禁城里当他的关门皇帝，稳稳当地又当了13年。1924年11月，北京政变一下就把他抛出了紫禁城，逃进了日本驻中国的公使馆。

关于北京政变，日本今井清一著的《大正德谟克拉西》中有这样的叙述：

在冯（玉祥）的北京政变背后，是有日本军人在暗跃。第二次直奉战争一开始，作为住友的嘱托寺西秀武预备大佐，就策划了冯的倒戈而成为奉派的天下，为了收买冯的一派，便由张（作霖）出一百万日元，通过三井银行奉天分行行长转吉冈显作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再转段祺瑞，由段交给冯玉祥，成功地发动了北京政变。这也是北京的芳泽谦吉公使和林弥三吉武官，支援了宇垣陆军大臣和上原元帅的工作。宇垣在日记中写道：“新局面的开展（冯的政变），真像是一种天佑，如同社会上存在着许多幸运儿一样，这真是棒极了呀！”

井上清在他写的《宇垣一成》一书中指出，冯玉祥的倒戈，实际上是日本陆军特务将校做的工作，北京的日本公使馆附武官林弥三吉少将就是特务之一。

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是在1924年11月5日，临时住在他生父的醇亲王邸，当时称北府。溥仪在北府的树滋堂里呆了三天，内外不通，与世隔绝。到8号的下午3点多钟，鹿钟麟和张璧（警察总监）来会见溥仪。

首先是鹿钟麟征求溥仪对于政府修改的对清室的优待条件的意见，溥仪表示感谢，没有意见；又问对于取消皇帝尊号有何感想，溥仪感到能做一个中华民国自由公民，还是很高兴的，并希望将来能到国外留学深造。

接着，张璧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谓的“传国玉玺”，说皇帝有一块历代相传的金镶玉

玺，这不过是民间的传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张璧还不大相信，大家给他解释，说是清朝历代皇帝都有自己的玉玺，都存在交泰殿，他便不再追问了。再一项是有关皇帝的私产。说实话，溥仪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私产，他说这事情得问内务府大臣绍英。正是绍英陪着鹿钟麟和张璧来北府的，他一听溥仪说，叫他交代一下有关皇帝的私产，他就犯了难了。他说：“皇室的私产在盐业银行的存款，马上就可以交出来，至于有多少房、地产，多少年来也没清查过，按时交租金的，只是极少数，还能查得出来。”

“那房、地产就没有什么契约或者是合同了吗？”张璧追问道。

“有、有……”绍英说了两声有，下面就嗫嚅起来了。

“有，有那么两库房，自打我当内务府总管的时候就有，就没动过，现在没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是清理不出来的。”

这个内务府的腐化无能，正是这个小朝廷的缩影。张璧也感到这真是个无从下手的问题，只能留待以后研究。

第二天，绍英来到北府还带来了好消息，就是昨天向鹿钟麟提出来的要求，大部分都同意了，北府的门禁也开了。王公宗室等人，经溥仪同意的就可以前来，但是年轻人不行，外国人更是不行。溥仪也可以派人到宫里去取东西，取一些零用的钱，这些当然是在张璧的监视之下进行的。溥仪还特别嘱咐为他取东西的人，要把他的爱犬“佛格”带来。

门禁开了以后，一些宗室、师傅还有遗老们，就纷至沓来北府的大书房，大家各自想办法来营救，首先是溥仪的人身安全问题，再有个人自由的问题等等。自从溥仪出了紫禁城那天起，最没有办法一筹莫展的就是他的父亲——王爷。

5日那天晚上，郑孝胥偷偷地带着日本人来，打算让溥仪以看病为名混出北府，虽然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但是他还不死心。这一次他的计划是公开地请求日本公使馆派军队来，直接保护溥仪出北府，仍然是遭到了反对，理由是日本军队到北府来，万一和国民军冲突起来怎么办，溥仪的人身安全，以及王爷的全家和整个北府谁能保护得了。

郑孝胥在清朝光绪年间，就在中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里担任书记官，后来又在大阪、神户当领事多年，回国以后又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章京，在外任上当过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都是正三品的官。辛亥革命以后以遗老自居，不做民国的官，连民国的年号也不用。他认识溥仪只有一年多，是1923年的夏天从上海来到北京。溥仪说：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

罗振玉是在光绪末年，曾去日本考察教育。他在日本住了九年，罗回到天津之后，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日本驻津领事馆都有来往。

当冯玉祥的国民军接管了北京城内守卫的时候，罗振玉就预感到紫禁城是朝不保夕了，就



溥仪在天津打高尔夫球

去了天津，要求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出面“保护”。日本司令部告诉他，北京的竹本大佐会有办法。

罗回到北京，首先向溥仪报告了他去天津求援的经过，使溥仪和王公们觉得他那种不顾年迈、不辞辛劳的精神，赞许不已。

罗振玉还告诉溥仪：“我在日军司令部还看到了段祺瑞指责冯玉祥‘逼宫’的通电，……”

这个密电是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金子参谋打给北京的日本公使馆武官竹本多吉的。这封电报的原件现在还完好地保存在日本。因为是电报，电文全是日本的假名，译为中文如下：

段祺瑞致郑孝胥。电已阅。皇室事余全力维持，并保全财产。但宣统帝进入东交民巷之事可中止之。已命冯之代表进京适当办理。

原来在冯玉祥“逼宫”之前，国民军就把京师卫戍总部所属驻故宫和景山的部队1200多人全部缴了械，使溥仪的小朝廷产生了不祥的预感。郑孝胥就求竹本转发了一封向段祺瑞求援的电报，竹本就打给了金子参谋，这就是金子转发的上述回电。

冯玉祥回师到了北京北苑，就发出了主和的通电，反对内战，同时，公布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稍后便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曹锟下台了，中国不能没有政府，冯玉祥也不能自己去当大总统，就成立了以黄郛为首的内阁。黄郛是老同盟会会员，曾参与过北京政变的策划。

黄郛的内阁是残缺不全的。他本人代总统兼总理，还兼交通、教育两部的总长，一人兼四个职位，王正廷兼外交、财政两个部长，王永江为内务部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杜锡圭为海军总长，王乃斌为农商部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时，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就是黄郛以大总统的身分发出的指令。

段祺瑞于11月21日入京，就任中华民国执政，北府大门国民军的警卫撤走了，换上的是北京的警察来担任警卫。

溥仪到北府的当天晚上，郑孝胥就带着日本人来了，打算以看病为名，把溥仪弄到日本使馆去，溥仪未敢轻举妄动。11月26日傍晚，郑孝胥又偷带着日本人，冒充大夫进了北府，和溥仪密谈了一次。过了两天，郑孝胥就凭着《顺天时报》

报》上的一篇什么《赤化运动之平民自治歌》，吓唬溥仪，说马上要天下大乱，赤化主义首先要对皇帝下毒手，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说这不过是报纸上的宣传材料，而罗振玉从日本人那里得来的消息，就不能使他不相信了。他说冯玉祥将对溥仪有不利行动，冯军已经占领了颐和园，一两天内就可能出事，他劝溥仪要早作准备才好。

11月29日下午三时，溥仪进入了日本兵营，当了两个小时竹本的座上客，午后五点进入日本馆后，就成为了日本公使的“客人”了。此时的溥仪，对武官竹本多吉感激不尽，用八开红色信笺题词：

义勇可钦，书赠送竹本统领

宣统御题

还用上了“宣统御笔”的玺。

又一幅比较大一些，写的是：说礼敦诗

这一幅没有上下款，只用上了“宣统御笔”的玺。溥仪带头赠字，宗室王公们也都纷纷给竹本赠字，遗老们中郑孝胥和罗振玉也给竹本赠字。

转过年来，当溥仪要去天津之前，特意又赠送给竹本一个银瓶。

竹本在溥仪去了天津之后，也经常到张园（溥仪初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的住所）访问。1926年冬天，竹本被调回日本国内，1927年日本的大正天皇崩逝，竹本临时被委任为大葬的禁卫将校，然后就职于京都连队司令部。这个连队是陆军编制，相当于团级，竹本是个团副。

第二年，1928年竹本陪同京都的西阵织的一个成员，到天津张园访问溥仪，献上了一匹西阵织的锦缎。1929年8月1日竹本带领全家到八百政饭店聚餐，第二天，48岁的竹本自杀在淀川桥下。他家中马上来了宪兵，把公文包和文件全都拿走了。

竹本在“北京政变”里干的是什么事情呢？大概只有他和郑孝胥自认为是“茫茫青史无此奇”。中国人看郑的行动是“手持帝子”赠狼狐。日本人看竹本的行动，大概和收容收留王毓芝差不多。王是曹锟的心腹谋士，被国民军软禁起来了，王腿快跑进了日本使馆。日本“租界”是个“好客”的地方，竹本正是个“好客”的人罢了。

“九一八”是中国人民的国耻日，作为“九

一八”事变的序幕，应该说是1928年日本人在沈阳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事件，搞这次恐怖活动的是日本关东军的特务河本大作，河本正是当年竹本在士官学校学习的第十五期同期生。

竹本自杀后两年，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当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

（责任编辑 刘文）

欢迎订阅 2002 年

博览群书

（月刊）

汇萃名家力作 传承名著经典
提倡兼容并包 弘扬先进文化

《博览群书》是胡耀邦提议创办并题写刊名，由光明日报社主办的以评介国内最新出版的图书为主要内容的普及性书评月刊，创刊于1985年。

《博览群书》的办刊宗旨是：汇萃名家宿学的书，评书品，书人书事，品格自立，兼容并包，注重人文关怀，倡导学以致用；强调对人及其自我表达的尊重，力求文章有趣、耐看又不失典雅，并具有尽可能多的信息量；注重读者参与，与著者、专家并肩论道，共同体味参详书内书外的人生。

《博览群书》主要栏目有：“本刊特稿”选择重大理论问题或突出的现实问题，组织专家讨论成文。“文化思考”体现作者对某一问题的深入思考。“百家书话”评介新书，反映学界、出版界的热点、重点。“书与人”再现思想学术史上的书人书事。“域外书谭”介绍国外思想文化经典名著及最新的研究出版动态。《博览群书》欢迎您为本刊撰稿并提出改进意见。

《博览群书》每期5印张，定价5.30元，全年63.60元，邮发代号：2-868，全国各地邮电局（所）均可破季订阅。编辑部办理邮购。

地址：北京市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电话：(010)63082301 63019101 (传真)

E-mail: blqs@publica.bj.cninfo.net

http://www.gmdaily.com

已上网的作者、读者和有关单位可通过电子信箱与本刊联系

本刊恳请作者来稿、来函用电子邮件直接发至本刊电子信箱

顾祝同枪杀报纸编辑刘煜生

● 散木

1933年1月,江苏镇江《江声日报》编辑刘煜生被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以违背《出版法》为名下令拘押,后又依据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他枪杀,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的一桩案件。刘煜生所做的事,无非是在该报副刊《铁犁》刊登了四篇短篇小说《边声》、《下司须知》、《当》、《端午节》,其中出现过这样一些句子:“一队咱们祖国的兵,向左边退下,自然隐隐的右边上来的是敌人”;“地上泛起红潮,添上一片红”;“铁的纪律”;“奴隶们争斗吧,一切旧的马上都被冲倒,时代已敲起丧钟,一切眼前就要葬送”等。

刘煜生死前曾于狱中“泣血”上书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申诉自己的无辜,国民党监察院亦先后派高一涵等前去调查,结果报告认为刘煜生“应付惩戒”,要求顾祝同将刘煜生照章移送法院处理。刘煜生继续上书,陈述四篇短篇小说发表的经过,即该报副刊主编和投稿人发表前曾声明“文责自负”,但刘煜生被捕后他们却一口否认,并推诿给刘一人,此外又有镇江商会的于小川在幕后操纵,设法使投稿人推翻前供。审问官对刘煜生采用逼供信手段,刘煜生在狱中不禁慨然:“生之生死原不足惜,特省府如斯黑暗,竟然摧残舆论,蹂躏人权而不辞,宁尚有公道可言哉?”于右任接到刘煜生的上书,又派遣调查员马震赴镇江详细调查。顾祝同恰好不在江苏,马震只是先后得到省府秘书长金体乾、秘书姚鹤雏、保安处秘书冯沛三等的接待和陈述,他们都借口案情重大,对人犯须“绝对隔离、案卷亦绝对秘密”,拒绝了马震调卷审阅的要求。省府人员所谓的案情重大,后来被刘妻张若男道破原委:原来刘煜生获罪的根本原因是他从前得罪过顾祝同,在该报报道过省府鸦片公卖的秘闻,于是顾祝同借文字狱罗织罪名,必欲杀之而后快。

顾祝同依据《出版法》捕杀刘煜生,是根据其第19条1、3各款,即出版者“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者”、“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对照前引《江声日报》副刊发表的小说中的用语,这个罪名未免有些莫名其妙。但是顾祝同一口咬定其“内容所载描写贫民及劳工生活,显有激动阶级斗争之用意,察其文字并含有共党口吻及各种隐语”。顾祝同虽借口国民党的《出版法》给刘煜生定罪,但《出版法》中又规定处罚机关为内政部,逮捕刘煜生却是国民党在江苏省的机关,这应该算是越权。顾祝同又称拘押刘煜生是根据江苏省戒严暂行条例行事,但按当时法律规定,非现役军人不得适用于军法审判,镇江又非戒严区域。对于监察院的置疑,顾祝同指责说:“对于适用出版法以制裁报馆、适用戒严条例以审判犯罪人及在戒严区域内戒严司令部有权办理审判各节,法令各有根据,(监察院)均未能分别体会,徒以普通法理、平时状况相责难,实于‘一·二八’事变后江苏省之情况不符。至于监察院调阅案卷,能否对于军事机关审判罪犯中之事件亦得适用,实属绝大疑问,因机关权力之问题,并非机关自身所得任意作扩充之解释者,况共产党徒之犯罪,其危害涉及于国家,稍不慎密,即可发生变故。监察院亦国家机关之一,似于此种情形亦应同有认识,不为个人情感所冲动,方为国家前途之幸。”顾祝同之霸道由此可见一斑,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国民党统治时期所谓“法治”的真实情况。

顾祝同悍然枪杀作编辑、记者的刘煜生后,舆论大哗。此时又传来《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王慰三被枪杀案,新闻界人人自危,各地同仁纷纷发电抗议,形成了1933年2月的抗议电报风潮。北平新闻记者公会、安徽省会新闻记者联合会、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杭州新闻记者公会、蚌埠新闻记者协会纷纷发电抗议顾祝同“弁髦法令,蹂躏人权

之暴行,实与北洋军阀张宗昌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之惨案有过之而无不及”。江苏江都地方公民也发表电文控诉顾祝同自改组省府后,大权独握,“明为合议,实则专制,种种违法殃民、苛收杂税各事实笔难尽述”。甚至国民党内的胡汉民也致电南京政府林森、孙科,就刘、王两记者不经司法程序而被害之事件,痛慨“数年以来,人民言论、出版、居住之自由为军人剥夺净尽。纲纪坠毁,民无死所。刘、王之死,张宗昌之杀林、邵,亦不过是于党徽之下效野蛮残暴之行为。视党何如,自视又如何”?

这时,民间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刚刚成立,迅即发起抗议活动。1月30日,同盟上海总会开会研究对顾祝同抗议事项,作为会员的鲁迅也出席了这次会议。2月1日,同盟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宣言抗议枪杀刘煜生。此前,同盟成员林语堂致电杨杏佛、胡适、傅斯年等,要求其联络北方学者以拥护监察院主张名义,开展对刘案的彻底查办,希望“平、沪两方同时进行”。后来,主持同盟北平分会的胡适根据同盟大会决议,代表同盟北平分会致电国民党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和行政院,要求免职并查办擅杀刘煜生的顾祝同,“以重法治而维人权”。当时许多被国民党当局迫害的进步青年和维护人权的人士对同盟和胡适等寄予厚望,一些狱中难友、受害人家属和朋友纷纷致函胡适,希望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一贯倡导维护人权的舆论界名望人士主持公道。后来,上海方面召开抗议顾祝同的大型记者招待会后,同盟成员、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致函胡适,引起了胡适的猜疑和反感,胡适以为中间有凭空捏造的嫌疑。他说:“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进而把这怀疑和不悦擅自向外界披露。他在对《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时,公然反对同盟决议主张的释放政治犯等各项提议,造成了同盟内部的分裂。在协调无效的情况下,宋庆龄、蔡元培致电胡适,以“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后胡适被同盟开除。

胡适当时的立场,已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表明:“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力,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到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

判。”这是他认为妥当又不失公正的立场和方法。然而我们通过刘煜生一案,已经可以看出他只能给前者以口实而使后者架空,鲁迅的锐利眼光,已经分明看出胡适与同盟众人的分歧所在。胡适先提出“人权论”,又提出所谓“政府权”来,那么,面对一个完全以暴力统治人民、罔顾人权甚至罔顾监察院和法院的军人地方政府,你如何给人民提供“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呢?这不是与虎谋皮么?鲁迅有诗谴责胡适: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远庖厨。

能言鸚鵡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好向侯门买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鲁迅《伪自由书·王道诗话》)

诗中“实验”指胡适倡导的“实验主义”;“鸚鵡”,指胡适原来《人权论集》一书所引“鸚鵡救火”的故事:鸚鵡沾了水来救火,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这种“救火”的态度,鲁迅以为就是拿人权“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五千”,是指胡适以名流身份到长沙演说,得何键的“五千元程仪”。总之胡适是希望在即定政治框架和体制内解决“民权保障”问题,他反对要求革命的权利,反对这种“保障民权”。其实,这是不同于“政府的正当权力系得自统治者的同意(民有、民享、民治),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话,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的自由主义精神嫡传的,这是他与鲁迅等人的根本区别。

关于刘煜生,史沫特莱致胡适信中曾说:“人们正在征集刘煜生所写的那些使他招致杀身之祸的文字。我们准备将他的这些文字连同他的相片和小传,用中英文印成小册子。”可惜后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核心人物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无疾而终,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在很少有人还知道刘煜生了。

(责任编辑 吴思)

为蒋家王朝经济领航的台湾技术官僚

● 孙代尧

在 50 年代初，台湾开始有大批财经技术官僚出现于经济决策部门，到 60 年代，由高学历、高素质的专家学者组成的技术官僚队伍在台湾的财经乃至行政和党务系统中占据了主要比例。如在财经决策核心最有影响力的有尹仲容、严家淦、李国鼎、费骅、张继正、陶声洋、孙运璿、俞国华等人。他们中有的具有高学历的特点，如：农复会历任主任委员蒋梦麟(1948—1964)、沈宗瀚(1964—1973)、李崇道(1973—1979)等，分别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农复会担任秘书长的蒋彦士、张训舜、李崇道、王友钊，以及曾任农复会经济组组长、农村复兴部主任的李登辉等，除张训舜只有爱荷华州立大学硕士学位外，其他人都有美国各大学的博士头衔。这些有较强亲美倾向的技术官僚，信奉理性化的决策和管理，行政能力强大。

这些高学历的财经技术官僚大半是学理工出身，即使是“经济部长”，也鲜有经济学历。从 1950 年至 1990 年的 14 位“经济部长”中，只有张兹岂和徐立德学过经济学和政治学，在台湾，由理工人员制定经济政策，比起很多国家通常由法律专家和经济学家制定经济政策来得顺利，可能是理工出身的人才更有理性和现实取向，倾向于审慎、计算和计划，较少目标理性和理想主义色彩。经济现代化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体系，在完成现代化之前的阶段，熟习工程学观点的官僚比经济专家更易发挥作用。这些技术官僚另一个特点是多为大陆籍人士。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在三大美援机构任职的 29 名重要财经技术官僚，仅李登辉为台湾省籍；七八十年代的财经“部会”首长，也是大陆籍居多。形成这一特色的原因，除了蒋氏父子比较信任大陆精英外，也因为光复后在台的日籍官员陆续返国，造成台湾财经技术人才的断层，只能倚重大陆来台人才。人们常以国民党逃台时从大陆带走的一批财富，作为战后台湾“经济奇迹”的解释原因之一。实际上，这些有限的黄金美钞和机器设备，只在初期的经济恢复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倒是国民党从大陆带走的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才，才是对台湾经济数十年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的“财富”。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大致可以根据职能和权力结构划分出三类精英群体：党工官僚群、军人官僚群和行政部门的技术官僚群，前两者即所谓“革命精英”和“军事精英”。国民党初上台湾岛，技术官僚在威权政体中的地位远低于军人或党工，既无政治上的决策权，也无行政上的领导权。当政权日益巩固，特别是政府工作日益专业化之后，技术官僚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政治领导者决心把关键经济决策委托给“非政治的精英”。

1952 年国民党改造后，国民党在政府各部门成立机关党部或政治小组，均由各级行政主管兼任同级党务系统的主管，行政系统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党委”或“书记”的领导系统。也就是说，党组织仍无所不在，实行的是“以党领政”，但党的组织“隐形化”，改变过去的“以党代政”。随着公共政策的日益专业化，党务系统逐渐被隔离在政策决策特别是经济决策之外。1972 年国民党十全大会通过党务革新案，明

确指出党“应着重政策研拟制定。以及对从政党员执行政策的监督考核,而要避免承担应由政府或可由政府负责的工作。”党的角色和作用主要变为政策协调和为行政官僚排除决策障碍,行政官僚在决策上的自主性大幅升高。

约翰逊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勾勒“资本主义发展导向”国家的特征时,特别强调在政治领导人与经济官僚关系上制度保证的有效性,即经济官僚是“治而不统”,政治人物则“统而不治”,前者处理实际政策制定与推展的细节,后者与政府的立法、司法部门充当“安全阀”,一方面为经济官僚开拓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也能防止官僚体系滥用权力。在台湾,正是拥有这样一支受过良好训练、高效率,且相对独立、拥有很大的制定经济政策权力的技术官僚队伍。

台湾技术官僚经济决策的自主性权力来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受到高层保护。据李国鼎说,蒋介石在全盘反思大陆的失败后,认为当初以军事第一统一中国为优先的方针基本正确,但在推行策略上却过于轻忽经济建设。痛定思痛后,蒋“承认自己对经济问题不在行,遂决定将财经大权授予他的副手陈诚以及陈诚手下的一批技术官僚”。1948年国民党在大陆财政改革的失败和经济崩溃的可怕情景,事实上也使蒋介石对经济问题产生一种“敬畏”。因此,退台后,蒋介石在财经事务上基本是“统而不治”,一直都在扮演台湾财经技术官僚的政治保护人的角色。

陈诚在大陆时代的经历,除了1938年一度兼任湖北省主席外,其余大多是军职,对财经问题也并不在行。但陈诚来台后基本上能做到知人善任,尊重人才,也肯放手让手下的技术官僚们去做。陈在1965年病逝前,主掌台湾财经事务15年,其手下尹仲容、严家淦、李国鼎等人提出的许多决策建议,很少有不为他所采纳的。例如尹仲容一生从未加入国民党,他能在50年代台湾财经界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除个人才干外,蒋氏和陈诚的信任支持也至关重要。人口增长过快一直是台湾经济发展中最沉重的负担,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李国鼎以“经济部长”身份,力陈人口压力的严重性,会议的争论以蒋介石对李国鼎发言的支持而告结束。次年

“行政院”颁布《台湾地区家庭计划实施办法》。

第二,台湾各个时期的经济领航机构,都是超“部会”性质的,其机构编制和预算均独立于政府一般行政之外。这种制度设计的优点,一是有利于延揽有能力的技术人才,使这些机构成为财经技术官僚的摇篮;也能有效地保护财经技术官僚经济决策的自主性,免受各种利益集团的掣肘。

第三,美国的干预也是台湾财经技术官僚得以自主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美援使团”人员参与了台湾土地改革、发展民营工业、外汇改革、奖励投资等很多重要决策。

技术官僚因受到保护且具有决策自主性,很可能产生官商勾结和营私舞弊现象。对此,台湾和新加坡、香港等地一样,有一套制度化的防腐机制,如选拔与考核、高薪养廉、舆论监督和法律规范等。台湾经济领航机构因其超“部会”性质,编制和预算独立,可不受文官法规的约束,高薪聘请技术官僚。因此虽然早年台湾一般公务员的工资都不高,但这些机构里的技术官僚的待遇却很优厚,一般为同级公务员的4—8倍。技术官僚的高薪有助于养廉。在法律监督上,“监察院”有权对公务员提出弹劾,另外还有处分违纪公务员的“公务人员惩戒委员会”。

发展经济的需要为台湾技术官僚的崛起提供了契机,经济的日益专业化和国际化加大了技术官僚的重要性,带来了技术官僚层的发展。国民党政治领导人“有所不为”和美国人的刻意扶持为技术官僚非政治化的经济自主决策开辟了空间。技术官僚的崛起,使国民党的构成发生蜕变。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无论在中基层还是上层,“革命精英”和“军事精英”都不再居于主流,而是由学有专长的技术官僚精英居主流。同那些党务、军特出身的官僚相比,专家学者出身的技术官僚特别是其中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专业知识功底扎实,工作较有效率,为政较为清廉,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由于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视野较为开阔,比较能够理性地接受民间社会要求政治民主的呼声,主张采取一种开明的态度和做法。这个群体为蒋经国在80年代中期选择政治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内部组织条件。

(责任编辑 刘家驹)

芳草萋萋鹦鹉洲

● 程竟明

湖北省武昌城外的长江之中，曾经有一片绿洲，洲虽不大，名声却很响亮。相传东汉末年，富有文才的祢衡在江夏太守黄祖之子黄射大宴宾客时，即席挥笔，写就一篇《鹦鹉赋》，被黄射赞之为“锵锵戛金玉，句句欲飞鸣”。江中的这片绿洲，从此被命名为“鹦鹉洲”。后来，祢衡因出言不逊，惨遭黄祖杀害，遗体就埋葬在鹦鹉洲上，时年26岁。

因赋得名的鹦鹉洲，受到了历代文人雅士的青睐。盛唐诗人崔颢的《黄鹤楼》中，便有传诵千古的名句：

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

芳洲在唐代诗人孟浩然的笔下，是那样的绮丽多彩：“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洲势逶迤绕碧流，鸳鸯鸂鶒满滩头。滩头日落沙碛长，金沙熠熠动飏光。舟人牵锦缆，浣女结罗裳。月明全见芦花白，风起遥闻杜若香，君行采采莫相忘。”

大诗人李白在《鹦鹉洲》一诗中，精致动人地描画了芳洲的春色：“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

到了明代末年，鹦鹉洲经受不了洪涛巨浪的冲刷，逐渐沉没江中。而汉阳拦江堤外，又新淤一片沙洲，形似台湾，名“补得洲”，清代便改名为鹦鹉洲，并在洲上重修了古朴别致的祢衡石墓。这里有副对联：

芳草萋萋，孤冢西望已陈迹；
洪涛滚滚，大江东去有新声。

“孤冢”便指的惨遭杀害的祢衡之墓。谁知世事无独有偶，到了民主革命时期，鹦鹉洲上又发生了一起动人心魄的惨案——革命志士熊亨翰坚贞不屈，慷慨就义的故事。

熊亨翰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共产党员，创办过杂志，当过报纸编辑，又做过教师，后投笔从戎，加入了国民革命军。他风华正茂，在艰险的斗争中写下了一些气势雄伟的诗篇，抒发自己为国家为人民赴汤蹈火的壮志豪情。他在《观涛》一诗中写道：

大江东去，浩荡谁能拒？
吾道终当行九域，
慷慨以身相许。*

……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搜捕和屠杀

共产党人，翌年11月熊亨翰不幸于鹦鹉洲被捕。在他就义之前，一个国民党右派大员驱车刑场劝降。熊亨翰凛然回绝：“把仅有的生命献给人民，是我永不更改的誓言，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那人又说：“要什么条件，可以商量嘛！”熊亨翰喊道：“我要写！”右派大员误以为要写自首书，立即喜形于色，大叫“笔墨伺候！”庄严沉稳的熊亨翰便在刑场上挥笔，题写了一副自挽联：

十余载劳苦奔波，秉春秋笔，执教师鞭，仗剑从军，矢志为党，有志未能伸，此生空热心中血；

一家人悲伤哭泣，求父母恕，劝兄弟忍，温言慰妻，负荷囑子，含冤终可白，再世当为天下雄！

联语悲愤激昂，表现了革命者“头可断，志不可夺”的英雄气概和革命必胜的信念。

鹦鹉洲至今屹立江心，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先烈的“当为天下雄”的遗志，已落在我们亿万后来者的双肩。

（责任编辑 云程）

- 为蒋家王朝经济领航的台湾技术官僚
- 朱元璋的重典之治与预防犯罪之策
- 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率船回归记
- “不抵抗将军”的真相
- 由国民党失意元老转为历史学家的冯自由
- 20 世纪 30 年代影坛才女艾霞

ISSN 1003-1170



02 >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 元